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解读视野。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19年
7-9月

- ▶ 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克曼获授中国政府友谊奖
- ▶ 我院获批 11 项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历史新高
- ▶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荣获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 ▶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为首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 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 计划”。同时,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专业声誉, 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克曼获授中国政府友谊奖	02
赫克曼: 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的实践家	03
赫克曼在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	05
赫克曼教授来访我院深入探讨绵竹调查项目	07
我院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08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荣获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10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为首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	11
02 科研动态	
科研项目	13
论文发表	14
03 学术活动	
SEMINAR	16
04 思想聚焦	
观点评论	21
暨济一堂	74
05 数据调查	
广东千村调查	80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	92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	94
06 人物专访	
IESR 人物	97
07 学生天地	
迎新特辑	102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107
08 对外交流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周俊波副主任一行来访我院	109
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处长葛国斌一行访问我院	109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110
冯帅章院长一行前往广东省教育厅调研	110

学院要闻

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克曼获授中国政府友谊奖

赫克曼：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的实践家

赫克曼在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

赫克曼教授来访我院深入探讨绵竹调查项目

我院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荣获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为首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克曼 获授中国政府友谊奖



9月30日下午,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校通过中央统战部推荐的暨南大学“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学术大师、讲座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被授予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他作为获奖者之一应邀出席颁奖仪式,并作为获奖专家代表在颁奖仪式上发言。



颁奖仪式现场 前排左一为赫克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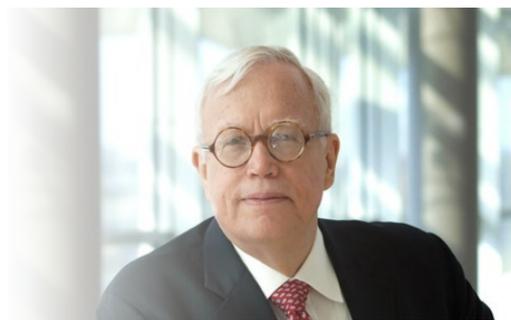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切会见了此次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获奖外国专家及其亲属,充分肯定了外国专家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外友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年度共有100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宣读了授奖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获奖外国专家颁奖并讲话。

赫克曼教授在发言中表达了他衷心的感谢与感激之情:“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友谊奖,这使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我想首先感谢那些与我们合作的才华卓越、真诚勤勉的中国学者们。中国已经成为我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目前在与广州暨南大学的学者合作,分析如何准确地测度人类的性格、技能、以及偏好,这三者对人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在研究父母教育缺失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赫克曼教授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服务”教授，2016年获聘暨南大学讲座教授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中国政府友谊奖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于1991年正式设立，这是暨南大学首次获此殊荣。



赫克曼：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的实践家



2016年10月，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为赫克曼颁发聘书

“获得这个奖项我非常感激，对于我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誉。”赫克曼激动地说道。虽然已到访中国多次，但本次受邀来京参加中国政府友谊奖授予仪式对赫克曼来说不同以往、意义非凡。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谈到中国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赫克曼非常惊叹，“可以看到，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

多年来，赫克曼致力于中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在四川绵竹开展了留守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调查。他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为中国的早期教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让更多家长意识到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为中国经济学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赫克曼的强力推荐与大力支持下，有经济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决定在中国

定期召开年会，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领域更广泛、更密切的交流。

一次中国行引发研究兴趣

作为最早关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之一，赫克曼早在十五至二十年前就从他的同事D·盖尔·约翰逊处开始了解到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移民浪潮。1997年，赫克曼第一次来到中国，从那之后他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并慢慢与中国建立了一些联系。随着来访中国的次数愈加频繁，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愈加深入，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愈加浓烈。

中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投入还有待提高，大量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缺乏良好的早期教育，这引起赫克曼的极大关注。201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该中心在家长投资、儿童早期干预、技能形成、代际流动性等研究方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他的团队还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开展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研究。

一次暨南行促成深度合作

2016年3月，在科技部外国专家局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的邀请之下，赫克曼在暨南园引爆了一场学术热潮，为暨大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在长达2小时的演讲中，他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精神矍铄，逻辑清晰，丝毫看不出他已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在演讲之后，他与暨大学子面对面交流，面对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无论是什么问题，他都耐心地与大家探讨。



2016年3月，赫克曼首次访问我校并作公开演讲

那一次的暨南之行，也促成了赫克曼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长期深度合作。2016-2019年间，赫

克曼5次到访暨南大学，与冯帅章合作开展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的相关研究，并担任研究院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2016年，研究院与四川绵竹市教育局共建“社会实践与研究基地”，开展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调查。赫克曼不仅担任项目的顾问，亲身参与到调查问卷的设计当中，他的博士、美国智库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研究员 Tim Kautz 两次随课题组团队赴绵竹16所学校，历时数月积累了数千份一手数据。



2016年绵竹项目预调查问卷调查现场

他们通过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探究与父母的分离对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这项研究非常前沿，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冯帅章说。绵竹项目已经持续了两年，共收集了近万名学生及家长的数据，研究成果将在不久之后通过文章、报告等形式问世。项目的系列成果将会为探索积极有效、可供推广的留守儿童干预措施，提升留守儿童早期教育质量做出巨大贡献。

一个计划联通暨大与世界

赫克曼领导的芝加哥大学人力资本与经济机会国际工作组（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连续3年合作主办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暑期学校项目，暨南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后，亚洲第二所承办该项目的研究机构。双方更是在2018年实施了“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这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与全球顶级名校、研究机构间强强联合的一次积极尝试，双方建立了师生双向交流机制，让暨大师生有机会到芝加哥大学感受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科研究与教育氛围。“联合计划就像架起了无形的高铁，快速联通暨大和芝大，联通暨大与世界。”冯帅章说。

2018年初，赫克曼担任海外学术大师的“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也成功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这也是暨南大学的首个人文社科类“111”基地。

一场经济学界盛会让世界进入国际视野

今年6月，本年度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在暨南大学隆重开幕。暨南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之后第六个举办该会议的学术机构。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每五年举办一次世界经济大会，号称经济学界的“奥林匹克”，而中国年会的成功申办也与赫克曼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他坚信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应该更广泛地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中国也能够培养出众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选择在中国举办年会应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2016年6月 赫克曼在世界计量学会中国年会做主题演讲

根据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Tilburg University Economics Ranking）2017年最新数据显示，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在35本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名列全国第7位，亚洲第19位。相较2015年名列全国第23位，亚洲第67位，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表现出非常强劲的上升势头。在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方面，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共获得资助12项，立项数排名全国第二。

一种开放态度带来学术热情

谈到对赫克曼印象深刻的特质，冯帅章用“学术狂人”来形容他。“他精力非常充沛，对周围的事情永远保持着一颗强烈的好奇心，又很有行动力，当他看到一篇感兴趣的文章，就会立刻发邮件去问作者研究的方法，并且想要即刻得到对方的答复。”

而对于如何保持学术热情，赫克曼本人则笑着说：“我一直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我对他充满了好奇，而且很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就是去思考、去好奇，有偿思考，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赫克曼与我校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研究院的硕士生吕佳玮曾作为“芝加哥-暨南联合计划”培养的学生，赴芝加哥大学访学。在那所顶尖学府，她与赫克曼教授交流颇多。对她来说，赫克曼是经济学界的泰斗，同时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平易近人，像父亲一般关心学生的研究，不时给予压力，督促大家在学术的道路上脚踏实地、阔步前进。

而谈到喜欢与怎样的研究者合作，赫克曼坦言志同道合才走得长远，“我喜欢与勤勉努力、充满好奇的人共事。我尤其喜欢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这里的批判性不是说简单地说一句这个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在批判的同时会带来新的建设性的想法和建议。”

此次，赫克曼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为他和中国的合作掀开了新的篇章，这位友谊使者未来将继续与暨南大学合作推进“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调查”、“芝加哥-暨南联合计划”，为提高中国留守儿童早期教育质量、为深化中美学术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赫克曼在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

9月30日，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本年度共有100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宣读了授奖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获奖外国专家颁奖并讲话。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作为获奖者之一应邀出席颁奖仪式，并作为获奖专家代表在颁奖仪式上发言。获奖感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刘副总理

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詹姆斯·赫克曼，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首先，我要感谢刘副总理今天来到这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谨代表我本人和在座各位外国专家，对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奖表示衷心感谢和感激。能够获得友谊奖，我们都感到非常荣幸，也使我们跟中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系。

我想代表各位感谢那些跟我们合作的中国学者们，他们才华横溢、勤奋且努力。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生中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主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问题。中国已经成为我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目前在与广州暨南大学的学者合作，分析如何准确测度人类性格、技能及偏好，这三者对人生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也在研究父母教育缺失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我还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有着紧密合作，共同实施并评估对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儿童发展的早期干预措施。我们的联合研究表明，这些早期干预措施为弱势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令人兴奋和鼓舞的结果，是提高技能和打破贫困代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些研究使我们能够在以前从未有过的微观层面上研究儿童发育过程。通过这些研究将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颁奖仪式现场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大大降低了国家贫困水平，同时促进了社会流动性。这些成就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发展。从人生中最初几年开始建立人力资本，聚焦于儿童早期教育和营养应成为中国主要的优先发展项目。如果在贫穷及边远农村地区投入更多，为当地儿童创造更加关爱和支持环境，并帮助他们在城市获得优质教育，那么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强。如果这一巨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些孩子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此外，政府应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并使其更能适应市场需求。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我相信，通过形成更加连贯和大胆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能够使中国获得更大收益。

刘副总理，我代表所有的获奖专家们，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再次感谢给予我们的荣誉，我们期待未来在中国工作。

赫克曼教授来访我院深入探讨绵竹调查项目



Heckman教授、冯帅章院长与项目组成员讨论项目进展

7月13日-17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来访我院，这是 Heckman 教授继参加我院承办的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后再次来访。

来访期间，Heckman 教授就四川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与冯帅章院长及项目组成员展开深入交流。Heckman 教授根据建模需求对问卷中学生、家长、监护人和教师四个方面的变量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并与项目组成员一同评估了变量数据的获取可行性和可信度。接下来，项目组将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挖掘与优化，切实为相关政策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多角度为绵竹儿童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于 2016 年 9 月由 Heckman 教授和冯帅章教授共同启动，2017 年 10 月该项目完成了对 6000 名四川绵竹儿童的第一轮基线调查，2019 年 4 月，在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调查结果正式发布。

除了严把调查项目质量关，Heckman 教授对 IESR 年轻教师的学术研究也非常关注，来访期间，他认真听取了 IESR 六位师生的论文报告，并给予了十分中肯的建议。

对于 IESR “青椒”们来说，暑假正是全身心投入科研的大好良机，还有诺奖大师亲临指导，这个假期实在超值！

与此同时，IESR 调查团队与行政老师们也在坚守岗位，认真服务于学院暑期各项工作。7月13日，我院“2019 广东千村调查访员培训班”正式开班，200 多名访问员和核查员接受了为期 3 天半的专业调查培训，为正式访问打下坚实基础。假期不打烊，千村扬帆再起航。

我院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为庆祝建国 70 周年，响应党中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9月26日，IESR 党支部召开了由党支部书记薄诗雨主持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背景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迫切需要。

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奔着问题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予以整治，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



认真听讲的党支部成员

接下来，薄诗雨为大家详细阐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12字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强调大家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以理论学习有收获、为民服务解难题、思想政治受洗礼、清正廉洁作表率、干事创业敢担当为具体目标，切实施行一个贯穿全过程，强化理论武装，了解民情掌握实情，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把“改”字贯穿始终，突出问题集中治理的六项措施，同时遵循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督促指导，加强典型宣传，三个结合起来，注重实际效果的五点要求。

通过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IESR的党支部成员们对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续，我院党支部将持续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会，大家也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党支部书记薄诗雨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荣获首届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冯帅章教授（左二）接受颁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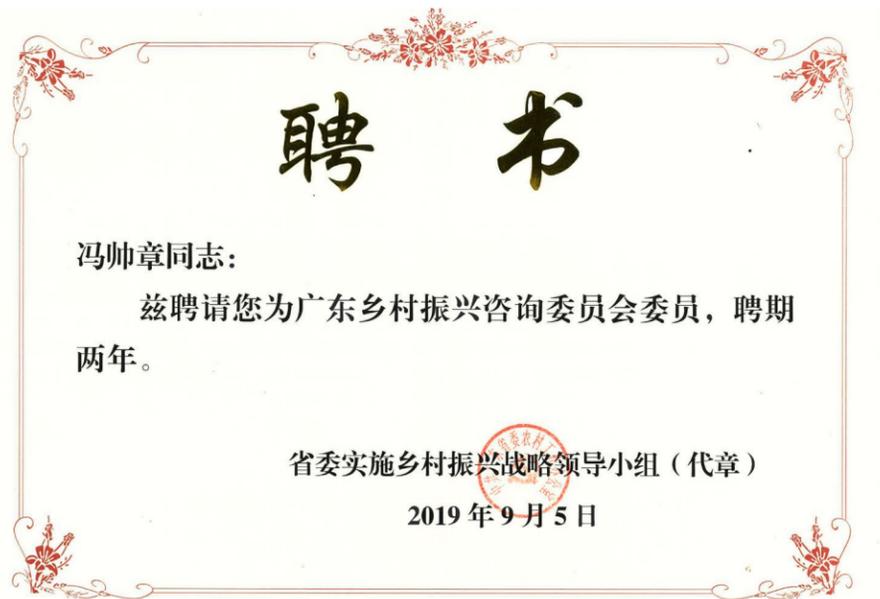
9月21日上午，“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揭晓了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名单（共2人），我校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获此殊荣。

冯帅章教授长期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学术研究，研究议题涵盖人口流动、早期人力资本培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等多个方面。他的研究既涉及理论前沿，也包括诸多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2013年，冯帅章教授与合作者关于美国失业率测量误差与低估的论文发表于全球排名最高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自从留学归国以来，冯帅章教授逐步将研究视角着眼于中国现实问题，包括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长期趋势、收入分配、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相关研究发表于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知名期刊。鉴于冯帅章教授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成就，2019年他受邀担任人口经济学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共同主编 (editor)。

为了更有广度、更有深度地评价与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经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全体成员单位讨论决定，自2019年起，“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变更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本奖项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严格遵循评奖章程规则，保持评奖的独立性。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2019年度）获奖者奖金为每人15万元人民币。

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2019）”评选工作在全体理事会成员单位的监督下由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秘书处（《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完成，共有36位候选人获得评审资格。奖项共进行两轮评审，第一轮，经评审委员投票，有10位参评者获得本奖项提名人选；第二轮，评审委员以最多同意2位参评者为原则作不记名投票，得票最多的两位参评者获得本奖项资格。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为 首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



聘书

9月5日，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审议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章程，还为第一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颁发聘书。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等29位专家受聘为第一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

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是省委实施乡村战略领导小组联系各部门、各学科、各领域“三农”工作的智库机构，其宗旨是服务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据介绍，委员遴选名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乡村振兴9个专项组和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直接推荐；以前召开专家座谈会时保留的参会人员名单；平时的工作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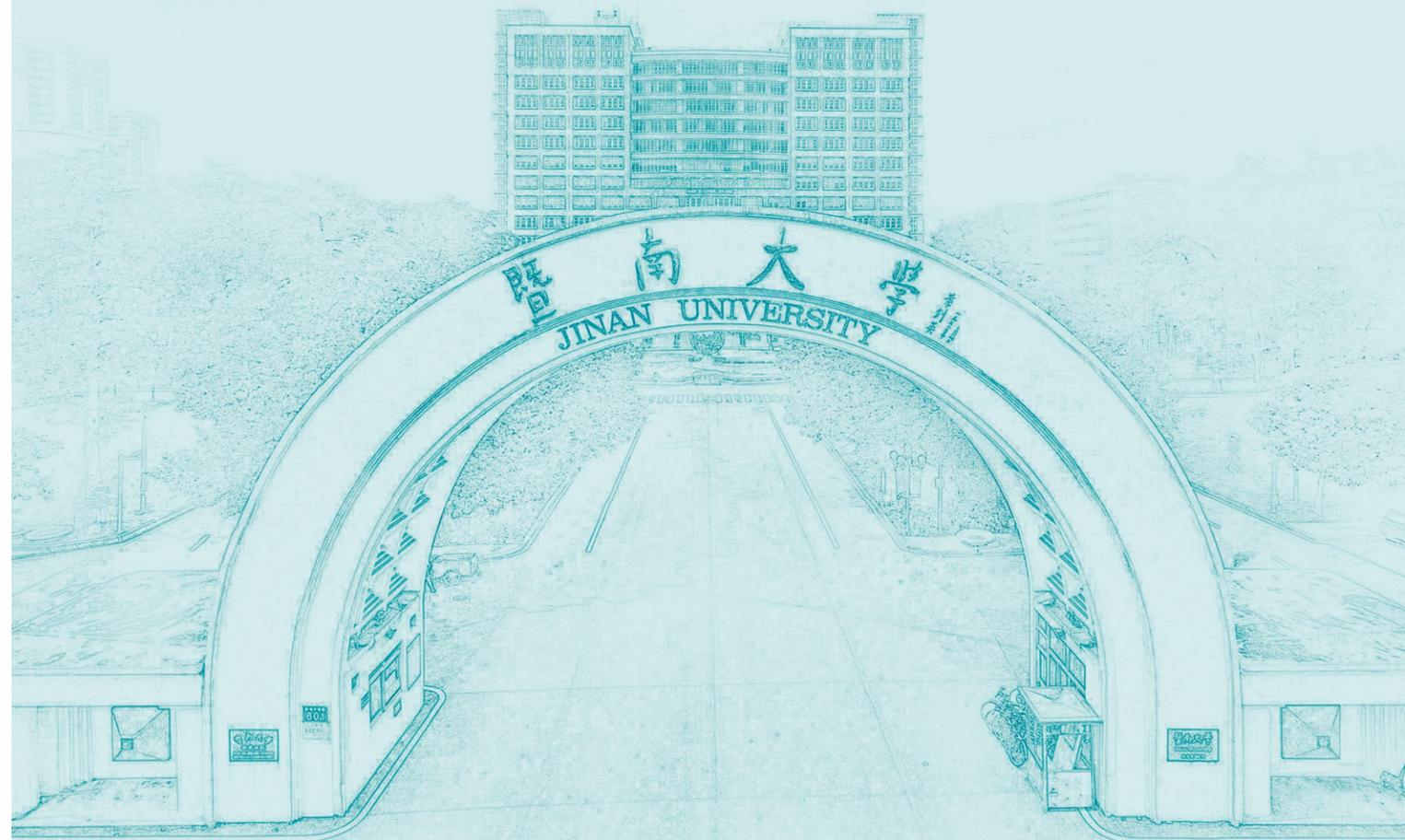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基于我院开展的广东千村调查，分享了以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广东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他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必然涉及广东境内城乡区域人口的合理分布以及城镇化的合理途径。城乡统筹发展离不开乡村在人才和教育方面的振兴，离不开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制。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加快推动乡村基础设施的升级，建设美丽乡村。

关于下一步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建议委员会紧紧围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任务部署的落实落地，围绕乡村振兴重大决策的具体实施，开展软课题研究、多形式咨询、及时向上反映委员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

科研动态

科研项目
论文发表



科研项目

我院获批11项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历史新高

我院在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共获批11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0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1项，各项目资助率分别高达37.04%和100%，远高于全国平均资助率。此外，今年我校经济科学(G03代码下)共获得资助12项(我院贡献8项)，立项数仅次于中国人民大学，排名全国第二。这一进展，标志着我院科研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陈祎	性别工资差异的动态演进及形成机制：来自公司人事数据的实证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马森	文化相似性、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基于汉语方言区边界的实证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	苏应俊	去产能政策的微观机制与效应评估：基于中国钢铁行业的实证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崔潇潇	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	唐立鑫	最低工资对企业转型行为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6	李书娟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机制与识别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	李承政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对农村居民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机理与适应措施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8	殷立娟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加入WTO前后企业微观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9	马祥	基于“撤点并校”分析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收益和总福利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0	谢斌	“减负”背景下教育品供给方式对教育不平等及其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探讨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1	Yunho Cho	Introducing Property Taxes in the Chinese Housing Market: Implications to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Welfare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我院一直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坚持引进海外优秀科研骨干，吸引具有国际视野且基础扎实的优秀科研人员，致力于打造一支实力雄厚的成长性国际化科研团队。经过三年的发展，研究院已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海内外著名学府延揽了42人，其中外籍教师3人，标志着我院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开了一大步，这也是我院国际影响力提升的重大体现。

2019年以来，我院在科研成果上喜讯频传。截至目前，已获批省部级项目3项，出版著作1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正式发表或被接受发表高水平论文13篇，包括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经济研究》等经济学知名期刊。未来，我们将继续鼓励与支持科研项目申报，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学术国际影响力，争取科研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为我校“双一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论文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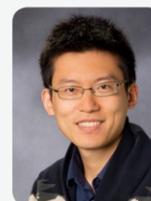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我院助理教授薄诗雨的独立作者论文“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Political Hierarchy Reform to Create Cities in China”被城市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接受发表。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我院助理教授王武毅的合作论文“Strong Consistency of Spectral Clustering for Stochastic Block Models”（合作者：Liangjun Su、Yichong Zhang）被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接受发表。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我院助理教授薛森的合作论文“Social Network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Experience”（合作者：Xin Meng）被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接受发表。



《经济研究》

我院助理教授李书娟的合作论文《官员偏爱籍贯地的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转移的视角》（合作者：徐现祥）发表于《经济研究》。

学术活动

【SEMINAR】

SEMINAR

【SEMINAR167】

英国华威大学助理教授 Federico Rossi: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killed
Labor



【SEMINAR168】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符育明:
Urban Research Using Mobile
Phone Data



【SEMINAR169】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Anthony
W. Orlando: The Physical Legacy of
Racism: How Redlining Cemented
the Modern Built Environment



【SEMINAR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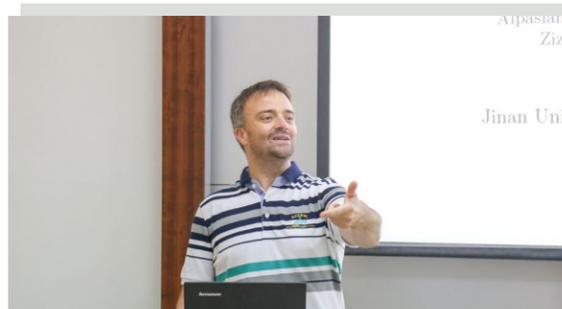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助理教授郑瑜:
A Model of Tournament Incentives
with Corruption



【SEMINAR171】
 康涅狄格大学教授 Chinmoy Ghosh:
**On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on Real Estate Value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India**



【SEMINAR172】
 南安普顿大学教授 Corrado Giulietti:
Immigration and Its Effect Local Area



【SEMINAR173】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 窦立宇:
Optimal HAR Inference



【SEMINAR174】
 剑桥大学助理教授刘凯: **Understanding
 Program Complementarities:
 Estimating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 Training Program with Multiple
 Alternatives**



【SEMINAR175】
 希伯来大学副教授 Avraham Ebenstein:
**Childhood Exposure to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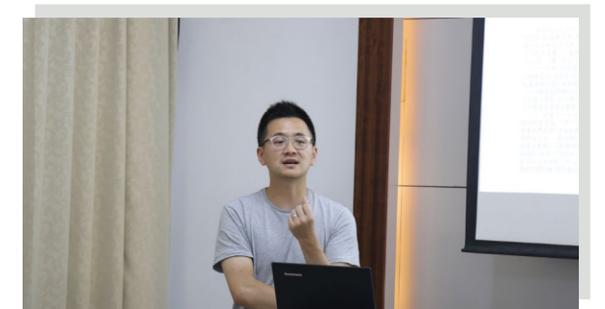
【SEMINAR17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教授刘锋:
**Effects of Drought on Infant Mortality
 in China**



【SEMINAR177】
 浙江大学研究员 龚斌磊: **New Growth
 Accounting**



【SEMINAR178】
 复旦大学教授陈硕: **Starving and
 Deceiving: Famine Experience,
 Politician Risk Preference, and
 GDP Manipulation in China**



【SEMINAR179】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孙昶: Uncertainty,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EMINAR180】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黄阳光: A Model
of Sales of Online Platfo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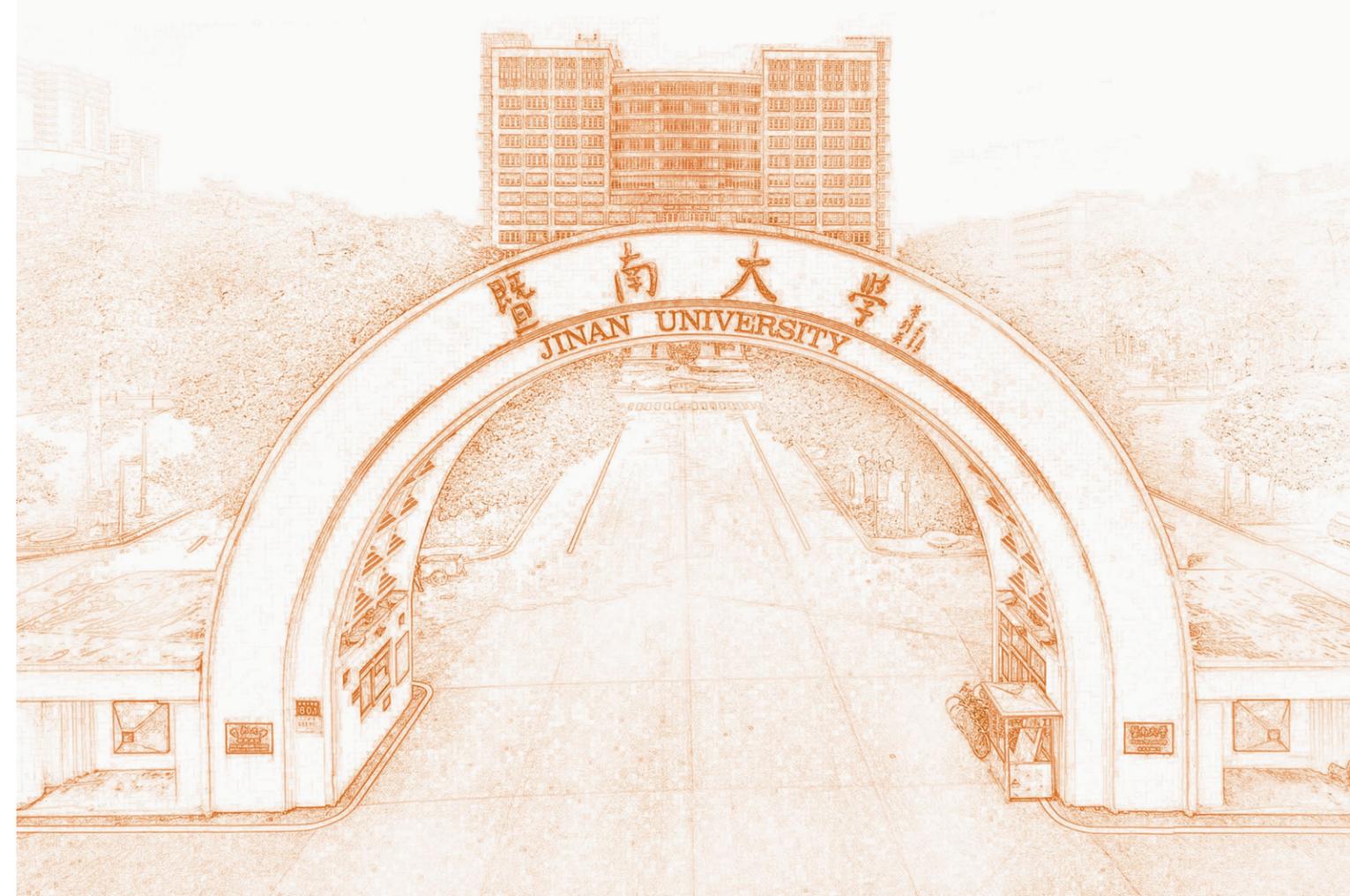
【SEMINAR181】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史震涛:
Forward-Selected Panel Data
Approach for Program Evaluation



思想 聚焦

【观点评论】

【暨济一堂】



观点评论

开放与透明应成为中国页岩气产业的发展趋势

作者：郭文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页岩气（网络图片）

在当前中国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页岩气产业，是现阶段实现能源清洁化和自给自足的重要解决方案。除了优化开采技术外，制度与监管的创新同样重要。中国页岩气产业应更加开放和透明，让“中国特色”成为行业发展的助推力。

页岩气产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分析中国页岩气行业的发展，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从需求的角度来说，页岩气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今年一月份由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全年天然气消费量为2766亿立方米，增长16.6%。天然气消费量的快速增长，主要由北方城市“煤改气”的政策所驱动。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不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仍不足15%。天然气作为比煤炭更为清洁的化石燃料，将在未来长时间内

扮演重要的过渡角色。另一方面，《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45.3%，增长6.2%，并在总量上超越日本成为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进口来源主要为中亚的管道天然气，和来自于澳大利亚、卡塔尔、马来西亚等国的LNG（液化天然气）。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的天然气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从价格上来看，美国Henry Hub 3月份天然气现货均价为2.95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而3月底录得的东北亚LNG 5月到岸价格则为4.30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尽管已处于3年来的最低位，这一价格仍高于美国天然气价格近50%。无论是从控制能源成本，还是从降低地缘政治对能源价格冲击的风险来看，提高天然气自主供应的比例，对保证中国能源安全都有着重要意义。

从供给的角度来说，页岩气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首先，中国拥有可观的页岩气储量。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15年估计，中国未探明可开采页岩气储量为1115.2万亿立方英尺，约占全球46个页岩气

主要生产国总储量的14.72%，位居世界首位，是美国页岩气储量的1.8倍。而2018年中国页岩气产量仅占天然气总产量的约7%，远低于美国的约56%的水平，这表明中国页岩气生产仍具有相当的潜力。然而另一方面，中国页岩气探明率尚不足5%。截止2018年，中国已探明的页岩气储量约为1万亿立方米，仅为同期美国已探明页岩气储量的约12%，且储量分布多在川、渝等地质条件复杂的山区，岩层埋藏深，开采难度大，部分地区缺乏水力压裂所必须的水资源，因而勘探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次，目前在中国实现页岩气商业开采的仅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等部委曾陆续出台文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页岩气开发市场，然而由于已探明的优质区块多数已被“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陕西延长石油四家国有油气企业所登记，其他通过招标进入页岩气勘探领域的企业只获得了价值相对不高的地块，勘探积极性较差（详见财新周刊2019年第11期《页岩气“两重天”》）。与此同时，2010年前后通过与“三桶油”签订合作协议进入中国页岩气勘探领域的外资油气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在2015年后也纷纷选择终止合作。随着英国石油于4月宣布退出四川页岩气勘探项目，当下已无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页岩气合作开发。缺乏竞争的局面，不利于开采技术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第三，中国油气行业产业链高度一体化，“三桶油”均有自己工程技术服务公司，而跨省的天然气主干管道多为中石油和中石化所修建。这种油服-勘探-输送闭合的产业结构，不仅固化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勘探准入门槛，也使得天然气的定价难以完全市场化。最后，中国目前尚未有针对页岩气勘探、生产数据的集中收集与发布，各个公司所掌握的地质信息无法做到基本程度的共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页岩气行业的发展。

制度改革，开放为先

要克服供给侧所面临的挑战，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对现有的页岩气产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应以开放为先，在遵循循序渐进原则的基础上，让产业链上下游都获得更加充分的竞争。首先，在勘探权的获取上，应建立更具时效性的退出机制，使拥有相对优质地块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开发动机，而非囤地观望。目前中国勘探许可权的实际等待期长达九年，而在美国，页岩气公司所签署的租地合约时限一般为三到五年，如果在合约到期前没有实现基本的量化生产，则土地需归还所有者。缩短持有勘探权的时限，不仅可以使优质区块得到更有效率的开发，也可以让企业更好规避低产区。同时，由于

中国土地的国有性质，政府在勘探权的分配上扮演主导角色，在“国家队”优先的基本国情下，仍有空间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公平与效率。事实上，自2012年至2015年间，一系列准入文件的出台，已使页岩气开采成为打破中国油气资源勘探权垄断的实验田，只是对于矿权质量的针对性分级，使得改革未能更进一步。在今后页岩气勘探权的招标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组织企业与学界对招标地块进行充分评估，并公开相应信息，破除政府与投标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于已收回勘探权的未开发地块，可给予未中标企业优先再次投标权。对于尚未探明储量的区域，也可以制定相应的规范，有限度地鼓励企业进行非钻探性的地质研究。此外，可以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与外资的投入比例，使拥有成熟技术的国际页岩气公司可以依托非“三桶油”的国有或民营企业进行页岩气开发，同时研究建立矿权转让的二级市场，减少企业的投入风险。

除了勘探权以外，同样有待进一步开放的还包括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工程技术服务市场。目前中国页岩气开采设备的来源相对多样，但油田服务市场仍存在较为森严的壁垒，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页岩气田多数由隶属于自身的油服公司实行钻探，外资油服企业目前还难以进入该市场。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但由于缺乏竞争，可能使油服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受阻。同时，由于两大油企在国内页岩气勘探开发上处于主导地位，一体化的油服市场同样不利于其他企业进入勘探领域。好消息是，随着中国民营油服企业的发展日益壮大，两大油企在页岩气井的钻探作业上也开始越来越多与民营油服企业合作。未来“三桶油”的油服企业应与油公司更加独立，与民营油服企业一起充分的参与油服市场竞争。对于非传统油气企业参与页岩气开发，可适当允许其与外资油服企业进行合作，以降低其进入市场的成本。

最后，位于下游的天然气管道输送网络，未来应由独立于两大油企的机构进行规划与设计。当前中国主要的跨省天然气输送管道均由中石油和中石化所属的管道公司经营。这样的格局一方面给予了两大油企过高的上游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对于新进入页岩气行业的企业，在管道连接和页岩气输送上将面临天然的障碍。由于管道输送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相关企业应在规划与价格方面接受政府的监管。目前中国天然气价格实行“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措施，且计划在未来剥离两大油企的长距离管道资产，组建国家管道公司，应该说是向着市场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可以预期，未来管道输送

行业将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垄断经营，并将更有利于非传统油气企业在页岩气行业的发展。

加强监管，让行业信息更加透明

由于页岩气开采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加强监管应成为页岩气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监管的前提在于立法，而难点则在于执行。要做到立法有据，执行有力，应对行业信息加以收集与公开，让中国的页岩气产业更加透明。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信息包括气井的位置、深度、所有企业，压裂气井时的用水量，所采用化学试剂的成分，废水处理的情况，气井的产量等等。这些信息的公开，不仅为环保部门的执法提供了依据，更可以形成强大的公众监督机制，让违规的企业难以遁形。

信息公开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可以由此实现企业间关于勘探与生产的知识共享。作为非传统油气资源，页岩气在中国的开发时间尚短，关于其储量的精确分布，开发的难易程度，目前仍缺乏有效共识，页岩气公司只能依赖自己所拥有的地块和以往的开发经验作出判断。由监管部门统一收集并发布气井位置、产量等信息，将给予页岩气公司和研究机构宝贵的数据，促进企业间的互相学习，提高勘探效率。在这一方面，美国页岩气行业的监管有许多先例。以位于美国宾州的马塞勒斯气田为例，宾州环境保护部门自2010年起，即定期公布位于该州所有页岩气井的位置和产量，涉及在马塞勒斯气田进行勘探的大小数十家公司。马塞勒斯气田在过去十年产气量快速攀升，成为美国最大的页岩气产区，除了由于页岩气储量丰富外，也与行业信息的透明不无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个体页岩气公司会从行业信息中获益，其本身本并没有动机披露自己的信息。因此，对于信息的收集，以及其真实性的确认，有赖于监管部门强大的执行力。在中国页岩气产业的语境下，由于国企拥有较强的话语权，监管的透明化将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通力配合，克服阻力，通过法律将信息公开制度化，常态化，在提升环保标准的同时也提升产业效率。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8》：2018年能源消费、生产增速双双创新高》，2019-04-30，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19-04/30/c_1124438427.htm

[2] EIA, Henry Hub Natural Gas Spot Price,

<https://www.eia.gov/dnav/ng/hist/rngwhhdm.htm>

[3] REUTERS, Asian LNG prices fall to near three-year low as buyers shun spot cargoes traders, 2019-03-2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asia-lng-prices/asia-lng-prices-fall-to-near-three-year-low-as-buyers-shun-spot-cargoes-traders-idUSL3N21E14D>

[4] EIA, World Shale Resource Assessments, <https://www.eia.gov/analysis/studies/worldshalegas/>

[5] 财新网，《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与对外依存度大幅增长》，2019-01-18，<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9-01-18/101371247.html>

[6] EIA, Shale Gas Production, https://www.eia.gov/dnav/ng/ng_prod_shalegas_s1_a.htm

[7] EIA, Natural Gas Gross Withdrawals and Production, https://www.eia.gov/dnav/ng/ng_prod_sum_a_EPG0_FGW_mmcfc_m.htm

[8] 新华网，《小步快跑！页岩气有望成我国天然气核心增长点》，2019-04-07，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4/07/c_1124334247.htm

[9]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8》，<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2/5333589/files/1bf146ddd1fd4ab998ba375aa0e98714.pdf>

[10] EIA, Shale natural gas proved reserves, reserves changes, and production, 2017, https://www.eia.gov/naturalgas/crudeoilreserves/pdf/table_14.pdf

[11] 财新周刊，《页岩气“两重天”》，2019-03-25，<http://weekly.caixin.com/2019-03-23/101395951.html?p0#page>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3日文章

【澎湃新闻】决定你高考分数的可能还有温度和空气污染

作者：唐曲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9年高考就在朋友圈的各种怀念以及吐槽中结束了。一千多万考生，不到3000所普通高校，其中所谓的重点名牌高校更是屈指可数。多年以后，我们可能不再记得高考作文写了些什么，也忘记了数学最后一道压轴题的解法。但是记忆中最鲜活的部分——六月的阳光和雨水以及空气中隐约的焦灼味道——也许，在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中，他们曾经扮演过某种重要的角色。

温度

2019年6月7日上午9点，广州市，气温30°C。同时，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气温27°C。下图1展示了2005—2011年6月7日和8日高考两天平均气温的省内差异分布，不同颜色代表各区县温度相对全省平均温度的差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地理面积或跨度较大的省份，如四川、新疆、内蒙、甘肃等，省内不同区县之间高考两天的平均温度差异可超过6摄氏度。

而在那些面积相对较小，但高考人数庞大的省份，如河南、山东、广东等，省内温差最高也可达到4—5摄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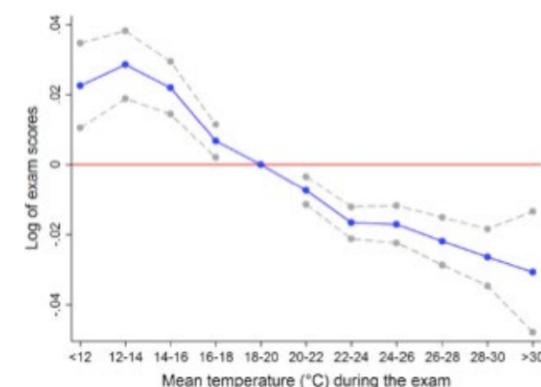


Figure 1. Temperature deviation from provincial average for each county in June 7th and 8th during 2005-2011

来源：笔者和合作者利用我国 800 多个气象监测站数据计算得到。

早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实验室证据已经表明环境温度会影响人类大脑的运作，包括专注度、记忆力、信息处理和心理知觉能力等方面。最近的两项实证研究 (Park, 2017; Graff Zivin et al., 2018) 利用美国青少年和儿童在相对低风险的测试和考试中的表现，证明了短期高温暴露对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那么，在高考这样高强度、高压、高风险的考试中，学生是否能够足够专注而不会受到高温炎热的干扰？笔者和合作者利用 2005—2011 年本科学校入学生的高考成绩，匹配考试期间所在区县的平均温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图 2 是我们主要研究结果之一：左图显示了温度与考试成绩的关系，右图则是温度与考上一本大学的概率（用考生成绩是否高于一本分数线表示）之间的关系。在同时控制了降雨、相对湿度、风速等其他天气变量，区县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以及每年可能调整的政策因素等的情况下，我们发现，高考两天的平均气温升高一个标准差（约 3.29 摄氏度），高考成绩会降低将近 6 分，进而考上一本大学的概率会降低近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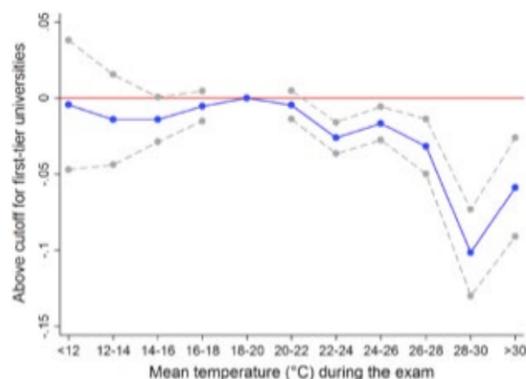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log of exam scores, and probability of getting into good universities

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省内温差分布图。假设其他条件相同，某省高考期间平均温度最高的 A 县比最低的 B 县高 6 摄氏度，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 A 县考生的成绩平均会比 B 县低近 10 分。高考通常被认为是我国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之一，但 6 月的高温，特别是省内地区间的差别，给这一公平的机制蒙上了一层阴影。

好消息是，空调的使用能够极大地缓解高温对考试成绩或者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2017 年我国家庭空调渗透率已高达 97%，越来越多的高考考场也都装上了空调。如 2017 年广州市全部 59 个考点均安装了空调。但另一方面，空调保有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也许会进一步加深对高考公平性的担忧。这也是目前高考期间是否开放空调存在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长远来看，我们还面临着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压力。未来温度的升高不仅直接影响农业、工业产出，还可能会通过认知能力、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影响社会福利水平。

空气污染

温度对考试成绩的影响可以通过空调的使用得到有效缓解，相比之下，对空气污染的适应和防护也许更加困难。无论是流行病学还是实证经济学的研究，都发现空气污染，尤其是直径不超过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污染 (PM2.5)，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图 3 是 2014—2018 年全国日平均 PM2.5 浓度变化，看起来 6 月高考期间（图中红色虚线所示）几乎是全年空气质量最好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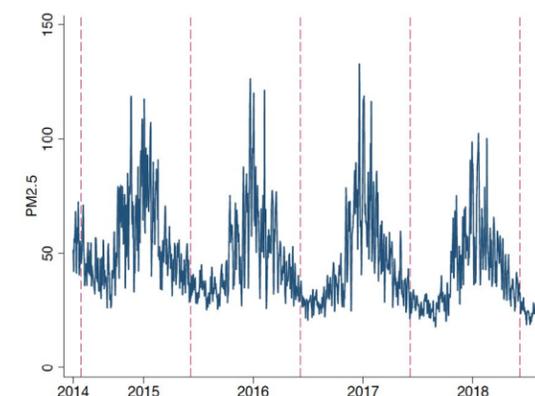


Figure 3. Daily PM2.5 concentration from 2014-2018

来源：根据 367 个城市、1499 个空气质量监测点数据计算

如释重负？让我们再来看一些不那么美好的景象。图 4 是某地收获季节后焚烧秸秆的照片。通过露天焚烧来清理作物残留在全世界各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因为这一方法省时省力，还因其有助于消灭虫害、增加土地肥效。但同时，大量研究表明，秸秆焚烧会释放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碳等多种污染物。而且由于秸秆焚烧多在农村地区进行，这些污染物带来的健康和经济社会负担在很大程度上都由附近的农村居民承担。图 5 是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两颗卫星 TERRA 和 AQUA 采集到的全球火灾观测数据绘制的 2005—2011 年安徽、河南和山东三省秸秆焚烧火点图，上述三地是我国玉米和小麦的主要产区，同时也是高考人数众多、竞争异常激烈的省份。每年高考前后恰恰是这三个省份集中进行秸秆焚烧的时间。



Figure 4. Straw burning and local air pollution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3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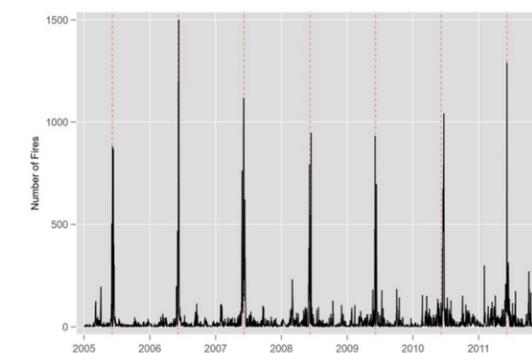


Figure 5. Daily straw burning in Aihui, Henan, Shandong from 2005-2011

利用之前提到的考生成绩数据，结合 NASA 卫星观测火点数据，笔者和合作者分析了高考期间安徽、河南和山东三省秸秆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对考生成绩的影响。与温度的研究相比，要剥离出秸秆焚烧对高考成绩的影响更加困难，因为秸秆焚烧作为一种与农业经济相关的活动，与期望收入等其他决定考试成绩的因素相关。因此，在控制气候条件、区县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分省相关政策因素等的情况下，我们还进一步借助短期风向的随机变化，将秸秆焚烧通过污染途径对高考成绩的影响与其他影响因素区分开。我们发现，高考两天上下风向之间秸秆焚烧火点的数量升高一个标准差，高考成绩会降低约 0.6 分。与之前温度的影响相比，这一结果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利用主要污染物站点监测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并发现上风向的秸秆焚烧会显著增加颗粒物污染（包括 PM2.5 和 PM10）。粗略的换算显示，秸秆焚烧带来的一单位 PM2.5 浓度增加，会使得高考成绩降低约 0.31% 个标准差，这是 Ebenstein et al. (2016) 在以色列研究结果的近两倍。

值得期待的未来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认知能力以及未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事实上，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已日益受到学界和决策者的关注。近年来，各级政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能源结构，从制定更严格的节能环保标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到利用碳市场等经济手段入手，重拳应对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的挑战。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常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以提高环境管理效率，实现多赢局面。

当下有为，未来可期。

* 本文主要基于笔者和 Joshua Graff Zivin (UCSD), Yingquan Song (Peking U), Tong Liu (HKUST), Peng Zhang (Hong Kong PolyU) 的两篇工作论文改写而成。文中提到的其他参考文献包括：

[1] Ebenstein, A., Lavy, V., & Roth, S. (2016). The long-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igh-stakes examinations: evidence from transitory variation in pol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8(4), 36-65.

[2] Graff Zivin, Joshua, Solomon M. Hsiang, and Matthew Neidell (2018). "Temperature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5, no. 1: 77-105.

[3] Park, Jisung (2017). "Hot temperature, high stakes exams, and avoidanc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Working paper.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及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5日文章



了解你不知道的“厕所革命”

作者：张亚楠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我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厕所革命”，2018年9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19）》中提到，“要实施“厕所革命”，结合各地实施普及不同类型的卫生厕所，推进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曾为改善家庭厕所和公共厕所环境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如让我们看看在厕所革命的过程中，他们都经历了哪些历程？

一、宗教信仰支配下的印度厕所革命

说起厕所革命，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神国印度了吧~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厕所爱情故事”哦不，《厕所英雄》，让很多观众第一次了解了印度的厕所革命。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主角嫁到一个没有厕所的印度村庄，面临必须深夜野外如厕的尴尬，丈夫绞尽脑汁帮助妻子蹭厕所，却发现传统观念如铜墙铁壁，想要一间厕所难如

登天。为此女主不惜提出“没有厕所就离婚”，这件事引起了空前反响，掀起女性如厕革命。

印度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国民的如厕问题一直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缺少厕所和其他卫生设施，每年因为卫生相关疾病所导致的生产力丧失，为印度造成了540亿美元的损失。也由于厕所问题频繁引发社会事件引起的广泛关注，印度的每一任总理在执政期间都会对国家的厕所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

2014年，新任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发起了“清洁印度”（Clean India）运动，立志到2019年，做到印度“家家有厕所”。印度政府为每一户修建厕所的花费补贴一半，地方政府再补贴四分之一，世界银行也为印度发放了15亿美元的专项贷款。同时，印度北方发起“三十二使命”项目，确保当地49.6万户居民在2018

年10月之前都能用上厕所。印度政府发起的“清洁印度”运动和印度北方自行发起的“三十二使命”，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改善了当地的卫生条件和民众的生活习惯。



印度的厕所革命

而此次掀起的厕所革命，也为当地泥瓦匠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让这些匠人可以在居住地就近工作。印度厕所革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依旧面临变革传统观念的问题，在印度人的传统观念看来，厕所是装有不洁物的场所，不能安置在家中，否则会玷污自身和神明。另外，印度人民大多信仰印度教，而在印度教鼓励民众到野外方便，以便和大自然沟通，在印度人尊崇的《摩奴法典》中，鼓励信徒“在远离自家的房屋的大自然排泄”。因此，印度人的传统观念是非常排斥在自家修建厕所的，一些印度人民甚至将政府发放至手中的厕所修建补贴款用于改造厨房，这对印度厕所革命的推行造成了很大阻力，对于印度而言，厕所革命对国家基础设施的彻底改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第一个抽水马桶在英国诞生

英国作为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其厕所革命则远远早于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在英国进行厕所革命的前夜，卫生设施还未被发明，全人类都面临着卫生与健康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大批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由于欧洲人并不会像东亚人一样收集粪便作为农肥，因此，人畜粪便开始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乃至成为健康问题频发的诱因。人口增长导致的瘟疫频发，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卫生问题，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公元1558年-1603年），英国一位名叫约翰·哈林顿的传教士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

随后，抽水马桶不断被改良，直到1775年由亚历山大·卡明思设计了第一项具有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并经后人逐步改良。1845年，在英国召开的第一届世博会上抽水马桶展出，有超过80万人排队进行了体验，从此，抽水马桶风靡英国，并走进英国的千家万户。



18世纪末，英国绘制的《各国如厕图》

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令”，规定：凡新建房屋、住宅，必须辟有厕所，安装抽水马桶和存放垃圾的地方。1861年，英国政府制定法律，规定每幢房屋必须安装污水处理系统。抽水马桶的发明和排污系统的完善，使得英国的厕所革命成为可能，随后几年，抽水马桶风靡欧美，农村厕所因为技术的改进而普遍得到改善。1894年，巴黎颁布一项重要的城市卫生法令，要求每间公寓都必须有一个厕所，此外要求厕所具备完整的上下水系统，并与市政下水道进行连接。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各地先后通过地方法规，禁止开敞式对粪便不经处理的简易厕所。随着各国通过明文法规对农村厕所做出规范，厕所革命也随之完成。

三、日本：厕所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厕所革命也随着人们观念的革新和技术条件的成熟而得以进行。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在战后得以腾飞，而脏臭的厕所问题却广为人们诟病，尤其以公共厕所为甚。当时的日本报纸强烈批评公共厕所的落后，并喊出“厕所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国民对改善厕所现状的猛烈诉求，促使全日本范围内将“公厕革命”列入地方行政的重要事务。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厕革命”，1985年，非营利组织“日本厕所协会”在东京成立，并提出了“创造厕所文化”的口号，组织各界专家专门考评地方厕所问题，并进行要求严格的最佳厕所评选。该组织的首届讨论会将每年的11月10日定为“日本厕所日”，在这一天举行多种多样宣传“厕所文化”的活动，几乎所有的公共厕所都被装扮一新，厂商也大张旗鼓地宣传相关产品。经过了多种活动与舆论影响下的日本，让日本的厕所有了很大变化，也改变了日本的社会风貌。



日本公共厕所的细节设计

与日本相邻的韩国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开展厕所革命，1986年和1988年，韩国分别以汉城亚运会和奥运会为契机，由中央政府和汉城市（即首尔市）为主导，开展他们的“厕所革命”。但起初的推广效果不佳，因为原本的上下水系统并不能满足现实要求。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期，韩国中央政府以2002年韩日足球世界杯为契机，积极发动各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将“厕所革命”的重点放在健全配套设施和提高市民素质上，提出了建设“最美厕所”（beautiful toilet）理念，但效果也不是十分显著。近年来，韩国通过设立具体标准等手段，以各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主导，将“厕所革命”推向了全国。再次提出了将“美丽厕所”

向“绿色厕所（green toilet）”目标转变。2004年1月，韩国通过《公共厕所法》，从法律上详细规定了公共厕所的认定和管理，使其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制定了相关法律的国家。韩国虽然在厕所革命方面也做了诸多努力，但是效果在近年才开始体现，可见，厕所革命不是一朝见成效，而是要经历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在全社会看到整体情况的改善。



这座位于韩国水源市的马桶型房屋，由世界厕所协会组委会主席设计

四、我们能学到什么？

第一，从领导团体来看，各国厕所革命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政府主导的趋势。在厕所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厕所革命的推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我国而言，厕所革命同样要依靠政府的强大执行力进行农村厕所革命的推进，在开发原则上，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的原则，在厕所革命的资金分配和人员核查监管分配上要注重向农村地区倾斜。改进农村厕所环境现状，是实现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体现之一。

第二，从实现方式来看，厕所革命的推进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厕所卫生器具和排污系统的改进。在外国厕所革命的进程中，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卫生设施的改良历程。同样，改进技术对于我国推进厕所革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领土面积广大，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各不相同，因此，要因地制宜的采用合适的技术对家用卫生厕所和公共厕所进行改造，针对水资源丰富和缺乏地区可考虑不同的卫生改造设施，只有适宜的卫生设施技术，才能有利于我国厕所革命更加深远的进行下去。

第三,从创新路径来看,部分推进厕所革命的国家使用市场化方式实现了厕所革命社会与市场的双赢,而我国目前卫生设施改造过程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对于我国而言,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市场化运作的先进管理方式,如我国可以采取在公共厕所设施外围进行一定的广告投放,逐步实现“以厕养厕”。另外,由于我国耕地面积广大,对肥料的需求也十分丰富,当地政府可以和一些有机肥公司进行合作,通过科学卫生的方式,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再造。

第四,从公民自身来看,厕所革命历程的推动还在于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现实表明,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厕所革命的推动正是在公民的推动或

抵触下成功或失败。对于我国而言,转变公民思想观念,深刻认识到改善环境的利好之处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要增加农民的参与和认同度,让农民深刻感受人居环境改善对于自身生活和社会总体带来的巨大便利,从心理上深刻认识到厕所革命的意义。而这对于我国推进厕所革命而言,也是一种现实而有重大作用的推动力量。

(注:各国厕所革命历程整理自:中国日报、搜狐网、新浪网、中洁网、咸宁日报、CPF 聚焦网等)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8日文章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作者:樊静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唐立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邹奔(密歇根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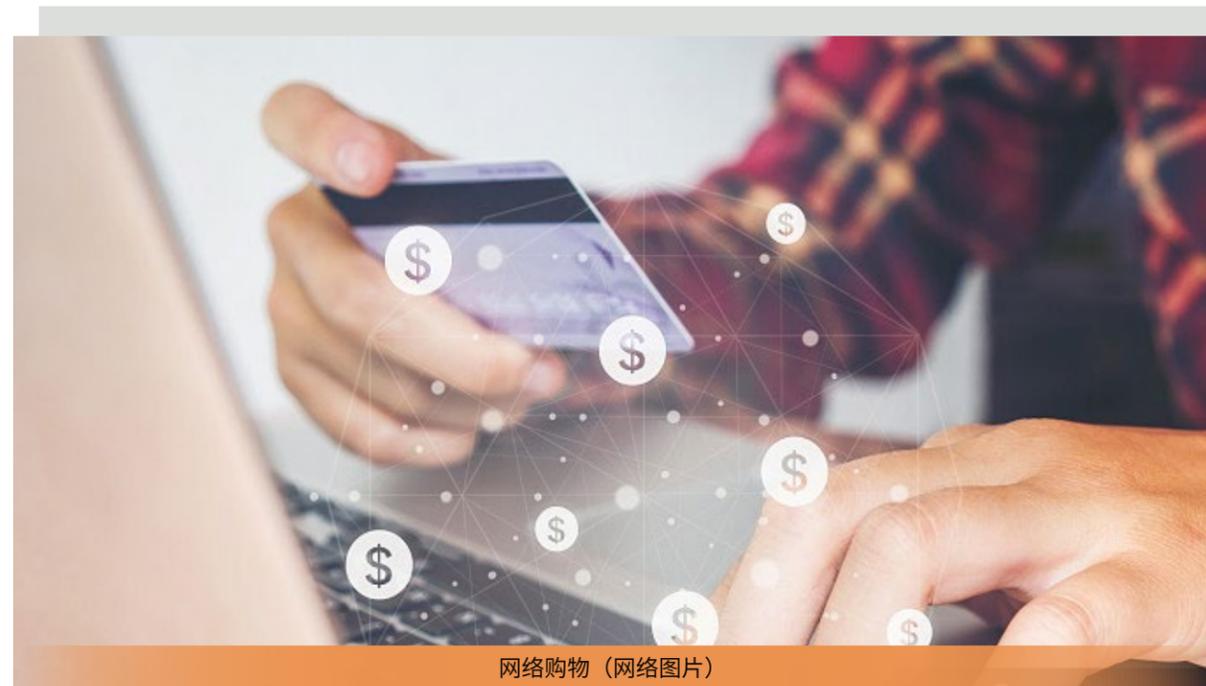
朱未名(IESE 商学院助理教授)

居住在大城市的好处之一是有利于消费。传统的零售业要想进入当地市场就要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比如市场调查、选址、租赁、培训员工等。相比小城市,拥有强大购买力的大城市通常会吸引更多的零售企业,零售价格也会因企业竞争变得更低廉,这就是像奢侈品、工艺品以及古玩这样的小众商品存在于大城市的原因。因为缺少高质量的零售业,小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如果不想迁就于当地有限的零售选择,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附近的城市购买需要的产品。区域消费的不平等虽然存在于世界各地,但由于传统零售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这种情况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地域差异,消费不均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地区收入水平差异是造成地区消费差异最主要的原因。以2011年为例,上海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30元,甘肃为14989元;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4552元,甘肃为4495元;上海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441元,甘肃仅为6319元。由此可见,地域收入差异是地域消费差异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富裕地区的居民会购买更多、更好以及种类更丰富的商品。

地区消费差异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不同地区的商品可得性不同。与其他国家类似,中国的生产厂商和供应商大多集中于某些工业集中的地区,由于生产的集聚效应,不同的工业地区生产的商品种类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高昂的运输成本是限制商品扩散的重要原因。交通落后的偏远地区以及运输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高的产品,受运输成本的影响最大,导致一些商品很难销往离产地远的地区。除了人均



网络购物(网络图片)

收入的差别之外,东中西部地区在人均交易市场营业面积和人均连锁零售营业面积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中部地区的人均交易市场营业面积为东部地区的39%,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34%;在人均连锁零售营业面积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比值为37%,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比值仅为27%。这些差别限制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时可选择的商品种类。

传统的零售业销售一件或者一类产品时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固定成本,比如开一家服装店需要租用街铺以及雇佣合适的销售配给人员。只有当潜在的需求能够偿还这些固定成本的时候某种商品才会进入该地,因此固定成本导致了某些商品在一些地区的缺席。小城市和乡村由于缺少足够的人口基础和购买力,即使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奢侈品等需求量较少的小众商品依旧不会进入这些市场,这就解释了江浙地区富裕县市以及乡镇的潜在消费水平与当地现有的零售网络不匹配的原因。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级别划分是阻碍商家进入的另一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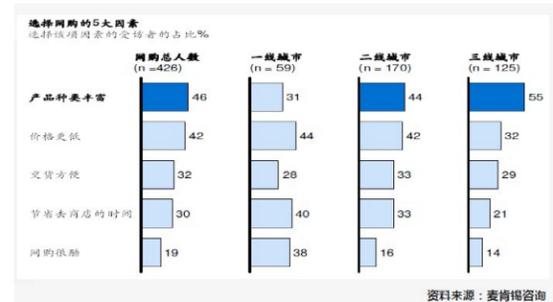
由于以上因素,中国的线下零售业支离破碎。2012年,美国排名前100的零售连锁经营商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35%,但中国仅为9%。从传统上来说,大型零售商主要集中于大型和富裕的城市,而我国的实

体零售业主要由品种数量有限的小规模本地零售商主导,这与发达国家的传统零售业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沃尔玛在美国的中等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根基,但其在中国的首批商店则位于最大的都市区。只有充足的本地需求才能弥补建立一个大型实体商店的前期投资,我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很低,因成本高昂以及购买力的缺乏,大型零售商进入小的、不繁荣的城市和农村依旧很困难。

近年来以淘宝、天猫和京东为代表的网络购物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的消费差距,无论身居何地,消费者总能便捷地买到各种商品。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网络购物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市场。2016年,线上支出为8510亿美元,占我国零售总额的15%,占全球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的37%。迅速发展的网络购物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因物流业的发展和其对农村市场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区域间的消费不平等。网店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几乎零成本地进入任意一个被地理和交通分割的市场,消费者不管身处哪个城市或者乡村,面对的都是相同的线上商品。近年来高质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物流业的开放和充分竞争,各地

消费者多面临的产品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趋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智能手机轻松获取种类丰富且价格低廉的商品信息，在线零售市场份额的占比迅速升高。

虽然东部沿海较大的和较富裕的城市人均在线零售消费最多，但较小和较不发达城市的在线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更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年关于中国电子商务的报告发现，比起一二线的大城市，三四线城市居民网络购物占收入的比重更高。淘宝网2013年的《县域网购发展报告》也发现，三四线城市网购力量远超一二线城市。2012年县域地区共有3000万人在淘宝上购物，人均花费近6000元，比一二线城市居民的支出高了1000多元。2014年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县级市是淘宝网上人均消费最多的地区。这些发达小城市的传统零售业不能满足居民强烈的消费意愿，淘宝网的出现给他们带来的收益最大。图1为麦肯锡咨询调查的选择网购最主要的五大因素，其中产品种类丰富是消费者选择网购最主要的原因；三线城市因产品种类丰富而选择网购的消费者占比最高，二线城市次之，一线城市占比最低。因价格更低而选择网购的人中，一线城市的比重最高；二三线城市因交货方便而选择网购的比重高于一线城市。节省去商店的时间以及认为网购很酷是选择网购的其他两个因素。相比一二线大城市，三四线小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县级市从网购中受益更大。



选择网购的五大因素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以中国为背景研究了网络购物在减少空间消费不平等中的作用。较小和较远市场中的消费者在实体店中只能获得种类有限的商品，因此他们倾向于将更多的开支用于购买线上商品。我们首先对“网购支出比例”与我国各地级市的市场规模和偏远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越少、越偏远的地级市，当地居民网购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就会越高。因为这些

负向关系在控制了刻画需求变化的人口特征等变量之后仍然成立，所以消费结构的差异不能解释这些实证范例。也就是说，零售业欠发达的地级市，当地居民会通过网购来弥补他们消费时面对的产品种类或价格方面的劣势。

我们构建了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以量化电子商务对福利的影响并对潜在渠道进行研究。为了使模型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通过匹配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对模型的关键参数进行校准。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我们发现，网络购物不仅使得城际贸易更便捷，而且带来了实质性的福利收益。对于一般城市来说，网络购物的福利收益平均为1.6%，也就是说，网络购物的出现，相当于给一个普通城市的居民带来了1.6%的工资变化。这种福利收益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更偏远的城市尤其显著：在人口规模排名后20%的城市中，网络购物带来的平均福利收益为2.0%；而人口规模排名前20%的城市，平均福利收益则为1.1%。市场潜力最小（最偏远）的前20%的城市，平均福利收益为2.1%；市场潜力最大的前20%的城市，平均福利收益为1.2%。由此可见，网络购物显著降低了中国的空间消费不平等。通过对影响渠道的分析，我们发现价格下降是较大规模城市居民获得福利收益的主要原因；而消费种类增多则是其他城市居民获得福利收益最主要的原因。这与麦肯锡咨询的调查报告（图1）的发现一致。

缩小各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政策。我们的研究认为，除了缩小名义收入的差异，降低商品价格和缩小商品种类的差距同样很重要。“大盒子”零售模式是一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零售模式，而网络购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跨越这种零售模式的机会。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技术，让那些居住在小型或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受益最多，从而降低了区域间的消费不平等。为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从电子商务中获益，政策制定者应努力提供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有竞争力的快递服务以及便捷的互联网接入。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王孟焯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自财新网以及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9日文章

垃圾分类要与垃圾运输、处理等能力匹配

作者：李承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亚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垃圾分类（网络图片）

最近的上海人民每天都要经历两次来自老阿姨的灵魂拷问：依是什么垃圾？垃圾分类的政策一经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其细致的垃圾分类规定，堪称我国执行垃圾分类办法中最为严格的举措。虽然垃圾分类利国利民，但在执行之初，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和投放方式的转变感受到了极大的不适应。

本文将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我们梳理发达国家（地区）垃圾分类的方法，探讨垃圾分类是否分得越细越好？垃圾分类是否会催生新的产业与职业？垃圾分类要取得成功，需要怎样的制度保障？

1.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剧增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仅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更对人类健康产生了诸多不

良影响。然而，垃圾也有一定的资源属性，它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因此，如果我们寻找到了合适的处理垃圾的方式，整个社会将受益匪浅。目前来看，垃圾分类是行之有效的方之一。它有助于人类社会循环和充分利用资源，同时它能够有效地缓解人类生活家园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那么，垃圾分类究竟是如何减少人类社会的环境压力呢？

社交网站上的视频中，北极熊身上沾满了污垢，在垃圾堆里不停的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将生活垃圾简单地分为两类：可回收垃圾和其它垃圾。由于不少可回收垃圾存在明显的经济价值，目前已经通过“拾荒者→废品回收站→回收企业”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源循环利用链条。对于其它垃圾而言，处理方式无

非两种，焚烧或者填埋。由于其它垃圾包括各种干、湿物品甚至有害物品，无论是燃烧和填埋都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垃圾焚化厂若直接焚烧干湿不分离和有害垃圾，将会产生大量的二噁英，它是一种臭名昭著的剧毒物质（一级致癌物），造成的不良后果包括致癌性、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例如，雌性化、不孕不育和胎儿生长不良等）。生活垃圾直接填埋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产生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或释放出有害气体。

对生活垃圾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可能改善上述情形。如果按照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新推出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干垃圾和湿垃圾四个大类，并对各类垃圾进行妥善处理，则能够显著地改善环境问题。首先，有害垃圾通过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分拣，送往特殊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其次，湿垃圾回收后搅碎，可在蚯蚓塔中进行生物降解或堆肥处理。干垃圾则送去填埋厂进行填埋或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电。由于现在从其它垃圾中分离出了有害垃圾和湿垃圾，剩余的干垃圾在焚烧过程中释放的二噁英将会大量减少，干垃圾能大幅提高焚烧热值，从而提升垃圾焚烧厂的发电效率。因此，无论是从环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考虑，进行垃圾分类的社会效应都是可观的。

2.他山之石：典型国家（地区）的垃圾如何分类？

发达国家实施垃圾分类制度的时间远早于中国。以德国为例，早在 1904 年德国就开始实施了垃圾分类，至今已经持续了 115 年。以德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便通过一系列垃圾管理和环保的法律、法规，为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循环使用的 3R 目标（Reduce, Reuse and Recycle）而努力。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垃圾分类制度（见表 1），为减缓全球环境恶化做出了贡献，也为后进国家实施垃圾分类提供了参考。

表1 典型国家（地区）的垃圾分类标准及收集频率

国家（城市）	垃圾分类标准（大类）	垃圾收集频率
日本	(1) 可燃性垃圾 (2) 不可燃性垃圾 (3) 资源性垃圾 (4) 有害性垃圾 (5) 超大型垃圾 (6) 不能收集的垃圾	采用定时定点定类的方式。比如，周一、周四上午 8 点半回收可燃垃圾，周三 8 点半回收资源垃圾。
德国	(1) 有机垃圾 (2) 包装垃圾 (3) 纸质垃圾 (4) 玻璃类垃圾 (5) 混合垃圾	可以选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和一周两次，不同收集频率缴付不同价格。
美国	(1) 可回收利用垃圾 (2) 有机垃圾 (3) 特殊垃圾 (4) 其它普通垃圾	以洛杉矶为例，普通垃圾每周两次，可回收垃圾每两周一次，有害垃圾收集频率比较低，通常一年只有几天收集。
英国	(1) 普通生活垃圾 (2) 花园垃圾 (3) 残留食物垃圾 (4) 可回收垃圾	垃圾车会按照一周一两次到两周一次的规律前来回收。
瑞典	(1) 厨余垃圾 (2) 塑料包装 (3) 纸质垃圾 (4) 废物垃圾	居民自行随时投放，扫描操作，称重并分类投放，自动化运输。
新西兰	(1) 厨余垃圾 (2) 一般生活垃圾 (3) 塑料垃圾 (4) 纸质垃圾 (5) 玻璃制品垃圾	定时收集。比如，大型垃圾一年一次收集。
中国台湾	(1) 一般垃圾 (2) 可回收垃圾 (3) 厨余垃圾	每天分别在晚上 5:15 和 7:00 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学术文献和公开资料整理获得。由于现实中一国之内不同城市可能实施完全不同的垃圾分类标准，本文仅根据该国代表性城市的分类标准整理出典型国家（地区）的垃圾分类和收集制度，以供读者参考。

以德日为代表的典型发达国家除了垃圾分类较为细致以外，对垃圾的投放规则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比如，在德国，虽然葡萄酒瓶、啤酒瓶、果汁瓶、矿泉水瓶都是瓶子，但它们却有着不同归宿。葡萄酒瓶要扔到特定垃圾桶中；啤酒瓶可送到指定地点回收；果汁瓶要当作塑料包装垃圾处理；瓶身印有回收标志的矿泉水瓶，才被归类为可回收垃圾。而在日本，一个普通饮料瓶在丢弃之前需要完成以下五个步骤：喝光或倒光→简单水洗→去掉瓶盖，撕掉标签→踩扁→根据各地的垃圾收集规定在“资源垃圾”日拿到指定地点或指定回收箱。因为在日本，塑料瓶的盖子、包装纸、瓶子分属不同类型的垃圾。



在日本以垃圾分类细致而著称，2016 年的分类高达 51 种

3.垃圾分类是否分得越细越好？

垃圾分类是否分得越细越好呢？当然不是。垃圾分类的全部工作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完成不到位，最终都会影响到垃圾分类处理的效果。比如，即使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分类投放，如果后续环节出现“混装混运”的情形，那么整个垃圾分类工作便宣告失败。因此，垃圾分类详细程度（分类和投放标准）要与一个国家（地区、城市）居民分类投放能力（国民素质）和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能力相匹配。垃圾分类要做到因地制宜，同时要进行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垃圾分类的效益包括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文已有所提及。而垃圾分类的成本包括：居民对垃圾分类整理和投放的时间成本，社区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的成本（包含监督、指导与管理的人员成本），对垃圾进行分类分装运输的成本，对不同类型垃圾进行不同处理所要耗费的成本。垃圾分类分得越细，其边际成本就越高，而边际收益则越低。日本各城市垃圾分类差异大，某些地区垃圾分类过细，运输资源利用不充分，垃圾焚烧厂过多过密，最终却表现为规模不经济，不值得我们效仿。因此，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确定本地的垃圾分类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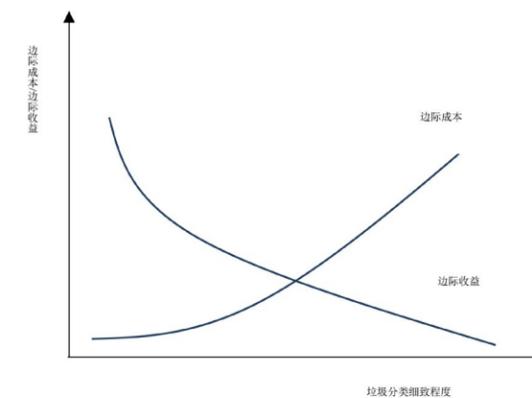


图1 垃圾分类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

4.垃圾分类是否会催生新的产业和职业？

生活垃圾按照新的垃圾管理条例规定，必须更细致更严格地进行分类，并且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必然给一些居民家庭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家政服务、外卖类行业中很可能会催生出新的服务类别，比如专门为居民家庭提供垃圾分类和垃圾投放服务的职业人员。强制垃圾分类制度下，需要专门的群体对居民垃圾投放行为进行监督、指导和管理，短期内这些人员可以由相关职能部门员工和志愿者构成，长期则需要专门的从业者完成这

项工作。教育体系内需要开设垃圾分类的相关课程，需要相关专业的教职人员（环保专业毕业生可能迎来就业的春天）。目前，我国强制垃圾分类制度的试点已经极大地刺激了分类垃圾桶行业、厨余垃圾处理器（粉碎机）行业的发展。我们预计垃圾分类可能引发一波风投和创业小高潮。环保概念产业、互联网和新技术公司纷纷进入垃圾分类市场。比如，垃圾分类App上线，居民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如何对某些垃圾进行分类。支付宝上线了“易代扔”服务，即免费上门回收垃圾，回收成功还能获得环保积分和蚂蚁森林能量。我们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投资于类似于美国的“再生银行（Recycle Bank）”商业模式，从事“垃圾”生意，居民以垃圾换取积分和收入，公司赢得口碑和市场。新技术公司同样可能会在垃圾分类中大有作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望在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理事长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益认为：“未来10年，垃圾分类将新增市场机会4000亿元以上。”

5. 垃圾分类需要怎样的制度保障？

垃圾分类要取得成功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中，垃圾分类全民教育和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至关重要。



垃圾分类（网络图片）

垃圾分类的教育和宣传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国民科学地进行垃圾分类并形成国民观念。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同样孩子也可能反过来影响父母。以日本为例，日本垃圾分类教育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了，小学阶段会有垃圾分类课程，还会被邀请去参观垃圾焚化厂，了解垃圾处理过程的末端。瑞典在学前教育（针对1-5岁的孩子）的课程和活动中就纳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瑞典教育局会为符合环境教育目标的学校颁发“可持续发展卓越证书”（Diploma of Excellence in Sustainability），鼓励学校培养有环境责任意识的下一代，并让孩子起到影响父母的作用。垃圾分类要取得长期成功，中国教育部门应该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课程，并鼓励学校开展垃圾分类等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成为父母的老师，帮助家庭形成环保观念和习惯。

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明确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为垃圾分类的奖惩制度提供依据。作为全球拥有最完备、最详尽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国家，德国联邦和各州目前拥有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高达8000多部。日本从1970年开始通过了《废弃物处理法》，1997年又通过了《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以及1999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责任以及政府长年累月不遗余力的向民众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和法律法规，日本在垃圾分类及处理工作上卓有成效，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循环型社会。近期中国也将全国性立法提上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已经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相继颁布或修订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我们认为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中国有望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中国特色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为全球环保工作做出大国贡献。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10日文章

破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问题，公共服务何日不再短缺？

作者：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子女教育（网络图片）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指出，今后要加快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尤其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这一新闻的报道，牵动着无数城市外来人口的心。因为，前段时间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学到底有多难》的热传文章，恰恰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文中妻子小美自毕业起在京从事互联网行业工作，已有十年之久；而丈夫李强则是海归，自2007年起在京创业，公司至今运转良好。一直以来，夫妻二人虽不是北京户口，也没有在北京买房，以租房为主，但由于收入也算丰沛，日子过得相当舒坦。小美一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到孩子需要“幼升小”的时候才为之打破，因为他们发现，非京籍孩子想在北京上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竟有如此之难。

其实，说难也不难，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各大城市出台了非户籍子女入学政策，来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当地义务教育。倘若非户籍人员在京申请子女入学，需要五证材料，即父母双方居住证（暂住证）、在京就业

务工证明、实际居住证明、在原籍无人监护证明和社保证明，外加一家三口的户口本。理论上说，小美一家符合所有的入学实际条件，但正是卡在证明材料之上，房东不愿意到场证明、公司社保异区缴保不符合规定……最后的最后，无论怎么尝试和努力，小美一家还是错过了孩子入学注册时间，摆在面前的只能是选择带小孩返回户口所在地小学就读。

据说，该文章写于去年，却在今年再一次热传，无疑反映出今天特定群体某种程度上的焦虑，即外来人口子女面临入学难的问题。从程序上讲，随迁子女的入学政策似乎无可非议，否则会衍生出“高考移民”另一类问题。因此，也有观点对小美一家展开了批评。一种观点认为，小美一家过于“佛系”，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准备材料，而非未雨绸缪，是家长不负责任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过去十年北京房价处于“洼地期”的时候，小美一家既不买房也不入户口，还错过了阶层跨越的“上车”机会，怨不得人。

这两种观点看似公允，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把“问题出在自身”，而规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当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与每一个进入城市的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着相当的差距。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16.21%的差距是超过两亿人的城市流动人口。根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者张思思通过2017年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的研究发现，城乡流动人口目前在城市主要住房来源为租房为主，自有房的比例仅有极低。由于获得自有房是流动人口获得城市户籍的重要途径，租房居住无疑限制了他们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小美不过是其中一个不幸的案例。即使在公共财政相较宽裕的大城市，学位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相关资料所显示，小美孩子入学那年，北京该区小学学位空缺数达3900个之多，本地家庭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况不易，遑论非户籍家庭？因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难在公共服务的短缺之上。正是如此，地方政府也只能“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作为基础限定条件，并以程序正当为基准，尽量覆盖到那些合法居住到一定年限、从事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

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阶级“财富、权力与声望”的定义来看，虽然没有买房也没有北京户籍，收入较高的“小美夫妻”们无疑被归类为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但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时刻面临着在中国这辆高速发展的“列车”上掉队之虞。但城市流动人口中，大多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乡流动人口，他们从事着不稳定工作，居住亦不固定（或没有合法证明），在当前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中，更是很难通过积分入户、人才绿卡的形式获得城市户口。如果按照现有的入学政策规定，相当部分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就读的条件并不达标，被城市的义务教育保障体系排除在外，连去申请与尝试的机会亦无。

在既往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务工，投身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二元体制区隔，他们的生产劳动在城市进行，而父母赡养、家庭子女养育等再生产安排却在农村老家进行，待到自身年老，亦返回农村中养老，主要靠流出地政府与自身解决再生产问题。这种生产模式被学界总结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即一个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时空中分离。由于流入地城市不必负担太高的公共服务支出，中国的城市借以“轻负担”，发展速度惊人

并为世界所瞩目，这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初代农民工返乡，固然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文化因素所在，但更多是一种留不下来的无奈选择。而由于制度所限，大量农民工子女亦被迫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父母的赡养仍依靠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并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更为迫切的是，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即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城乡流动人口们，他们的成长经历与父辈有很大的差异，并更习惯于城市生活，随着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在今天逐渐进入婚姻、生育阶段，同样要苦恼于子女上学等等问题。据相关数据测算，在义务教育阶段（6-15岁），全国有3386万的留守和流动儿童，约占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总数的24.18%，其中包括2019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和1367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于“小美们”的城市准/中产阶级而言，尚能通过私立国际小学、甚至移民来解决问题。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之，又有何解之？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是通过大量地处城郊地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但随着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以及客观上的安全隐患、教育质量等限制，近年来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关闭。而另一方面，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对于人口总量的规划红线下，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日发严格，生活成本也日益高涨。这也是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在《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一书中所表明，城市对人口的“吸纳与驱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驱动的新机制。在这一背景下，相当一部分的流动人口注定很难融入城市，只能在当前城市中扮演一个暂住者的身份，或者选择到急需人口流入的二三线城市中成为“新市民”。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进步固然可见，但需要更快一些。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城市化是市场良性发育的结果，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前者要求一个要素充分流动的地理社会空间，而后者则仅仅有选择性地某些群体纳入或排斥。因此，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治理与发展思路，尤其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上。法国著名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7年书写的《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开启了城市地理批判研究的先河，他提出了三组命题至今依然在当代全球化下各大城市具有紧迫性：城市是谁的城市？我们应有何种城市权利？应如何实践这一权利？列斐伏尔令人发醒地写道：“城市权利本身就标示着一种处于首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中人有个性化的权利，有居住地和主动去居

住的权利，进入城市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这是城市权利的内在要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亦指出：“城市权利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体的或群体的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人口，还是本地城镇人口，当他们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他们都应该获得相同的城市权利与市民待遇，并要求拥有更为广泛性的城市实践能力。

共享改革红利与城市生活的普惠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努力。笔者认为，当前破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问题，急需破除的是教育服务的短缺现象。中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教育公共服务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根本之路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加大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供给，笔者亦就此尝试给出三组具体治理思路：

第一，由于改革是系统性工程，因此要做好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例如，当前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难题在于，如何在地方财政有限预算下“做大文章”。如果要放宽流动人口子女在当地入学限制，必然增加地方公立教育系统学位供应，也势必要求提高财政预算与增加教职岗人员编制，这与当前“严控编制”的机构改革思路有所冲突。如何把财政、编制用于真正所需的扩充教育事业上，做到“财事统一”、“人财挂钩”，在要求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亦给与更多的财政保障。需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顶层设计、精准财政转移力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亦要有“螺丝里做道场”的改革勇气，敢闯先行，挖掘现有教育资源的已有存量，做好针对随迁子女学位供给的增量。

第二，统一居民信息数据库，破除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管理系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国地方治理特点是以部门间的条条块块为主要特征，亦称为“条块分割”与“九龙治水”。由于部门、系统间的信息、数据库并不连通，无形中增加了沟通成本，也导致了信息处理的低效率与拖沓。例如在当前普遍实行的积分入学制度上，家长需要收集、整理与填报大量材料，既是负担，对部分家长而言也有难度。在当前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大背景下，推动各部门间的居民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融合，让家长汇总材料“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并非无稽之谈，从而打通公共服务信息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才是提升居民在相关问题上获得感的重要指标。

第三，建立以数据为驱动的公共政策决策路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除了是财政约束、组织程序等现实问题，前期的规划与预测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与结构性决定了地方政府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投入上的异质化。更何况是流动人口的自身职业与生活特点，决定了对相应教育资源的配置，可能会导致地方教育系统面临学位不足，也可能是招生不足的问题。因此，加强教育资源的公共投入绝非“拍脑袋”工程，而需要打造以数据为驱动的公共政策决策路径。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数据科学、社会调查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调查、社会行为仿真模拟与实际社会情况的拟合程度较高。决策部门大可以借助数据科学技术来模拟预测城市的人口结构与公共服务需求，并依托地方高校、智库、调查中心来开展相关研究、预测、调查工作。

总而言之，无论是呼吁一种城市权利的反思，还是新时期下的社会矛盾特征的展现，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历史欠账绝不能拖延下去。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亦不可持续，不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这一现状迫切地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施政者的科学施政与决策艺术，而归根到底，是有无“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本心。人心向背，自然会“用脚投票”，在《非京籍孩子上学到底有多难》一文中，作为中产阶级的小美一家最终选择了移民，而对于数千万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18日文章

【澎湃新闻】全球变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

作者：邱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大暑已至，热浪正浓。

气候变化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更频繁、持续更久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7月初，我国华北、黄淮多地出现高温天气。6月底，欧洲也遭遇热浪袭击，多国高温打破历史记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一直处于线性上升趋势（图1）。2018年，我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中央气象台首次连发了33天的高温预警。从全球尺度来看，2015~2018年也是地球有记载以来气温最高的四年（图2）。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高温天气将趋于常态化，极端高温的范围将扩大，发生频率加快；强降水事件也将增多、增强。面对更热、更涝的未来，社会需要了解极端天气的各方面影响，以便更有效地降低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尤其高温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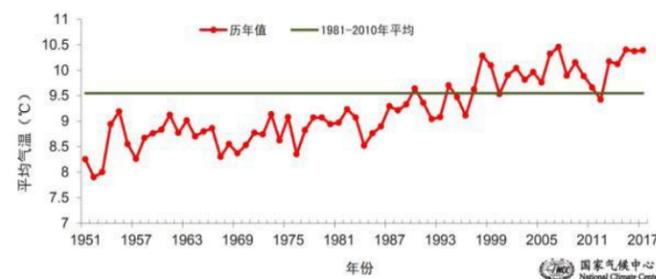


图1：1951-2017年全国年平均气温历年变化（单位：℃）

来源：2017年中国气候公报

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存在巨大威胁。基于我国2004~2012年死亡率数据的一项研究显示，极端高温使得我国人口死亡率显著上升，且影响系数是基于美国数据估计值的3倍。另一方面，职业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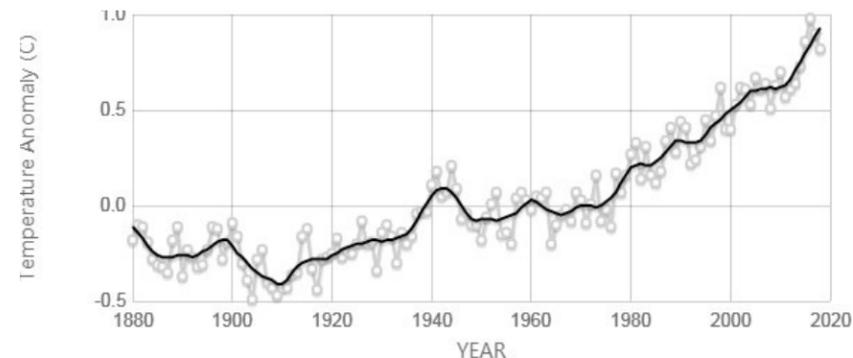


图2：1880-2018年全球（地表温度-1951至1980年地表温度平均值）

Source: climate.nasa.gov

是公共健康的重要方面，但气候变化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尚未得到普遍关注。降低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对于保障我国高质量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高温不仅能降低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更有可能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造成显著不同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比如农村居民）更可能在缺乏适应性设施的环境下生活，因此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联合国的一项报告已经指出，气候变化对贫穷和弱势群体造成的影响最大，气候灾害风险正在加剧业已存在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现象。若不加以有效的干预，将难以提高社会整体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笔者的一项跨学科研究利用了2010年至2016年中国职业射箭运动员的竞赛成绩数据，估计了温度与室外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室外射箭是一项对运动员的体力要求相对较低但对精神集中度的要求颇高的运动，因此研究结果适合推广到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脑力活动的室外工作。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与18-22℃的舒适温度区间相比，当热度指数超过34℃时，运动员的成绩显著降低了11%。高温对较难的比赛以及女性、工作经验较少的人群存在显著更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高温对过去的的成绩或排名较差的运动员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当热度指数超过34℃时，排名前25%的选手成绩比排名后25%的选手受到的负面影响要低62%。因此，高温不仅能大幅降低室外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还会使得位于劳动生产率两端的人群的差距变得更大。

该研究也发现，积累工作经验可以较容易地降低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并且，虽然短期中的高温经历并不能降低当前高温的负面影响，但与北方地区相

比，来自南方地区的选手确实受到高温较少的影响，这说明人体对高温的适应在较长的时间段中才能显现出来。

基于美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数据的研究也证实，极端高温会大幅降低劳动生产率。印度统计研究院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在舒适区间以上，温度每上升1℃，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下降2%~4%。高温在许多维度上都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比如，与炎热地区相比，高温对寒冷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较大；与当地相比，高温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与环境暴露较多的行业相比，高温对环境暴露较少的行业的工资有较小的负面影响。学术研究似乎印证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对极端天气的部分适应在长期中是可以培养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反复的经历中积累了应对大自然的智慧。

但是，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的频率，而已有的适应性策略大多基于过去的环境，未能充分考虑未来气候发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然而，气候变化正在使得极端天气的范围从零星分布走向区域化甚至整体化。比如，历史上的气候差异导致南方地区的空调普及率远高于北方地区，但2018年夏季吉林、辽宁等北方省份比南方地区经历了更严重的极端高温，类似的现象在欧洲多国也存在。若不加以有效的信息干预，人们未必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极端天气的措施，导致极端天气暴露，健康和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乃至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将有所上升。高温预警的意义正在于及时为大众提供应对高温的信息。但是，根据北京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项研究，当热浪来临时，虽然城市地区的空调购买量显著上升，但农村地区的空调购买量和能源消耗都保持不变，这说明农村地区可能没有在积极应对高温，农村居民可能受到高温更大的负面影响。探索哪种干预方式能帮助弱势和适应行为较缺乏的群体改善适应行为，是急需思考的问题。

图3: 2015年7月14日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首次在广州塔LED显示屏上发布

来源: 广州市气象台



只有充分重视和了解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才能全面有效地提高职业人群的气候变化应变能力,降低气候变化相关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根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我国仍有37%的城市人口和超过80%的农村人口在室外或者缺少温度调节设施的环境下工作。虽然空调和电扇可以帮助保持较舒适的室内工作环境,这些外部气候调节措施对绝大多数室外工作来说并不适用。针对这些职业工作人群,发现气候敏感人群,将适应资源和投入优先用于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优先满足其基本需求并提升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高温对哪些类型的工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较多的未解之谜。体力劳动者受到高温较大的负面影响似乎不足为奇,但生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发现,高温对需要较多注意力、精神运动、感知能力和数学推理能力的工作有更大的影响。笔者的跨学科研究发掘了一项对工作人员的体力要求不高但对精神集中度要求颇高的室外工作场景,我们对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的估计值,恰好印证了其他学科在不同实验场景下的发现。有趣的是,即使是室内的脑力工作,高温也能影响工作结果。比如,一项基于美国移民法庭判决数据的研究显示,即使法官的工作环境非常舒适,高温仍能显著影响法官的判决结果。这说明,针对室内工作,使用空调等有助于降温消暑的电器也未必能完全抵消高温对劳动者的影响。

在帮助工作人群更好地适应高温方面,高温预警、高温补贴等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更广泛地来看,修复湿地、扩大绿植面积,乃至海绵城市的建设,也有助于降低城市热岛效应,进而降低热浪对工作人群的影响。但人们必须认识到,极端天气正在变得更频繁,且可能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主动地获取相关信息、采取预防措施,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必要。

“适应气候变化需要人们认识到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相信另外一种行为比他们本来的行为方式要更好,并且有能力去实施他们相信的较好的行为。”斯坦福大学的Burke教授和塔夫茨大学的Emerick教授如是说。改变行为或许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认识和求证问题的存在就在当下。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 2016: 《201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气候变化应变能力——减少不平等的机会》。
2. Qiu, Yun, and Zhao, Jinhua, 2019. Too hot to focus: the mean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heat. Working paper.
3. Yu, X., Lei, X. and Wang, M., 2019. Temperature effects on mortality and household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 Somanathan, E., Somanathan, Rohini, Sudarshan, Anant, and Tewari, Meenu, 2018. The impact of temperature on productivity and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Working paper.
5. Heyes, A. and Saberian, S., 2019. Temperature and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207,000 court cas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2), pp.238-65.
6. Burke, M. and Emerick, K., 2016.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US agricultu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8(3), pp.106-40.

本文首发自澎湃新闻以及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25日文章

以功能性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 江飞涛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晓萍 (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苏应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制造业 (网络图片)

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加快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品质量与品质、推动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政策。本文将介绍构建功能性产业政策所需遵循的原则以及如何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

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

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加快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品质量与品质、推动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发挥健全市场制度,构

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在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协调供需平衡化解过剩产能、激励企业不断提升效率与积极创新、不断揭示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与此同时,还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新技术扩散的制度基础与市场环境。

功能性产业政策正符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在需要。功能型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提供完善的制度基础,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转的各项制度,建立开放、公平的竞争市场体系,培养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功能型产业政策尤为注重促进企业创新与能力建设,强调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与市场环境,构建科技信息共享

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科技成果评估与交易平台、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等科技服务公共平台，构建创新活动的普遍性支持，促进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效率与国际竞争力。因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转为实施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

二、构建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所需遵循的原则

构建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应与竞争政策相容、互补与协同。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均是促进产业发展与竞争力提升进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中，竞争政策居于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必须服从竞争政策，遵循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政策工具方面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务性的政策工具。例如，科技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科学研究及通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等，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会对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即便是促进创新与研发活动的补贴，也主要是以普惠的形式发放，主要针对竞争前的技术研发环节。

构筑和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应尤为重视激励与促进创新。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也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所带来挑战的关键所在。必须加快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制度体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为科技服务机构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政策。在促进创新时，政府还应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积极支持科学研究与通用技术研究，并提高公共科技投入的效率，加强国家共性技术公共研究平台、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与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构建多层次的创新人才与产业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功能性产业政策时，还应重视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指所有人都可公平地参与产业发展，并分享由此带来的繁荣和利益。包容性发展倡导的是机会平等，这首先有赖于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的建立，让各收入阶层的人们可以凭借自身努力，相对公平而充分地参与到制造业发展中来，并分享发展成果。在推动产业包容性发展时，需高度重视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升，尤其要

重视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获取新的工作技能以适应新技术与新产业的发展。此外，还应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为创造更多新工作岗位，特别是高质量工作岗位进行投资。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效率，另一方面有助于劳动者更多分享制造业发展的红利。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和稳定性，促进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

高度重视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协调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两者之间的协同。这需要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倡使用新能源、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创新及其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强化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将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实现绿色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重要领域。

三、如何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产业治理体系，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一是构建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体制，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减少不必要的准入条件，建立开放、透明、科学的负面清单制定与调整机制。二是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公平市场准入，公平企业权利与责任。三是以法治为基础建立现代产业监管体系。要在保障契约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审查、反行政垄断、环境保护等领域补充完善相关制度，并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力度，完善相应法律的执法体系，以此加强对于企业缺乏诚信、损害消费者权益、侵犯知识产权、污染环境以及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监管。

构建完备的科技创新与技术扩散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布局和建立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的、任务导向、长周期研究项目使命的国家实验室。二是建议重点借鉴德国和中国台湾工研院的成熟经验，吸收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或者制造业创新中心与网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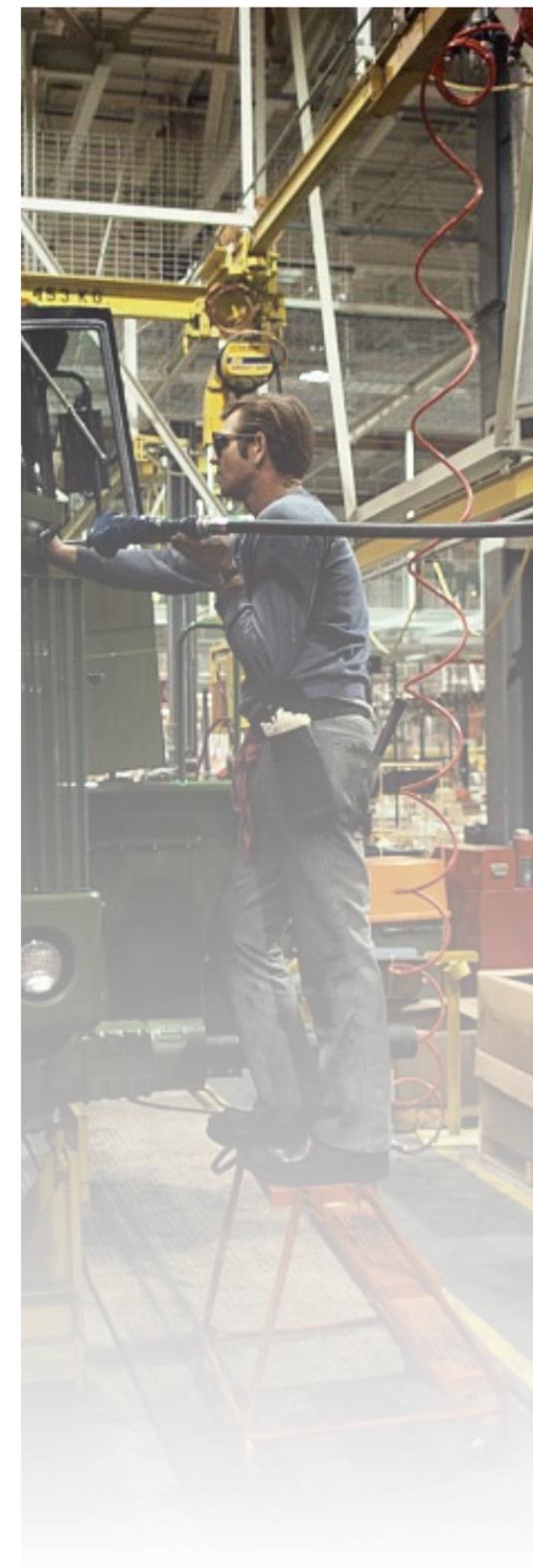
是建立全国性技术转移平台，促进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扩散。四是构建更加符合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要求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跨领域创新过程中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技术平台。

培养多层次高质量人才。培养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既是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创造高质量就业、帮助劳动者更多分享产业发展成果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构建多层次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需要培养实用型创新人才、高素质技能型技术工人以及与先进制造相适应的高级工程师与知识型员工。

优化环境保护政策、协调环境保护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通过绿色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及执行机制，逐步提高能耗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的提高需要有严格的时间表，在什么时间内要求达到什么标准要有严格的时间表，给企业以稳定的政策预期，完善促进绿色发展财政与税收政策。同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

推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企业融入全球创新链。积极支持企业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探索外汇管理方式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7月26日文章



降息渐成不可持续货币政策

作者：李润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货币 (网络图片)

政治动荡，复苏疲弱，全球降息。欧元区继续维持低水平基准利率。美联储宣布降息 25 个基点。

然而，无论市场之后表现又如何，联储的货币政策已不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良方，相反，会为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看一下联邦基金利率的时间序列（图 1）便知，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这一基准利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期间，尽管美联储多次采取加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利息升幅越来越小，下限越来越低。

2003-2006 年，美联储还能够在三年之内将利率提升至 5% 以上以应对房地产泡沫，而自货币政策正常化至于今日四年来，在 2.5% 的利率水平上，政客和市场已感到不适。一方面，特朗普频频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联储主席，要求降息。这当然主要是为了自己任内有好的经济表现，为连任增加筹码，一旦成功，将造成“政治商业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另一方面，市场确实发出了危机前的信号——收益率曲线再次倒挂。如图 2 所示，10 年期与 3 月期美债的到期收益率利差近期已成负数，与上次金融危机前的情况类似，而收益率倒挂经常被视为危机的前兆。以银行业为例，对于资产

负债表为短期负债长期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而言，收益率倒挂意味着银行单位美元利息支出大于利息收入，影响银行可持续经营，而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其风险关乎全局。

为何在相对过去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上美联储就遭降息压力？原因很明显：金融体系对利息提高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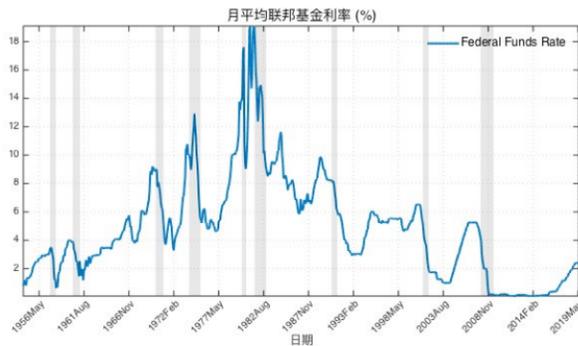


图1 月平均联邦基金利率（1954年7月-2019年6月）

数据来源：美联储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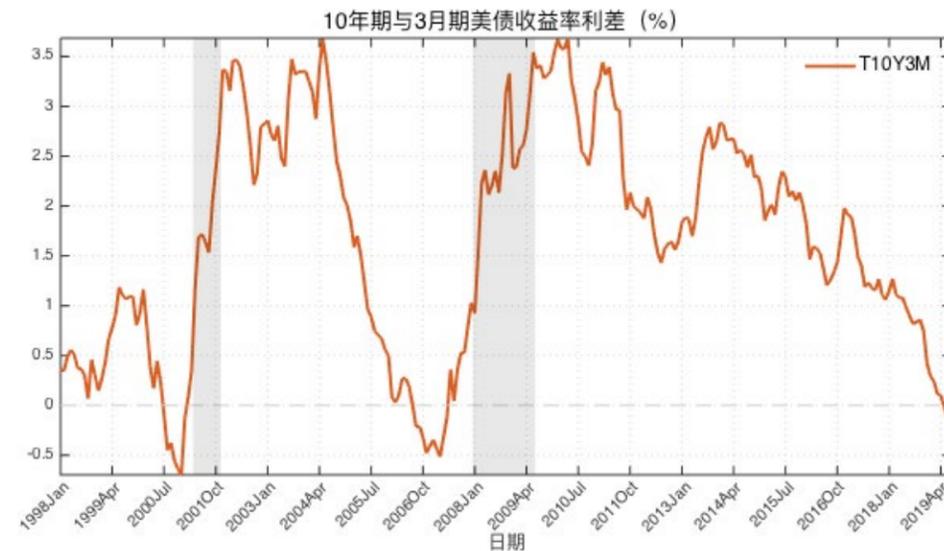


图2 美债收益率利差（1998年1月-2019年7月）

数据来源：美联储网站

低息的利弊

所谓降息，通常是指央行通过购买银行持有的短期政府债券的方式释放流动性，降低银行间的借贷成本，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和利率水平，属于常规的货币政策。低利息意味着借款人到期可以偿还更少的利息，或同样的成本可以借到更多资金，因此能够刺激政府发行债券、公司借贷及各种投资活动。同时，低息使得储蓄的机会成本提高，居民倾向于减少存款，增加消费。而且，货币贬值，利于出口。如此看来，总产出恒等式中的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及净出口（NX）都可以增加，一举多得，经济境况因而改善。

于是，仅从数量上看，低息益处多多。然而，同样在数量上，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引发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波动等弊端。如果从结构上看，低息会带来诸多风险。首先，低息便利了政府借债，而政府购买什么的问题同样重要。如果美国政府将投资用于低效甚至有害的项目，如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颠覆政权的“颜色革命”，支持反对派，则会给全球安全带来更大危害。第二，如果投资不能进入制造业而进入投机领域，则投资效率低。历年来的事例表明，一旦国家开启宽松的货币环境，资本的第一个去向是股市和房地产，而不是支持高科技行业和民生改善。金融危机后，恢复最快的是美国的股票指数，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第三，低息促进企业与居民杠杆率的提升，埋下债务风险隐患。

长期结构性问题

承上所述，若以长期视角审视低息政策，即可判断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越来越难以承受更高利率所带来的挑战。以银行体系为例，虽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获得更多超额准备金，但低息环境阻碍银行对贷款收取更高利息。因为一家银行收取高息，其他银行可以以低息吸引客户，竞争的结果导致普遍低利率。银行为自身生存从而需要寻找高风险客户。

这一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长此以往，银行积累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不利于可持续经营，且使得银行对利息升高、货币供给紧缩变得更加敏感。学者 Jimenez 等（2014）对西班牙银行的研究和 Dell' ariccia 等（2017）对美国银行的研究，都表明低息货币政策诱导银行向高风险公司借款，或允许公司以更少的抵押物借得更多的资金。

美联储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如今利息易降难升的原因之一。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为拯救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大量购买长期债券，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流动性，这一举动被称为“量化宽松”，属于“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使得长期债券价格升高、利率降低，缓解了金融机构资金紧缺的危机。但过低的长期利率却带来本文所说的问题：长短期债券利差收窄，一旦短期利率上升，其超过长期利率的可能性要比以往历史时期都要大。结合图 1 和图 2 可知，尽管现在的短期利率只有 2.5%，但收益率曲线已经反转，说明长期债券收益率很低。收益率曲线的轻易倒挂表明了金融体系的脆弱。

采用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既得利益者尾大不掉是金融体系安于低息环境的重要因素。政府和金融行业处于社会分层的顶端，是宽松货币环境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低息以及宽松的货币环境意味着通货膨胀，只要不发展为恶性通胀，就可以减少政府发债成本且不妨碍经济秩序，政府得以扩大开支。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环境便利金融行业运用资金获取收益，在经济景气时期，投资、企业并购、融资活动频繁，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有利可图。总之，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只能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而不能变为通货紧缩，利率水平也必然呈降低趋势。

全球降息亦遵循如上逻辑，是各国互动的结果。首先看一下美联储降息的后果。联储降息导致资金流入其他经济体，促进了投资，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进一步激发了投资的动力，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是，这样繁荣是暂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不是来自本国人民的劳动与技术的进步，而是资本流动的结果。资本的流入能够带来资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比如，一旦美联储加息、或接受投资国经济增速放缓、或出现地区动荡，投资将会转移至其他地区。泡沫风险的典型案例是80年代末期日本的房地产，债务风险的案例是拉丁美洲频繁遭受的债务危机（即当外来投资减少时，无法借新债换旧债，居民企业银行政府皆资不抵债），此过程已为中国民众所熟知，又称“薅羊毛”。此外，美元的过多发行可能使他国货币升值，弱化一国出口竞争力。

为缓解这些冲击，他国央行往往同样采取降息政策。这是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结果，不以人主观愿望为转移。近半年来各国央行的举措被称为“全球降息潮”。其实，从长期看，世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降息。图3的国家层面银行贷款利率显示出此次降息潮仍属于近四十年来的系统性降息大潮。原因为何？除却各国为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内因素外，还有各国为稳定贸易而采取的竞相宽松竞相贬值的外部因素。各国的互动强化了低息、流动性过剩的环境。

其实，一国单独行动与各国协同的矛盾始终没有改变。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75周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一次以加强各国货币财政政策协同为目的的会议，使世界秩序更加公平。它创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负责宏观领域的危机救助和微观领域的消减贫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黄金、美元及他国货币挂钩的制度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促进了战后贸易复苏。然而，出于冷战的政治原因，美国接连在亚太地区发动战争。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国力及美元的信誉。此时，美国

的最优选择就是与黄金脱钩和使美元贬值以减轻债务压力、维持出口竞争力。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来，美元兑各国汇率变为浮动。

美国之所以能轻易贬值、各国之所以能竞相降息，根源还在于当前的法定货币体系。法定货币（fiat money）是信用货币，不存在内在价值，各国很难确定发行数量，并非简单地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就可以解决。传统教科书说法定货币不以实物为锚而以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锚。是很牵强的。而根据之前所述，各国政府是有发行货币的冲动的，美国尤甚。这就造成了各国竞相降息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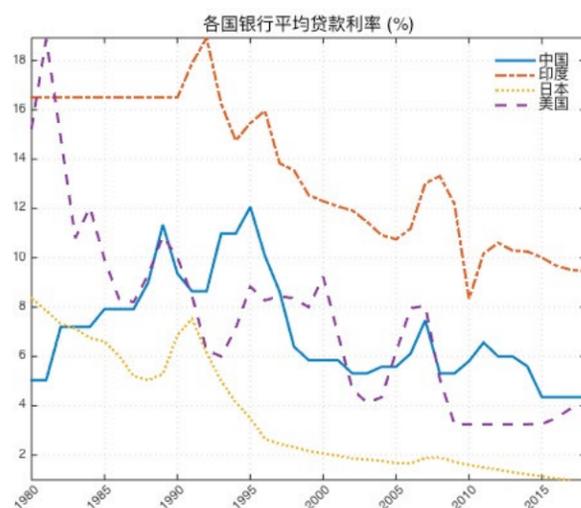


图3 各国银行贷款利率（1980年-2018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中国的应对与全球的协调

央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早已成为各界共识。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很多。首先一点值得注意。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为银行体系提供了大量流动性，至今大多数流动性仍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留存于银行系统内，如图4所示。华尔街将如何配置这些资金？当前，我国开放金融业，既有内部改革的动力，也有外部的压力。正如国家领导人所说：越是放开、推向市场，越要加强监管。在目前政治经济形势下，金融业对外开放需更为严格地监测并管理资本流动。

其二，通过“一带一路”稳定能源供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对能源价格具有直接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对能源的需求，引起能源涨价。近期，美国试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与伊朗剑拔弩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出现安全问题，使能源供给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其莫须有地挑起新疆宗教问题，意在破坏“一带一路”安全，扰乱中国与俄罗斯及西亚国家经贸往来。不久前，中国加强了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这有利于能源的长期稳定供给。

其三，建立统一战线，同时辩证看待美元。当前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家间互动形成的一般均衡的一个方面。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使美联储政策对他国的负外部性明显，尤其在当前特朗普战略退群、“美国优先”的政策下，其弊端更为凸显，总之，美元地位的削弱符合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使用美元是各国共同选择的结果，尽管很多时候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旧体制的退出又面临斗争的长期性。“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无论是提高人民币适用范围，还是使用世界性区域性货币，都应当注重建立制度，包括文化认可，而不是因袭旧的霸权模式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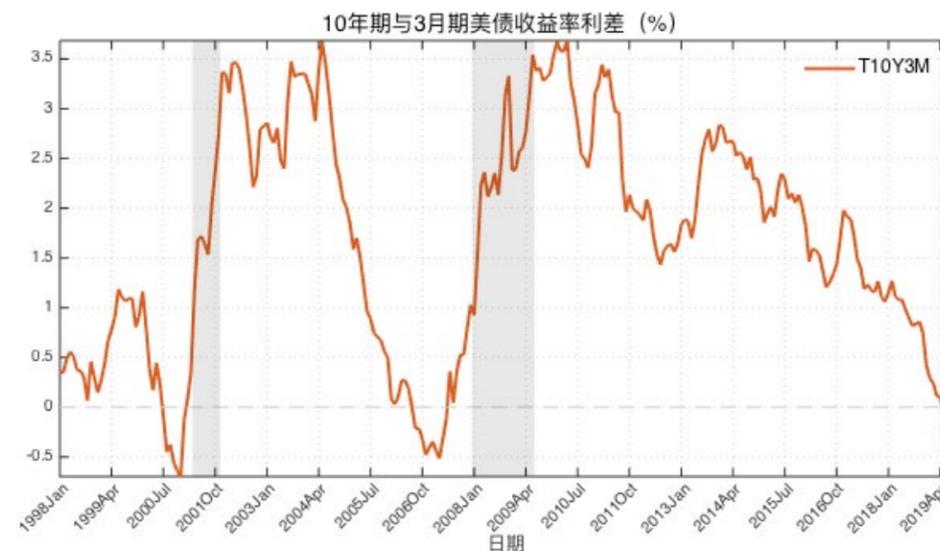


图4 美联储基础货币供给（2003年1月-2019年6月）

数据来源：美联储网站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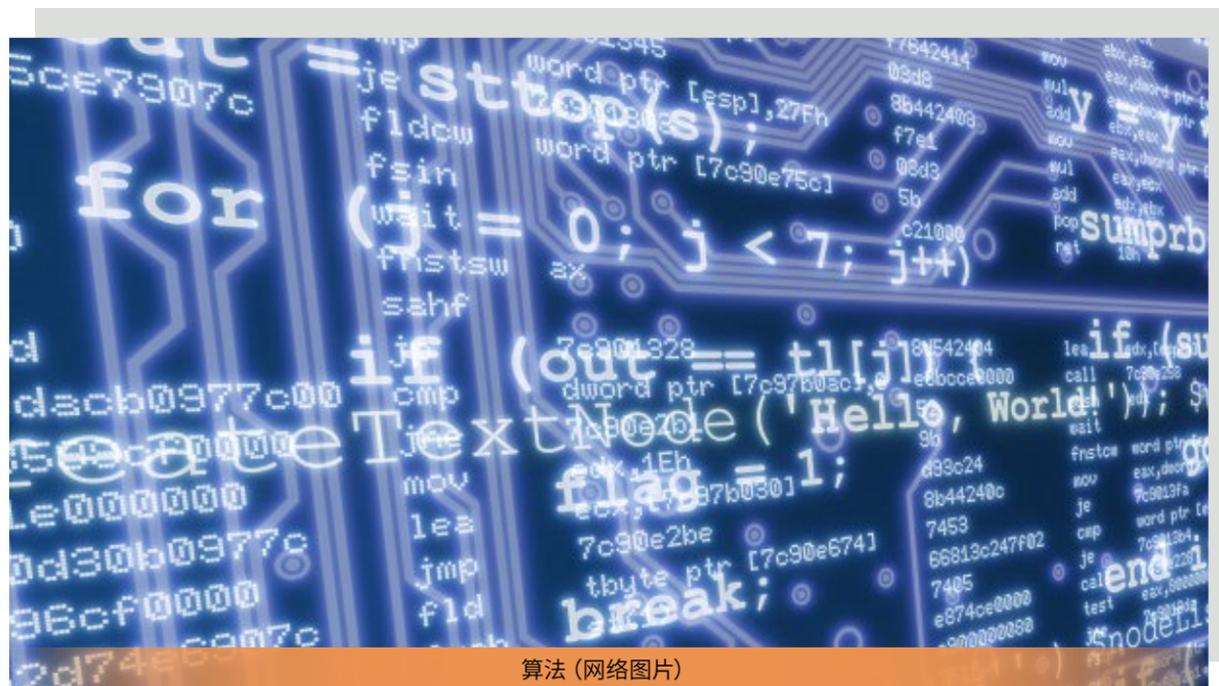
布雷顿森林会议已过七十五周年。过去，世界所经历的概括起来就是对“非常规”变得习以为常。十年前，量化宽松被称为非常规政策，今后，当利率降无可降时，人们是否会惯看货币当局发明的各种宽松？

世界并不太平。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其制度、文化、国际体系根源。因此，解决经济深层次问题，需要国家合作，其中不仅仅有货币政策，也不仅仅有经济政策。主要矛盾在于延续旧逻辑，听任分化，饮鸩止渴，纵容资本，煽动暴戾，直至同归于尽，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减小差距，消除偏执，遏制剥削，尊重自然，实现大同。这条道路是曲折的。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8月3日文章

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监管需警惕算法合谋风险

作者：刘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算法（网络图片）

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的高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反垄断监管面临新的挑战。企业合谋的形式正在由传统意义上的“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沟通和制定协议转变为通过复杂的算法对价格进行监控和调节。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和案例实践，介绍算法合谋的定义、类型、算法对合谋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什么是算法合谋

算法，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按照一定顺序执行的规则的连续序列。算法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金融、航空、食品零售和电子商务等行业算法定价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算法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某些算法甚至可以在不需要任何外界引导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实验和学习过程，从而适应变化的环境。算法的普及固然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但学术界和反垄断监管部门认为算法可能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促进企业间的合谋，从而降低市场的竞争程度，造成效率损失。例如，2015年时任美国司法部助理检察长的 Bill Baer 提出，“我们不会容

忍反竞争的行为，不论其发生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还是通过复杂的价格算法发生在互联网上”；2017年6月OECD竞争委员会组织了以“算法与合谋”为主题的圆桌论坛；竞争法国际协会（ASCOLA）2017年6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年会上，人工智能算法相关的反垄断法问题也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算法合谋这种新的合谋形式在责任认定、算法监控和法律执行等方面对反垄断法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搞清楚什么是算法合谋，有必要理解什么是合谋。以价格合谋为例，从结果来看，合谋中的企业通过收取高于竞争性水平的价格，获得更高的产业利润，并降低消费者福利和市场效率。那么，从过程来看，企业如何维持合谋的稳定性？假定不同企业生产的商品是同质的，当市场上的企业都将价格固定在竞争性的水平上，任何一家企业都没有激励去收取高于竞争性水平的价格，因为这只会降低其获得的利润。然而，当每家企业都预期其他企业的定价会高于竞争性价格时，对它自己而言提高价格也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为了形成这种预期，企业需要制定一种存在“奖励”和“惩罚”机制的策略。例

如，考虑以下策略：企业的初始定价高于竞争性水平，而在未来的任何时期，该企业的定价取决于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历史定价。具体而言，如果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历史定价都不低于该企业的初始价格，则该企业维持这一初始价格；如果在过去某一时期曾有企业的定价低于这一初始价格，则该企业将价格降低至竞争性水平。如果市场上所有企业都采用这一策略，那么结果就是所有企业的定价都将高于竞争性水平。虽然任何一家企业都有动机去私自背离合谋，即通过降价以获得暂时性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维持高价却可能更符合其长期利益。这是由于，企业预期到它当前的定价会影响到未来其他企业的定价和本企业的利润，即维持高价会在未来得到“奖励”（其他企业继续维持高价），而降低价格会在未来得到“惩罚”（价格战）。

算法合谋有哪些类型

根据算法在合谋中起到的作用，可以将算法合谋分为四种模式：信使模式、轴辐模式、可预测代理人模式以及电子眼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中，算法的作用依次增强，而人类的作用依次减弱。

信使模式 (Messenger)：算法只是人类实施合谋的媒介，人类才是合谋真正的设计者。算法在使合谋协议生效以及对合谋协议背离的监控和惩罚过程中只起到信使的作用。例如，2015年 Topkins 被指控和其他竞争者达成协议在亚马逊网上交易平台上提高并维持某些海报的定价。为了实施这一协议，合谋者同意在海报的销售过程中采用某些特定的定价算法，从而对各自价格的变化进行协调。

轴辐模式 (Hub and Spoke)：企业使用单一或相同的算法来进行市场决策。合谋的结果并非是由于企业达成固定价格的协议，而是由于企业同意使用相同的算法。这种模式可以通过不同企业使用相同的第三方定价算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大多数企业模仿某一行业领导者的定价算法来实现。例如，在 Uber 等网约车平台上，司机不会和乘客进行直接议价，而是使用 Uber 规定的定价算法达成合谋，而这种算法模拟的价格往往高于市场的真实价格。和信使模式一样，轴辐模式只是应用了新技术的传统合谋形式。

可预测代理人模式 (Predictable Agent)：每家企业独立开发和使用权算法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和预测行为，在某些市场条件下，不同企业的算法可以达成默契合谋。和

之前两种模式不同，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并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明显的将价格固定在某一水平的意愿。每家企业只是出于自身利益开发和依赖于算法，而这会改变某些市场特征，使得企业之间的默契合谋变得更为容易。由于默契合谋不需要企业之间的沟通，各国的反垄断法往往并不认为此类行为是违法的，尽管默契合谋和明示合谋一样会造成不合人意的市场结果。

电子眼模式 (Digital Eye)：算法的开发者可能没有达成默契合谋的意愿，也无法预测算法是否会导致合谋，而是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在这一模式中，算法可能只是被设定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们通过自主学习和实验来寻求最优的市场策略，从而达成这一目标。和可预测代理人模式一样，电子眼模式不需要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且人的主观作用接近于零。

算法会促进合谋吗

人们往往可以接受人类以算法为媒介达成合谋协议或者通过采用相同算法达成轴辐合谋的可能性，但对于不以合谋为明确目标而设计的算法能通过自主学习来最终实现合谋的结果，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例如，Salcedo (2018) 认为，如果企业能对彼此使用的算法进行解码，且改变算法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合谋将是必然的市场结果。实验研究方面，Calvano et al.(2018) 和 Klein (2018) 的研究表明，简单的算法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达成合谋，即收取高于竞争性水平的价格。

那么，算法是否会促进合谋？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算法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企业的互动频率。根据经济学理论，合谋的稳定性取决于企业是否有激励通过降价和扩大产量等方式背离合谋协议。更为透明的市场，可以使企业更容易监督彼此是否背离合谋协议，而高互动频率可以使企业更迅速的报复和惩罚这种背离行为。

第二，算法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通常来说，合谋的形成需要解决企业内部的代理人问题。例如，企业的拥有者无法确定管理者是否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企业的不同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等。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内部员工对合谋的参与程度，使合谋被告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三，算法可以避免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尽管人类的非理性可能体现在算法的开发阶段，但在算法的执行阶段，企业不必担心算法由于担心合谋行为被发现而被监管当局惩罚所带来的恐惧，也不必担心算法在进行价格协调时由于愤怒所导致的过度反应。同时，算法可以避免人类对未来利润的过度折旧，从而提高合谋的稳定性。

第四，算法降低了需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能有效监督彼此是否有背离合谋协议的行为。以价格合谋为例，假定每家企业无法观察到其他企业的历史定价，而只能从销量来推断其他企业是否有背离合谋协议。然而，低销量的原因既有可能是其他企业私自降价，也有可能是行业总需求的下降。如果企业能完美的确定需求，就能完美的从销量推断其他企业的历史定价，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惩罚。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合谋。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算法可以降低进入和退出壁垒。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潜在的市场进入者更容易观察到市场价格和获得超额利润的潜力，从而找到有利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更为迅速和低成本地进入市场，并在需要大幅降价的时期（如价格战或需求不景气）离开市场。进入壁垒降低使得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增加，退出壁垒降低使得对背离合谋协议的企业惩罚力度降低，这两者都会降低合谋的稳定性。

第二，算法增加了企业合谋需要协调的维度或变量。例如，网络交易平台上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消费者的反馈和评分，而企业可以通过提交虚假的反馈来操纵自己和其他企业的消费者评分。在这种框架下，企业的合谋不仅要考虑固定价格或产量，也要考虑每家企业如何选择对自己或其他企业提交虚假的反馈（例如，增加积极的反馈和减少消极的反馈以增加行业总需求）。然而，由于反馈是匿名的，即使企业知道某一条反馈是虚假的，也很难知道这条反馈是由哪一家企业提交的。这使得企业有另外一种更为安全的方法背离合谋协议，从而降低了合谋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使企业有可能通过获得消费者的信息从而对不同消费者实行个性化定价，从而最大化的剥削消费者剩余，但同时企业在合谋中需要协调的变量几乎是无限的，这大大增加了合谋策略的复杂性。

第三，算法降低了需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有能力挑选背离合谋协议的最佳时机。假定企业能完美的预测需求的波动，则每家企业在需求较为景气的时期有更大的激励去背离合谋协议。这是由于，企业在当期能够获得的利润相对于损失的未来自未来的平均利润更高。

算法合谋的应对

第一，加强反垄断法对默契合谋的重视。现有的反垄断法只认定存在相关合谋协议或沟通的明示合谋是违法，但对于默契合谋的监管存在空白。然而，可预测代理人模式和电子眼模式的算法合谋都是默契合谋，需要有法律依据对其进行责任认定。一种解决方案是判定企业是否有一些可能有利于合谋稳定但可避免的行为出现，而这些行为可以作为合谋的依据。

第二，通过事前审核，禁止企业使用那些可能造成合谋结果的算法。和人类间的合谋不同，算法合谋所使用的策略往往可以通过算法的程序代码观察到。因此，可以直接通过检查算法的程序代码来确定其是否应该被禁止使用。同时，可以通过输入数据到算法中并监控算法导致的市场结果来决定该算法是否有反竞争的性质。理想的情况是，所有促进合谋的算法都得到禁止，而所有提高市场效率的算法都能够使用。

第三，使用自动化和辅助消费决策的消费算法，实现“用算法击败算法”。这种消费算法可以自动识别需求，搜寻最优的交易机会，并代替消费者执行交易。由于消费算法集中了大量消费者的决策，市场上的交易频率降低，形成一定的买方势力，从而使企业有更大的激励背离合谋协议。同时，当消费算法假定企业有合谋的嫌疑时，可以拒绝消费或改变购买策略。

第四，在保持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透明度的前提下，降低企业间的市场透明度和企业调节价格的速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鼓励企业和消费者进行秘密的交流。政府可以禁止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价格，但允许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价。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8月7日文章

共享单车能走多远？

作者：林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共享单车（网络图片）

走在广州城市街头，我们可以看见人们骑着新投放的共享单车匆匆而过的身影，以及路边鳞次栉比地摆放着的各色新旧共享单车。一波又一波出现的新共享单车到底能走多远？

共享单车的前世今生

共享单车的发展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模式。由于商品的同质性，新投放的共享单车对市场上已经存在的旧共享单车有很强的挤出效应。共享单车曾经的双巨头是 ofo 小黄车和摩拜单车。最早一批投放的 ofo 小黄车如今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昔日，ofo 小黄车起家于 2015 年投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 2000 辆共享单车。之后的 2016 年和 2017 年，ofo 小黄车走出校园疯狂扩张，在全球 4 个国家 100 多座城市提供共享单车服务。（刘润，2018）2018 年，疯狂的扩张出现颓势，ofo 小黄车陆续从各个市场中退出。导致 ofo 小黄车退出市场的，除了有新的共享单车的进入市场，还有 ofo 小黄车自身资本的运营不善。资本运营不善在于 ofo 小黄车对用户

收取押金。而押金是一人一押，而非一车一押，导致押金多于共享单车公司的实际资产。为了快速地发展，ofo 小黄车挪用了押金，造成用户“挤兑”而破产。（刘润，2018）而一开始就把目标定位在商用共享单车的摩拜共享单车进入市场稍晚于 ofo 小黄车，并于 2015 年在上海投放了第一批车辆。2016 年和 2017 年扩张到全国 21 个城市，有 80 万辆以上单车规模。同样因为资本运营不善，挪用用户的押金，在 2018 年 4 月，摩拜单车以 27 亿市价被美团收购。（谈婧，2018）



废弃的小黄车

除了 ofo 小黄车和摩拜单车两大巨头对市场的抢夺外，哈啰单车异军突起，在 2018 年首先采用信用免押金，也在激烈的市场争夺中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哈啰单车依托支付宝，采用蚂蚁金服下芝麻信用分 650 以上的用户，可以在全国免押骑行哈啰单车。为了避开一线城市激烈的市场争夺战，哈啰单车选择从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切入。直到 ofo 小黄车退出市场，摩拜单车被美团收购后，哈啰单车才反攻进入一线城市。此外，由滴滴托管小蓝车之后推出的“青桔单车”也在一线城市占有了一定市场份额。（谈婧，2018）

其他各种牌子的共享单车，由于缺乏盈利点和同质性，在完成几轮融资之后就躲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纷纷退出市场。退出市场之后的共享单车，被简单地堆积在城市的郊区，成了无人问津的垃圾。一名叫做迈克丹顿温的缅甸创业者以每辆车 15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万辆被遗弃的共享单车，经过改装后运往缅甸的学校，送给那里的贫困学生，使得他们可以减少每天上学路上的时间，从而使得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受到更好教育。（温婧，2019）这种公益性的举措为废弃的共享单车提供了新生，延长了共享单车的使用寿命。



中国废弃的共享单车成了缅甸孩子的最爱

他山之石：来自波士顿的经验

波士顿是一座美国东部的中型城市，共享单车在城市里发展得初具规模。我们不妨以波士顿地区为例，看看外国的共享单车是如何生存发展的。

波士顿的共享单车于 2011 年投放市场，当时叫做 Hubway，2018 年 8 月改名为 The Blue Bikes。共享单车的服务范围横跨了波士顿、布鲁克赖恩、剑桥、萨默维尔四个毗邻的城镇。Hubway 是有桩的共享单车，至 2018 年共有 1600 多辆自行车和 200 多个共享单车站台。在 2011 到 2018 年之间使用次数达 540 万次。共享单车归市政府所有，通过招标外包企业来运营。作为政府提

供的公共品，Hubway 共享单车的购置费由赞助商、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及市政府的基金来提供。平时的运营和维护的费用则由共享单车租赁产生的盈利资金来提供。（Lin and Saiz,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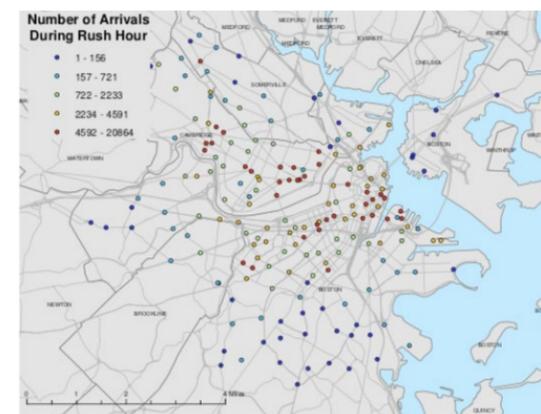


波士顿的Hub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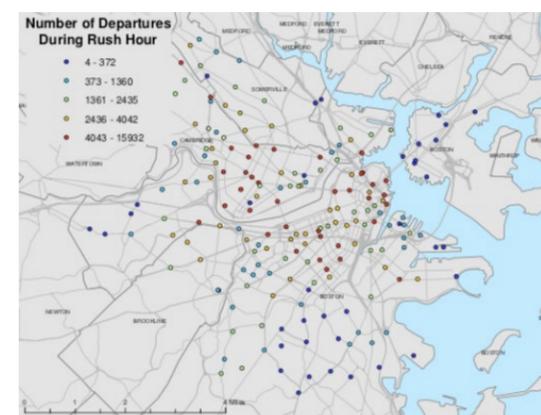
就骑行的费用而言，在 Hubway 时期有四种选择，24 小时的通行证是 6 美元 / 天，72 小时的通行证是 4 美元 / 天，每月的会员费是 20 美元 / 月，每年的会员费是 85 美金 / 年。一旦付费之后，前 30 分钟骑行不产生额外费用，31 到 60 分钟的骑行通行证使用者需要支付额外的 2 美元，会员用户需要支付 1.5 美元，61 到 90 分钟通行证用户需要额外支付 4 美元，会员用户需要额外支付 3 美元，91 分钟之后每 30 分钟通行证用户需要额外支付 8 美元 / 30 分钟，会员用户需要额外支付 6 美元 / 30 分钟。机构用户和低收入者在成为会员时享受折扣，机构用户和低收入者每月的会员费是 10 美元 / 月，每年的会员费是 42 美元 / 年。2018 年 8 月 Hubway 改名为 The Blue Bikes 之后，推出了新的资费标准，同样有四种选择，一种是单程的通行证是 2.5 美元，其中前 45 分钟的骑行不产生额外费用，之后需要支付 2.5 美元 / 30 分钟的额外费用。另一种通行证是 10 美元 / 24 小时，其中前 2 小时的骑行不产生额外费用，之后也需要支付 2.5 美元 / 30 分钟的额外费用。每月的会员费还是 20 美元 / 月，其中前 45 分钟的骑行不产生额外费用，之后需要支付 2.5 美元 / 30 分钟的额外费用。每年的会员费提升到 99 美元 / 年，其中前 45 分钟的骑行不产生额外费用，之后需要支付 2.5 美元 / 30 分钟的额外费用。机构用户和低收入者同样享受折扣，机构用户和低收入者每月的会员费是 10 美元 / 月，每年的会员费是 50 美元 / 年。

就数据公开而言，Hubway（或者后来的 The Blue Bikes）在其网站上公开了系统的骑行数据。数据包括骑行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骑行开始和结束的站台及其经纬度，共享单车的编号，骑行持续的时间，使用者是否为

会员，使用者的出生年月，使用者的性别。Hubway（或者后来的 The Blue Bikes）还不定期的开展数据可视化和分析大赛，吸引数据处理爱好者使用骑行数据进行分析。下图（图一和图二）就是用公开的骑行数据画的在高峰时段各共享单车站台使用频率的热力图。其中红色代表最高的频率，蓝色代表最低的频率。低频率站台多分布在城市的外围，高频率站台则分布在城市的内圈。对于高峰时段达到的站点，高频率的站台主要集中在学校和中心商业区。对于高峰时段离开的站点，高频率站台主要集中在住宅区。根据热力图的显示，Hubway（或者后来的 The Blue Bikes）用车辆运输共享单车，来平衡高频率站台和低频率站台之间的共享单车数量，使得站台不出现空置的现象。每出现空置的站台超过一定时长，政府将对共享单车公司进行罚款。所以用数据了解各站台的使用频率显得十分重要。



图一：高峰时段到达站点的热力图（来源：Lin and Saiz, 2019）



图二：高峰时段离开站点的热力图（来源：Lin and Saiz, 2019）

共享单车的未来发展之路

共享单车作为解决城市居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尴尬问题的利器，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与国外发展得初具规模的共享单车相比，还存在以下问题：

1. 与有桩的共享单车相比，无桩的共享单车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上更加有效。但与此同时，无桩共享单车也面临着车辆无序摆放，影响行人和交通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还要依靠通过提高骑行者的素质来解决。

2. 与国外共享单车是政府所有然后通过招标外包给企业运营不同，国内的共享单车是私有公司所有。这造成了多家公司进入市场，为了争夺市场竞相“烧钱”降价的现象，除了坚持到最后的公司外其他公司都退出市场，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能由政府规范共享单车的准入条件，在运营阶段就招标选择一两家优秀的企业，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过度竞争的现象。

3. 作为所有非机动车辆驾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许多国内的大城市比如广州，并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共享单车或是占用人行道行驶，或者是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要更好的发展共享单车，政府在规划城市道路时必须解决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的问题。

4. 与国外的共享单车相比，我国的共享单车还存在很大的费用上调的空间。上浮骑行的费用能增加共享单车公司的盈利，从而有利于共享单车公司在市场上的可持续发展。

5. 我国的共享单车骑行数据还比较难获得。学习国外共享单车的先进经验，我国共享单车也可适当公开骑行的数据。这样有利于业界和学界的数据分析爱好者为共享单车的发展群策群力。

除了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如今市场上多家公司争夺市场也影响着共享单车的发展。比如在广州，摩拜单车投放年限较早，已经出现车辆老化的问题。而新投放的哈啰单车和青桔单车则更受消费者的青睐。而其中的哈啰单车因为依托支付宝采用蚂蚁金服的信用分免押金的特点，提高了自身的异质性，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占有一定的优势，很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以上几个问题下的共享单车风云是否会如预期般变幻，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首发在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8月21日文章

农村淘宝为每村带来 18 万元 / 年的福利收益

作者：Victor Couture, Benjamin Faber, 谷一桢, 刘立之

(作者分别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暨南大学, 乔治城大学)

中国进行网购、网销的人数从 2000 年的几乎为零, 到 2015 年已增长至 4 亿有余。但迄今大部分的增长都发生在城市中。在此背景下, 阿里巴巴集团的农村淘宝事业部协力中国政府, 启动了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下乡活动, 以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享受与其所在县的城区同样的电商价格、便利和服务质量。为此, 农村淘宝在县中心建立仓库 (图 1), 并在村中心设立电子商务服务站 (图 2)。截至 2017 年, 淘宝已经在约三万个村提供了电子商务。

农村淘宝最初全额补贴县仓库和村之间的物流成本。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的设计, 则考虑了农村电子商务在支付手段等方面的特定需求。比如村民可以通过服务站合伙人的账户使用电子商务。



图1



图2

那么, 农村淘宝给村民提供了多大的经济效益? 服务站的经济价值从何而来? 什么样的村和村民从农村淘宝中获益最大? 作者和阿里巴巴合作通过在安徽、河南和贵州 3 省 8 县 432 个村中随机选择了 60 个试验村和 40 个对照村, 实施了随机对照试验 (RCT,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探究上述问题。我们的结果依靠两个关键数据。第一, 在我们选择的调查村分别进行了家庭调查和当地实体零售商店调查, 均在农村淘宝正要进入前和进入一年后进行了两轮。第二, 我们和阿里研究院合作, 用农村淘宝和菜鸟网络的交易数据补充我们的调查数据。

问卷调查结果

农村淘宝进入的消费侧效应

在试验村即设点村, 约 14% 的家庭报告说曾经使用过农村淘宝服务站。这些使用过服务站的家庭, 在我们调查的月份将 14% 的家庭总零售支出用在服务站。对于在我们调查的月份使用过服务站的家庭, 这一比例是大约 25%。与非耐用消费品如食品相比, 耐用消费品如家具、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用在服务站的支出比例要大得多。使用过服务站的家庭将 11% 的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用在服务站, 耐用消费品用在服务站的支出比例则高达 44%。

为什么有些家庭将其零售支出转移到电商服务站? 在农村淘宝服务站买到的产品中, 只有 38% 在村内商店有售; 对于耐用品, 这一比例下降至 16%。在 55% 的调查村中, 我们找不到任何耐用品在售。在服务站买到的产品, 即使村内也有售, 服务站要便宜约 15%。

村外的主要购物地, 通常是最近的乡镇中心, 在所售产品的多样性上更具竞争力。在服务站买到的产品中, 84% 在村外的主要购物地也有售, 但服务站要便宜 18%。另外, 村外的主要购物地, 到村的距离中位数为 10 公里, 往返交通需 40 分钟。服务站则离我们的调查家庭近得多, 距离中位数仅为 230 米。

总体上, 服务站与村内商店相比, 特别在耐用品方面, 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 且价格更低。与村外的主要购物地相比, 服务站也更便宜、更方便到达。考虑到服务站相较于其他购物渠道的优势, 农村淘宝可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可以服务 (比目前 14%) 更多的当地家庭。

我们还考察了以上消费侧效应对于不同特征家庭、村的异质性: 更年轻、更富裕、离村服务站更近、所在村更偏远 (远离最近的乡镇中心) 的家庭, 平均而言用在服务站的零售支出比例最大。此外, 在此前没有商业快递服务的村, 消费侧的平均效应显著更大。

农村淘宝进入的生产侧效应

无论是基线调查还是农村淘宝进入后的终线调查, 我们的调查基本上没有记录到网络销售。因此, 至少在短期和中期, 农村淘宝对家庭收入、劳动供给或创业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一些成功的“淘宝村” (存在大量电商企业的农村地区) 可能存在特殊属性, 比如拥有线下的货源, 毗邻城市, 或者拥有创业带头人。在普遍意义上的农村地区, 电商“卖出去”要困难许多, 也需要更多的营销、培训、产品标准化等辅助措施。

尽管如此, 基于我们的家庭调查, 还不能轻易断言不存在生产侧效应。发展农业电子商务企业或许需要比一年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调查也可能错过极少数非常成功的电子商务企业。为了弥补这些调查数据的限制, 我们也利用企业的内部记录数据库分析了生产侧效应。

对当地实体零售店的影响

我们发现农村淘宝的引入对当地实体店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我们在基线和终线调查中都观察到的同一商店中的同一产品, 当地商店价格也没有显著下降。

补充说明:

我们基于农村淘宝购买交易和菜鸟发货大数据, 也同样证实了上述研究发现。

量化农村淘宝的福利收益

我们用当地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来衡量农村淘宝所带来的福利收益。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所有的福利收益都来自于家庭 (零售) 生活成本的减少, 且收益由使用过服务站的家庭获取。我们计算发现, 对于最终使用了服务站的家庭, 农村淘宝有较大的正向福利效应。这些家庭在所有零售消费上的生活成本减少了 4.8%; 只看耐用品消费的话, 零售生活成本减少了 16.6%。对于所有的家庭, 即包括了约 85% 没有使用过服务站的家庭, 总体零售生活成本的减少略低于 1%, 耐用品消费上的生活成本则降低了 2.9%。对一个平均意义上的农村淘宝设点村加总所有家庭获得的收益, 我们的粗略计算得出, 每村每年从农村淘宝获得的福利收益约为 18 万元。如

果农村淘宝能够吸引更多的家庭在服务站进行购买，并能通过网络销售促进名义收入的增长，农村淘宝的总体福利收益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同时，我们发现农村淘宝的影响如何因家庭和村而异。首先，农村淘宝的影响集中于农村淘宝进入前没有商业快递服务的村。通过提供物流服务直接快递到村，千县万村项目最主要使中国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家庭获益。

在远离乡镇中心的“偏远”村，农村淘宝的用户比例更高。比如，随着村到最近乡镇中心的距离从3公里增加到20公里，每村用在服务站的平均支出翻了一番。

在村内，更富裕、第一经济来源者更年轻的家庭，使用服务站的程度显著更高。比如，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最富裕的家庭从农村淘宝获得的收益是最贫穷家庭的5倍。正如预期，离农村淘宝服务站近的家庭也更有可能会使用服务站，且从服务站获益更多。

结论

近期的政策报告着力强调了电子商务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农村淘宝近来启动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促进城市之外电商发展的项目。总体上，我们发现电子商务的扩张给特定的农村人群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特别是在之前没有商业快递服务的村，农村淘宝带来的经济收益显著更强。这说明农村淘宝的主要价值来自于将电子商务的物流网络扩展到农村欠发达地区。

在消费侧，我们发现电子商务服务站与当地实体店相比，价格更低、更便利、产品更多样。家庭购买力的增强在耐用消费品如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方面尤其显著。但没有证据表明，农村淘宝显著降低了当地实体店的零售价格，或减少了村内实体零售店的数量。总体上，我们发现最终使用了电商服务站的家庭其购买力显著增强，但服务站的使用远不够普遍，在消费侧还有相当大的扩大及深化空间。

在生产侧，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农村淘宝对网络销售、生产原材料的购置、家庭收入及创业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如果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辅助电商发展，如商业培训、信贷支持、精准网络促销及助力生产标准化，仅靠电商建立网络销售渠道，农村市场平均而言很难自发产生巨大的、显著的生产侧效应。随着农村淘宝进一步优化其通过电子商务促进农村创业的手段，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是哪些因素使得一小部分农村地区能够在电子商务的销售端获得成功。

说明：

我们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效全球行动中心（CEGA, Center for Effective Global Action）、克劳森中心（Clausen Center）、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韦斯家族基金（Weiss Family Fund）、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对本研究的资金支持。我们诚挚感谢 Hero Ashman、彭文威、Jose Vasquez-Carvajal 和韦祎的出色研究协助。我们诚挚感谢孙立军、王建勋、王威、郑威和叶钊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懈支持。与此同时，我们衷心感谢高红冰、盛振中、陈亮、张文涛和蒋正伟提供交易数据的权限，并协助我们使用该数据。本报告全部观点谨代表作者自身观点。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9月2日文章

推广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托马斯·皮凯蒂的雄心壮志

作者：卢晶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经推出就引起全球热议，荣登纽约时报、亚马逊、华尔街日报等多个畅销书榜单的榜首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在书中，皮凯蒂基于15年学术研究的积累，通过对300多年以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历史数据的详尽剖析，论证了二战以来各国的不平等现象持续扩大，并将日趋严重。由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财富的积累和代际传递将不断加深贫富不均。在全书的结论部分，皮凯蒂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征收累进税来改善收入分配的“激进”政策。《21世纪资本论》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激烈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罗、保罗·克鲁格曼，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里高利·曼昆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发表评论，或支持或反对皮凯蒂的论断。但毋庸置疑的是，皮凯蒂成功将收入分配这个古老而又重要的议题重新置于公众视线的焦点。

在《21世纪资本论》大获成功之后，皮凯蒂并没有停下脚步，一项更为宏大的计划在进行之中，那就是建立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网址：<https://wid.world/>）和推广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前身是2011年建立的世界顶端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该数据库覆盖了20世纪以来30多个国家的顶端收入份额数据（例如，收入顶端1%人群的收入占全体国民收入的比重）。2015年世界顶端收入数据库升级为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除了收入不平等数据，新的数据库还加入了各国财富收入比（wealth-income ratio）以及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数据，这些数据也是《21世纪资本论》写作的基础。2017年，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正式更名为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该数据库的研究团队以巴黎经济学院30

余名学者组成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为核心，以70多个国家100多位学者组成的国际学术网络为支撑。全新的数据库力图提供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更长时间范围内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数据。

一、什么是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皮凯蒂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言之，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就是综合利用税收数据、家户调查数据、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及其他数据，采用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对每个国家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分配状况进行全面和系统的估计。基于皮凯蒂和100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数据库目前已经可以提供70余个国家和地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数据。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媒体和公众对于不平等问题的关注，皮凯蒂坚持将所有测算结果和方法过程在数据库的网站上公布。此外，数据库网站还定期发布《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最新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摘要）》有九种语言版本可供下载，并且还有报告全文的英文版可供下载。

皮凯蒂为何执着于推广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研究收入分配的传统方法存在哪些问题呢？基尼系数应该是公众最为熟悉的度量不平等的统计指标。收入的基尼系数用来度量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其数值位于0到1之间，越接近于1表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高。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收集了各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一般是基于一个国家有代表性的家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以我国为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基于全国有代表性的16万户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皮凯蒂认为，家户调查中涉及的收入无法很好覆盖全部的国民收入，尤其是资本收入，这是利用家户调查数据研究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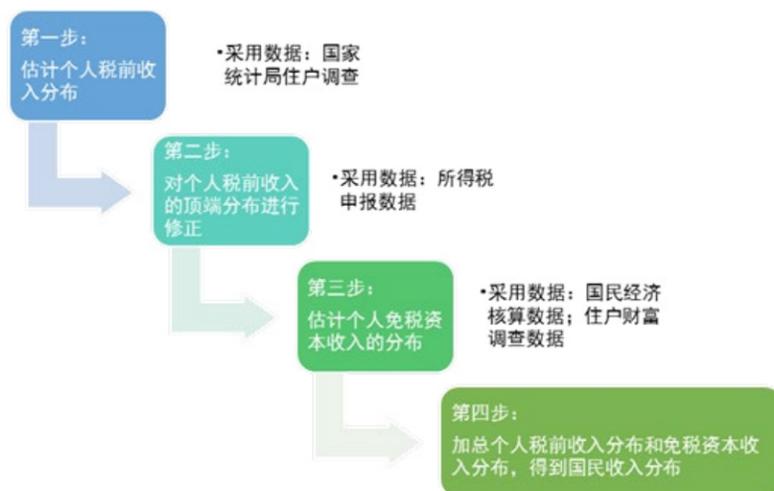


图1 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思路：以中国为例（托马斯·皮凯蒂等，2019）

按照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定义，国民收入 = GDP - 资本折旧 + 国外净收入。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民收入 = 劳动要素收入 + 资本要素收入。通俗来说，国民收入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全部收入。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本收入（如私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无法通过住户调查数据获得，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数据对整体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进行估计。皮凯蒂认为，国民收入应该是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更好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最终关心的是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大蛋糕”（劳动收入 + 资本收入）如何在全体国民之间进行分配。

长期以来，学界一部分研究集中于居民收入分配，一部分研究集中于要素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局限在于研究所使用的收入数据（通常是住户调查数据或纳税申报数据）无法覆盖全部的国民收入，尤其是资本收入；而越是高收入家庭资本收入的比重越大，这就造成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低估。要素收入分配研究的局限在于仅仅关注国民收入如何在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但归根结底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都是归国民所拥有，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乃至国民收入究竟如何在全国国民之间分配，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们想做的就是打破两类研究之间的隔阂，综合多种数据来源，结合一定的统计方法，估计国民收入如何在全体国民之间进行分配。

二、如何进行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看到此处，读者一定很想了解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究竟如何进行。接下来笔者结合皮凯蒂和合作者近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估计的学术论文对该方法的思路进行简要介绍。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涉及到的假设和数据处理的技术细节较多，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也有一

定的复杂性。笔者在这里只对思路进行介绍，想要了解所有细节的读者请阅读原文。这篇论文是皮凯蒂和中国青年学者杨利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合作撰写，2019年7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题为“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中国资本积累、私有财产与不平等的增长：1978—2015）。该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智库》杂志将该文全文翻译刊载。在文中，皮凯蒂与合作者利用多种数据来源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进行了估算。大致思路如图1所示。

初步估计个人税前收入分布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这也是前文我们介绍过统计局用来计算基尼系数的数据。但是住户调查数据对于高收入群体覆盖不足，为此作者采用所得税申报数据进行修正。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住户调查涉及的税前收入无法覆盖国民收入中的免税资本收入，比如私营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等等。为此作者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家庭财富调查数据，采用一定的方法估计出个人免税资本收入的分布。最后，将前面得到的个人税前收入分布和免税资本收入加总得到最终的国民收入分布。

经过上述步骤，作者对于中国1978-2015年税前国民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动趋势的估计如图2所示。图中实线是利用所得税申报数据和免税资本收入数据修正后的结果，而虚线是仅利用住户调查数据估计的结果（原始估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2015年收入最高10%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7%上升到41%，而收入最低50%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7%下降到15%，并且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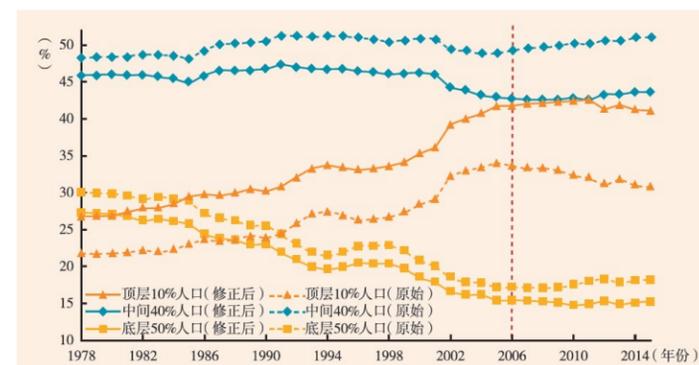


图6a 中国收入不平等：修正后的估计与原始估计对比

注：图中指标为成人税前国民收入（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除外）分配。综合调查、财政、财富及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修正。原始估计仅依赖于自我报告的调查数据。均等成人数据序列为已婚夫妇收入被均分成两份。假定2006年前的数据序列中税收/调查上调因子与2006—2010年全国税收数据存在期间的平均观测值相同。



图6b 中国顶层1%人口的收入份额：修正后的估计与原始估计对比

注：图中指标为成人税前国民收入（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除外）分配。综合调查、财政、财富及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修正。原始估计仅依赖于自我报告的调查数据。均等成人数据序列为已婚夫妇收入被均分成两份。假定2006年前的数据序列中税收/调查上调因子与2006—2010年全国税收数据存在期间的平均观测值相同。

图2 1978-2015年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修正后的估计与原始估计对比

图片来源：托马斯·皮凯蒂等（2019）

图3 1978-2015年收入最高1%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修正后的估计与原始估计对比

图片来源：托马斯·皮凯蒂等（2019）

个群体国民收入份额的比值从1上升到2.7，收入不平等呈明显上升趋势。原始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与修正后的估计相同，但修正后的估计显示更高的不平等程度。作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对收入顶端分布的修正所致。如图3所示，原始估计显示2015年收入最高1%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为6.6%，经所得税申报数据修正后该比例上升为12.5%，经免税资本收入数据修正后该比例进一步上升为14%。

三、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

皮凯蒂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估计的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例如，披露更多高收入群体所得税申报的信息，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完善对收入顶端分布的修

正。从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基础数据的丰富程度及质量对于进行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至关重要，如果数据不足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利用一些假设和统计方法进行弥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皮凯蒂的另一篇论文（合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祖克曼，2018年5月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题为“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以及基于美国的估计）。在文中皮凯蒂和合作者利用更为丰富的数据对1913-2014年美国税前和税后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变动趋势进行了估计。阅读本文可以加深对于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理解。



图4 收入不平等的国别比较

图片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网站 (<https://wid.world/>)

总结来看，皮凯蒂倡导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还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近年来，皮凯蒂与合作者运用该方法关于印度、中国、美国、中东地区、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研究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关于更多国家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以数据可视化的形式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网站上呈现。读者可以查询每个国家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趋势，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比较。图4显示的就是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网站提供的各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图中左侧列表显示，我们还可以选择查看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人均国民财富、财富收入比等多种指标的国别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网站对各国基础数据的质量也有评估，用1到5星来表示。例如，美国和法国的数据质量为5星，瑞典和德国的数据质量为4星，中国和俄罗斯的数据质量为3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数据质量为2星。可见，随着各国基础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统计方法的不断改进，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进一步完善。皮凯蒂的远大目标是成熟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被各国政府统计部门采纳，如国民经济核算一样成为常规性的政府统计数据。

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总体来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于其他经济改革。为了有效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制定有针对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统计数据，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相关学术研究力度。在完善统计数据方面，有关部门可以尝试：（1）完善住户调查中收入数据的收集方法并加大微观数据对学界的开放力度；（2）定期发

布更为丰富的所得税征收信息；（3）加强有关居民财富状况的调查。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希望以往研究微观居民收入分配和研究宏观要素收入分配的学者能够加强合作，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也希望更多不同领域（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学者能够更多关注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Piketty, T., Yang, L., & Zucman, G. (2019).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7), 2469-96.

Piketty, T., Saez, E., & Zucman, G. (2018).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2), 553-609.

托马斯·皮凯蒂，杨利，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刘欢. 中国资本积累、私有财产与不平等的增长 :1978—2015[J]. 财经智库, 2019,4(03):5-46+139.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9月6日文章

美国《排华法案》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史

作者：谢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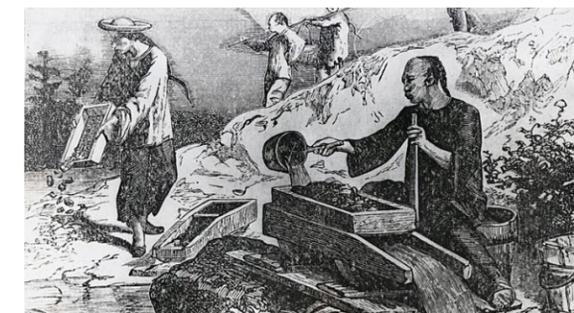
1882年丑化中国人形象支持排华的宣传漫画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华人也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使人们不禁回想起一个多世纪前美国臭名昭著的排华行为。排华，在狭义上指的是1882-1943年间生效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它涵盖了自1850年代起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性法律和制度。本文简略回顾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人歧视性法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历史。

随着淘金热而来的中国移民

1848年金矿第一次在萨特的磨坊（Sutter's Mill）被发现后，加州掀起了一股淘金热，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中国移民也不例外。1849年消息刚传至中国，即有数百人动身前往加州，此后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远渡重洋到加州淘金。最初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五邑地区（即现今江门市新会区及四个县级市：台山、开平、恩平、鹤山），通常是以契约劳工或者“信用票”

制度的方式前往美国。由于美国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中国人在抵美之初被视作是开发加州的一支生力军而受到热情的欢迎。例如1850年，三藩市政厅专程邀请华人参加当年去世的美国总统 Zachary Taylor 的纪念典礼。1852年，为感谢华人在帮助排干加州大量沼泽地时做出的努力，时任加州州长 John McDougal 发言称赞华人是“加州新居民中为这片土地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之一”。



在加州淘金的中国矿工

可惜蜜月期是短暂的。随着移民大量涌入，在美华人口迅速增长。185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仅有大约560名中国人，1860年这个数字超过3万。等到1880年，已有约11万中国人居住在美国。与此同时，淘金的热潮使得加州河床表面金矿的迅速枯竭，进一步开采难度变大，于是金矿开采逐渐被规模较大的采矿公司所把持，个人淘金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小，大多数矿工只能作为公司雇工，领取固定日薪（约1-3美元）。为了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劳工群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人数庞大的中国人被视作争夺工作的外来群体开始招致排斥和敌意。

与欧洲移民通常拖家带口不同，中国人大多数独身来到美国，他们中85%以上为青壮年男性，形成了独特的“单身汉社会”。相比在美国安居乐业，他们更冀望能赚到钱衣锦还乡安家立业，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将这一群体称为“旅居者”（sojourners），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移民”（immigrants）。中国移民的特点是工作非常勤勉，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同时省吃俭用很少消费，这也成为他们在美国被抵制的经济原因。在白人劳工为了抬高工资组织罢工时，中国人时常被认为是“乘虚而入”，破坏了其他劳工的集体议价行动。中国人节衣缩食自成一体的习惯被认为是对当地经济缺乏贡献。此外，在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盛行的当时，华人因与白人迥异的衣着外貌和生活习俗亦被视作是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能力并遭到丑化和攻击，唐人街被描绘成是充斥着鸦片、妓院和传染病的污秽堕落之地。

歧视中国人的法案相继出台

早在1852年，加州的一些采矿地区已经开始试图阻止中国矿工的进入。同年，John McDougal的继任州长John Bigler签署生效了针对中国人的“外国矿工执照税”（Foreign Miners' License Tax），对中国矿工征收每月3美元的税款。该税款在一系列后续法案中被不断推高，并衍生出其他的歧视性税款。将中国移民视作威胁的John Bigler紧接着又通过了一项施加于加州港口靠岸客船的税款，试图以此遏制新的中国移民潮。1858年，加州通过法律“禁止一切中国人和蒙古人种进入加州”，这项法律最终被加州最高法院在1862年撤销。在1854年的People vs. Hall案中，加州法庭剥夺了中国人出庭作证的资格，这使得中国人在涉及诉讼时处于巨大的劣势，难以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面对这样的敌意和歧视，一部分中国人选择打道回府或者转道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温哥华继续淘金，另一部分转行从事服务业工作。此外，1863年第一条横跨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雇佣了1万多华工参与铁路建设，占到雇佣工人的90%。中国人的薪酬要比白人工人低50%，工作环境却极其艰苦和危险。尽管之前甚少中国人有修筑铁路的经验，他们仍然要负责在高海拔内华达山脉的冰天雪地里铺设铁轨、利用炸药打通隧道等高难度工作，还时常有山体滑坡和雪崩等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在华工的艰苦努力下，太平洋铁路历时6年得以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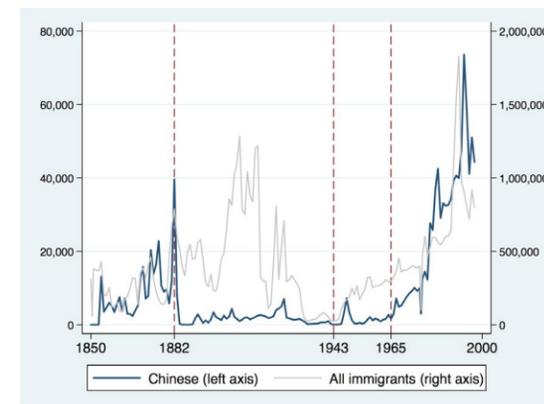
华人为太平洋铁路的成功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人的这一系列举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西部当时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然而在1870年代加州经历了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后，民众的反华情绪再次被推至高点。工会领袖与政客们指责华人劳工压低了工资水平，并开始游说国会推动联邦立法禁止中国移民。1875年颁布的《佩吉法案》（The Page Act of 1875）禁止了中国女性移民进入美国。1878年，全面禁止中国移民的法案被提上议程并在国会通过，但被总统卢瑟福·海耶斯（Rutherford Hayes）否决。

最终在1882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正式签署生效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禁止一切华人劳工移民进入美国；在美华人在出入境时必须携带工作证明，否则签证官有权拒绝其再次入境。该法案还禁止已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The Scott Act of 1888）进一步剥夺了在美华人出境后再次进入美国的权利。1892年的《盖里法案》（The Geary Act of 1892）将原本有效期为十年的《排华法案》延期十年。1902年，国会又将《排华法案》定为永久有效，并要求在美华人随身携带

居住证，否则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惩罚。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生效长达61年之后才被正式废除。

《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性移民法案。它的出台使得中国赴美移民潮顿时跌入了谷底。除了少数中国人可以以非劳工身份（如外交官，学生等）进入美国，大多数人除了非法偷渡外，仅有通过“纸生子/女”（paper sons and daughters）的方式入境。这个手段在1906年三藩大地震导致的火灾损毁了所有公民的出生证明后尤其盛行。中国移民谎称自己是美国出生取得公民身份后回到中国，然后携带声称是自己女子的中国人进入美国。即使如此，能够入境的中国人相比排华法案生效之前也是为数寥寥。由于严重受限的移民和大量的归国潮，在美华人口在排华期间出现了净减少。



图为1850-2000年间每年中国移民美国人数。来源：Chen and Xie (2019)

除了对新移民关上大门，《排华法案》对在美华人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作为一项联邦法案，它实质上在美国国内合法化了歧视华人的制度环境，从地方政府到民众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更为肆无忌惮。例如许多州相继通过《外侨土地法》（Alien Land Law），禁止没有公民资格的移民购买和拥有土地。与黑人一样，《反种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规定中国人不得与白人通婚。除了歧视性的立法针对，中国人日常也遭到白人无端的敌意和侮辱。当时三藩的中文报纸《金山新闻》（Golden Hills News）在一则报道中这样描述道：“这座城市中的美国人，经常无缘无故地虐待和羞辱中国人。”更有甚者，白人发起了多起针对中国人的私刑和暴动。1871年，由于两伙华人帮派争夺中误杀了一名白人，500多名暴徒攻击并洗劫了洛杉矶唐人街，约有20名中国人被私刑处死。1885年在怀俄明州

发生的石溪惨案（Rock Springs Massacre）中，白人矿工屠杀了28名中国矿工，致伤15人。特拉华大学的Jean Pfaelzer教授在《Driven Out: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一书中系统记载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此类针对华人的攻击和驱逐事件，其中有民众的偶发行为，也有政府主导的有组织行动，次数多达上百起，遍布美国西部州。



1871年洛杉矶唐人街暴动中被私刑处死的中国人

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斗争

面对歧视性的制度环境，在美华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抗争。一方面，他们使用法律武器在法庭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是Lin Sing vs. Washburn案。在一个名字长得匪夷所思的歧视性州法案中（《保护自由白人劳工免于中国苦力竞争和遏制中国人移入加州法案》，“An Act to Protect Free White Labor against Competition with Chinese Coolie Labor, and to Discourage the Im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in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中，加州向所有除了经商者、持证矿工、以及特定生产商以外的中国人征收每月2.5美元的人头税。该税种被称作“华人警察税”（Chinese Police Tax）。此外法律还规定收税官可以直接向未缴税华人的雇主征税，否则有权没收拍卖雇主的财产。Lin Sing是一名居住在三藩的华裔，他在代缴其雇员拖欠的5美元税款后立即向郡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州政府不得干涉国家管理对外贸易权力”的宪法条款。在郡法院驳回上诉后，Lin Sing上诉至加州最高法院。最终加州最高法院判定州立法违宪，并撤销了华人警察税（Chinese Police Tax）。Lin Sing vs. Washburn是第一例在美华人以违反宪法或联邦法律为依据挑战州立法的成功抗争。它不是Lin Sing一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诸多权益受到侵害的在美华人运用法律手段齐心协力

争取的结果。在《排华法案》和后续一系列法案颁布后，中国人为争取入境的权利也在法庭上与这些歧视性法案进行抗争，例如 Chae Chan Ping vs.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vs. Ju Toy 等案，但可惜其中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也利用各种公开渠道发声，寻求公正。1869年，华人群体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 Fung Tang 在前来加州考察的国会代表们面前慷慨陈词，表达了对于华人群体遭受歧视性待遇的抗议。他据理力争地宣称，针对中国人的税种违背了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度”的精神，也违反了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 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中的协定。他继续论述，剥夺中国人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使得中国人无法保护自己，也使得法庭中对正义的追求沦为空谈。Fung Tang 面对国会代表们的诘问时谈笑风生，最后真诚地恳请国会代表们“在美国政府中能够为华人群体发声”。会议记录显示，虽然没有给出关于切实解决方案的承诺，但国会代表们的确因为 Fung Tang 的演讲受到了触动。结束行程后，内华达州的参议员 William Stewart 在国会建议应阻止加州政府“向中国移民施加不合理的负担”，并努力推进一项要求保障“所有人”

（自然也包含中国人）基本公民权的法案，即《民权法案（1870）》（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870）。作为1886年《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866）的延伸，虽然1870年《民权法案》看似言辞笼统，并未明确提及中国人，但它确实改善了中国人的处境。基于这个法案，联邦政府废除了加州一些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税种，并在涉及中国人的民事案件 Garrett v. Lou Ci Ta 中判决允许中国人在法庭上作证。在石溪惨案发生后，华人群体群情激愤，发起抗议和请愿要求严惩暴徒并阻止未来此类事件的发生。清朝外交官也随后与美国国务院会面，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应对措施。最终时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向国会发表讲话，责成“联邦政府应倾力维持正义将罪犯绳之以法，以维持对两国关系的良好信念”。可惜这种表态仅是流于表面，总统将追责罪犯的工作留给了地方政府，没有对屠杀受害者进行任何物质补偿，也没有采取更多切实的措施对中国人的身和财产安全进行保护。

从这些事例中看出，在美华人在遭受歧视时并非一味忍让，他们集结了可以运用的资源和影响力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一书

中，伯克利大学法学系 Charles McClain 教授详细记载了19世纪末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斗争事件。遗憾的是，在排华情绪日渐高涨的美国国内环境以及清政府自顾不暇外交羸弱的时局下，在美华人显得势单力薄，并未能扭转整体的歧视性局面。无论是让步还是抗争，他们面对的局势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变得愈发紧张。

排华期间在美华人的生存状况

排华法案生效期间，在美华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在劳动市场上遭到严重排斥，企业纷纷拒绝雇佣中国人。他们也无法取得收入较高职业（如医生律师等）的从业执照。笔者与复旦大学陈硕教授的研究显示，在美华人的平均职业地位在排华期间剧烈下降，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他们的职业选择大多局限于服务业或者低端手工业。这段时期内，保守估计有30%以上的中国人在洗衣房和中餐馆工作。1880年代，三藩市300多家洗衣房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由中国人经营的。



中国人经营的洗衣房

在极度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在美华人依旧利用他们的努力和聪明才智争取独特的生存空间。传统观点认为，排华后他们日渐将生活范围局限在唐人街内，愈发与外界隔绝。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经济史教授 Susan Carter 通过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在排华后呈现出更离散的地理分布。他们离开西部的城市，向美国东北部、中西部甚至南部州一些原本中国人口甚少的地区迁移。在1880年将近97%的中国人生活在美国西部州，这个比例到1950年下降到了不到60%，这个比例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上半叶声势浩大的黑人大迁徙运动（The Great Migration）。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餐馆开始随着中国人的脚步遍布美国各州。利用肉片、芹菜、豆芽等平平无奇的食材，华人厨师发明的

一道“炒杂碎”（chop suey）征服了美国人的胃，甚至在芝加哥费城等美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炒杂碎”热潮。中餐也从此成为美国人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hinese Restaurant, 1128 Eleventh Avenue, SECOND FLOOR. Entrance next to Bee Hive Novelty Store. A Call Solicited. BILL OF FARE.	
Yokomain.....	15c
Chop Suey.....	25c
Chicken Soup.....	25c
Mushroom Chop Suey.....	35c
Chowmain.....	75c
Chicken Chop Suey.....	50c and 75c
Fo Don Yan.....	25c
Cho Kay Peu.....	75c
Wamain.....	25c
Bread Chicken.....	25c
H. and Eggs.....	25c
Dee Sak.....	25c
Port. House Steak.....	45c
Perk Chops.....	25c
Chicken Sandwich.....	15c
Ham Sandwich.....	5c
Egg Sandwich.....	5c
Ham and Egg Sandwich.....	10c

sept13-6t
Altoona (PA) Tribune, Sept. 15, 1904.

1904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份报纸上的中餐馆广告

在美华人也没有因艰难困苦而放弃对下一代的期望和培养。为了子女的教育权，他们同样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860年代起，加州即开始实施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黑人印第安人一样，原则上不得在白人设立的公立学校就读。虽然同身为纳税人，中国人却无法享受公共教育资源，他们的子女只能在私人设立的中式学堂就读。1877年，30名三藩华裔集了1300多个签名向教育委员会和州议会发起请愿，要求为中国人开设一所公立学校，但这个请愿没能成功。1884年的Tape vs. Hurley案中，Joseph Tape（中国人，随白人妻子姓）因女儿Mamie Tape入学申请被拒绝将公立学校Spring Valley Primary School告上法庭。加州最高法院最后裁定要求学校准许其女儿入学。判决宣布后，由于担心该案的示范效应导致中国人大量申请入学，加州旋即修改教育法，并为中国人单独设立了一所公立学校。从现在眼光来看，这种对待少数族裔的“隔离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原则仍然是歧视性的，但这已经是中国人努力推动的进步。此后中国人还在法庭上持续地挑战相关法律，努力争取更加平等的教育权益。笔者与陈硕教授的研究发现，自排华法案生效后，在美华

人家庭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相比排华之前，华人子女的字率和参学率反而有上升。

华人的美国移民史是一段饱受歧视同时又充满励志情节的血泪史。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是令人瞩目的。从父母辈从事厨师洗衣工等身份低微的工作到子女考入名校跻身美国中上流阶层，华人群体在20世纪中后叶展现的这种高代际流动性，一方面和平权运动后美国日渐改善的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和华人长期以来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Carter, Susan B. Embracing Isolation: Chinese American Geographic Redistribu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Working Paper, 2013.

Chen, Shuo, and Bin Xie.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Working Paper, 2019.

Kuhn, Phili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McClain, Charles J.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faelzer, Jean. Driven Out: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Random House, 2007.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9月11日文章

师范生公费教育能缓解信贷约束，吸引高分考生

作者：谢佳欣（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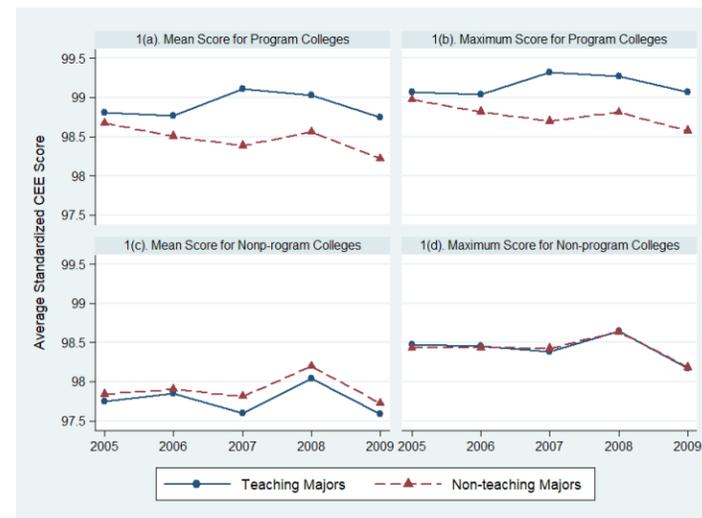
师范教育（网络图片）

2017年，我国将实施已有十年之久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除了履约任教、激励措施、条件保障等的条款变得更加灵活之外，从“免费”到“国家公费”的名称升级，更是旨在增强师范生就读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始于2007年的免费师范生政策规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这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师范生将享受学杂费全免和生活补助的待遇，同时必须在毕业后回到生源地中小学任教十年。根据光明日报报道，“截至2017年，已累计招收免费师范生10.1万人，在校就读3.1万人，毕业履约7万人，其中90%到中西部省份中小学任教，许多中西部地区中小学实现了接收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毕业生“零的突破”。该举措为地方源源不断补充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教师。”

教师素质对教育质量至关重要。经济学界关于教师素质对学生成绩和长期收入影响的研究早有累积，近年

来基于更丰富的个人数据和更严谨的研究设计也产生了新的实证证据。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其任教之前的某些个人背景和特征高度相关。也就是说，选择恰当的人进入教育行业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加入教师队伍的主要人群来自于各层级师范教育的学生，因此师范教育就成为了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的对象。一种常见的政策就是向师范生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包括低息贷款、教育补助或者奖学金。比如，英国、美国政府就有面向全国师范生的资助项目，这类政策工具在师资力量匮乏的地区特别受到青睐。但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关于这类项目是否能有效提高教师素质的证据。

我们的研究基于2005年至2009年全国共38所一本师范院校各专业的录取信息，考察了我国免费师范生政策对提高师范生素质的作用。通过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在实施免费师范政策的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里，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录取的（以标准化的专业平均分和最高分来度量的）生源素质之间的差别，在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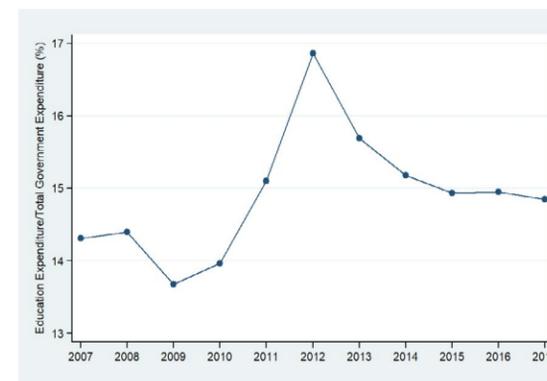


(图一，师范专业和非师范专业生源素质差别在政策前后的变化)

数据来源：《高考升学通》丛书，2006-2010册

(即政策开始当年)之后显著扩大(图1(a)和1(b))。由于非师范专业的入学成本不受政策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如图1(a)和1(b)所示的两类专业之间生源素质差别的扩大是源于政策导致的师范专业的生源素质的提高。为了排除一些全国性的不同行业吸引力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影响，我们进一步使用三重差分法考察师范和非师范专业之间生源素质的差别变化，在6所实施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师范院校和32所不实施该政策的师范院校是否有差别。如图1(c)和1(d)所示，在不受免费师范生政策影响的32所师范院校里，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之间生源素质的差别并未在政策实施前后发生如6所政策实施院校那样的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在6所政策实施的师范院校中，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之间生源素质的差别确实是由于免费师范生政策所引致的。更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免费师范生政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对受到信贷约束更强的群体更有吸引力，比如非独生的农村考生，特别是非独生的农村女生。这说明，这项政策主要是通过放松高中毕业生在进入高等教育时的信贷约束来吸引人才加入到师范队伍中来。

诚然，拥有更高高考分数的学生并不必然会成为优秀的教师。比如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副局长谭艺琴就指出“有部分城市毕业生上免费师范生后思想就相对放松，学习不刻苦，学业不精通。在实际工作中，免费师范生德能勤绩诸方面普遍不如公开招聘的教师，极个别甚至无法胜任教师工作。”提升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还是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的待遇。毕竟，丰厚的薪酬所产生的对工作岗位的珍惜比“公费生”头衔所激发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更能激励青年人投身教育事业。但鉴于改革教育系统的薪酬体制和大幅提升教育投入的复杂性(图二)，免费师范生教育确实是一项能在短期内有效提高师范生素质的政策手段。



(图二，2007-2017年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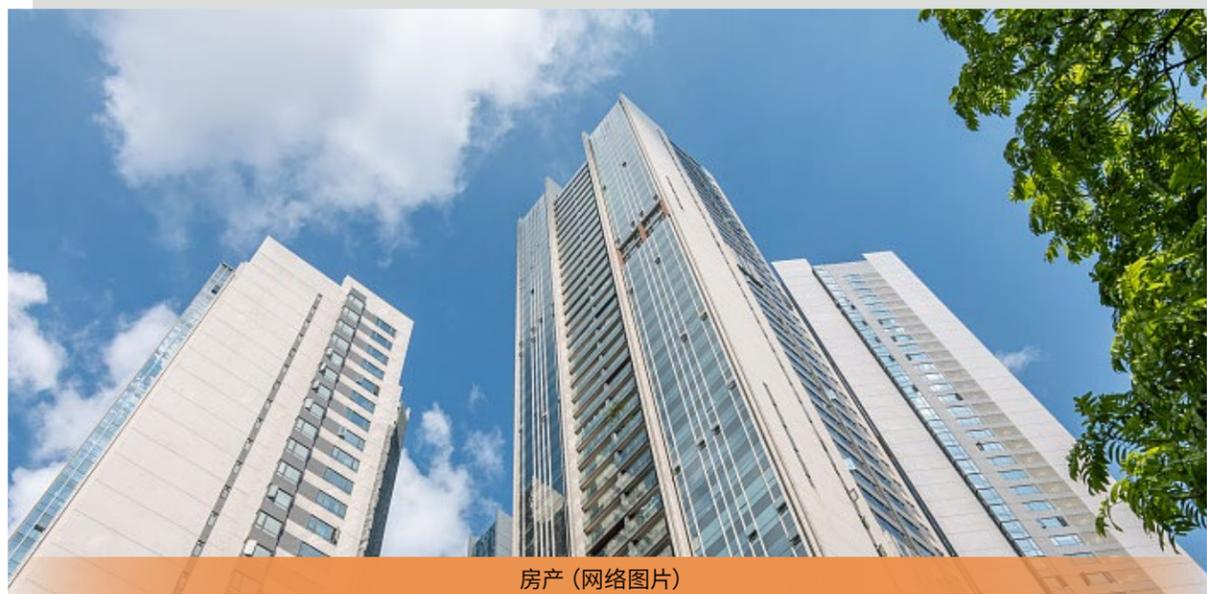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1. 师范生“免费”变“公费”，有何不一样。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808/t20180814_345232.html
2. Han Li and Xie Jiabin, 2019, “Can Conditional Grants Attracts Better Studen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Teachers’ Colleges” .
3. 免费师范生“下不去、留不住”。http://cppcc.people.com.cn/n/2014/0818/c34948-25481799.html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9月20日文章

广州建设共有产权住房，为大湾区 做好人才储备

作者：谢慧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房产（网络图片）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核心重地之一。在人口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广州如何维持人才吸引力，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则显得至关重要。其中，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人才决定去向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目前我国一线城市房价高企，人才生活成本压力大，建设共有产权房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保障。

共有产权住房被纳入了2019年广州十大民生实事。2019年4月，广州市南沙区发布了首个试点共有产权住房的细则。2019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加快推动住房保障立法。对于人口净流入较多、住房保障需求较大的大中城市，要督促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加快促进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符合条件新市民住房困难问题。

共有产权房是一种政策性住房，指政府与购房者按一定比例共同拥有房屋产权，政府将其持有的部分产权的使用权让渡给购房者。共有产权房因有政府政策支持，使用权和处置权也往往有一定的限制，销售价格一般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建设共有产权房是满足住房刚需、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实现“只住不炒”

的重要手段。

我国京沪广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对比

2016年上海市颁布《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2017年北京市颁布《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4月广州市颁布《广州南沙新区试点共有产权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下面我们对比京沪广三市的共有产权住房制度。

广州市的共有产权住房的试点时间晚于京沪两市，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广州特色。例如，对非户籍人口接纳度较高、保留共有产权住房的投资属性、保障落户和子女入学等。我们认为产生这种政策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已接近饱和，而广州市南沙区作为新区，离广州市中心城区远，常住人口规模少，对人口流入的承载空间大，因此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比京沪宽松。2018年底，广州市南沙区常住人口数目仅为75.17万人，根据《广州市南沙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5）》，到2025年，南沙区常住人口规模约为230-270万人。京沪共有产权房试点经验

表1 京沪广共有产权住房制度

	广州	北京	上海
政策推出	2019年4月颁布《广州南沙新区试点共有产权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2017年颁布《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上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在闵行区和徐汇区开始试点2010年在全市推广，2016年颁布《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
申请对象	本区城镇户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符合人才引进计划的人群	明确30%面向没有北京户籍的“新北京人”	开始只针对上海户籍人群；2018年10月开始纳入非户籍人群，并要求已婚
申请条件	困难家庭住房和人才住房两类：南沙区城镇户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区域内重点发展领域紧缺型人才、港澳青年两大类，兼顾进驻南沙区的重大开发投资项目和优先发展企业在本区无房的员工	申购家庭必须为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条件且家庭成员名下均无住房家庭，其中单身家庭申购，申请人应当年满30周岁	申请条件包括居住困难和收入困难人群。2018年10月起，上海市开始将非户籍居民家庭纳入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试点，要求居民持有居住证达到120分、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5年
居民产权份额	50%~80%	不少于50%	一般为60%~70%
回购和上市流转	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方式，目前以前者为主，逐步放开。5年内，不允许转让房屋产权份额；满5年，可转让给其他符合共有产权住房购买条件的家庭；满8年，可向区住建局提交上市申请，向其他符合本地住房限购条件家庭转让房屋	“封闭管理、内部循环”。5年内，不允许转让房屋产权份额；满5年，同等价格条件下，代持机构可以优先购买，代持机构放弃优先购买，则转让给其他符合共有产权住房购买条件的家庭，房屋产权性质仍是共有产权住房	满5年，可以购买政府产权份额，也可以上市转让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上市转让或者购买政府产权份额后，住房性质转变为商品房
出租	不得擅自出售、出租、出借	允许用于出租，购房人和代持机构按产权份额获得租金收益	取得完全产权前不得用于出租、出借
落户及子女入学	广州市南沙区试点政策未明确说明落户的相关细则；租售同权政策下，子女可就近入学	按北京市积分入户相关政策实行，共有产权住房可加分；入学政策与其他商品房一致	按上海市积分入户相关政策实行，共有产权住房可加分

京沪共有产权房试点经验

北京和上海较早对共有产权住房进行试点，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经验。

第一，上海和北京的部分共有产权住房，因位置偏远，弃购率高。例如北京市中铁碧桂园约70%弃购率，房山区金隅·金林嘉苑公开选房当天弃购率将近80%，金融街·金悦嘉苑弃购率达98.5%。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子女入学未必有保障等因素是弃购的常见原因。因此，共有产权住房的建设应合理统筹规划，完善周边生活配套设施，例如医疗、教育、交通等。第二，严格核查申请主体资格，谨防投机行为。共有产权房因其价格一般低于周边商品房，一些消费者容易抱有“钻空子”心理。严格审核申购主体资格，打压投机行为，真正保障“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第三，保证共有产权住房质量。过去全国各地试点经验来看，相比普通商品房，共有产权房容易出现户型不好、采光差、质量和管理差等问题。最后，如何定价、内外循环等都是制定政策的关键议题。

北京和上海人口已进入管控阶段，因此其相关政策无法完全适用于广州。需要基于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摸底排查，广泛征求意见，各界共同探讨和制定广州市共有产权房的相关政策细节。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体系现状

目前广州市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有：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共有产权住房。经济适用房仅面向本市户籍的低收入家庭，由于存在较多的寻租空间，现已基本停建。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面向本市户籍的住房困难家庭和稳定就业来穗人员，公租房的租金一般比同地段住房租金低30%。但自实施以来，广州市公租房频频遇冷，主要原因是申请门槛高、公租房位置相对偏远、周边缺乏配套设施等。2017年底，广州市对公租房政策进行了调整，包括降低居住证要求、延长合同期限、新增保障群体、取消收入线准入标准和资产限额等，配合租售同权的政策，广州市公租房市场反应回暖。

共有产权住房在广州市为新兴产物，其产权特点介于经适房和公租房——政府与购房者按一定比例共同拥有房屋产权，政府将其持有的部分产权的使用权让渡给购房者。共有产权房因有政府政策支持，使用权和处

置权也往往有一定的限制，销售价格一般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共有产权住房的功能和定位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本市户籍的困难家庭住房问题，二是引进符合一定要求的高端人才。共有产权房因有政府政策支持，使用权和处置权也往往有一定的限制，销售价格一般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建设共有产权房是满足住房刚需、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实现“只住不炒”的重要手段。建设共有产权住房是广州市加快建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建立健全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重要一环，能够切实解决一部分户籍人口的住房刚需，也能提高对特定人群定居广州的吸引力。根据广东省《关于推进共有产权住房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未来的住房供应体系应是构建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商品住房相结合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丰富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住有所居目标。

在广州现行保障性住房体系中，与公租房相比，我们认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有以下优势：第一，财政压力小，具备较大的市场化发展潜力。公租房建设需要政府投入较高的建房资金，并长期提供租赁补贴。相比之下，建设共有产权住房，政府一般通过低价供应土地、税收优惠等方式降低住房成本，前期不要求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后期也不需要政府持续的资金维持，政府财政压力小。第二，购房者安全感和获得感强。公租房的租赁者没有住房产权，住房稳定性、装修个性化、社区参与感等方面较差。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者拥有房屋的部分产权和相关保障，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获得全部产权，因此“主人”意识强，产权也增加了购房者的安全感、对城市和社区的归属感，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故此较强。第三，促进社会就业。公租房由政府长期提供住房租赁补贴，这一类的补贴具有明显收入效应——保障家庭将补贴看作收入增加的一部分，因此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因此，长期的租赁补贴会削弱家庭工作和增加收入的激励。相比之下，共有产权住房能够激励家庭具有增加收入，这种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产权具有强制储蓄功能，家庭需要通过劳动获得相应收入，以按期偿还贷款；家庭为了拥有全部产权，会努力工作、增加收入。

未来展望

在经适房逐渐退出舞台、公租房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背景下，广州市探索和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市住建局近期表示正在研究共有产权住房制度，有望今年之内能够出台关于共有产权住房筹集、建设、租赁分配的实质性政策。目前广州市南沙区的共有产权住房试点项目首筑花园已落地，其中有7栋为人才住房。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显示，租赁住房是广州市新市民住房的主要来源，为59.72%。广州市新市民住房自有率低，仅为4.51%，低于15个城市的

样本平均值15.2%。同时据各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广州市的居住成本低于北上深。在这一稳房价有利的情形下，广州市更应把握时机，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满足市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以住房政策为支撑，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释放城市活力。

暨济一堂

汪三贵：精准扶贫的现状和未来

引言

目前，距离习近平主席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在实行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到2020年，国家承诺要确保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而目前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仅剩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决胜关键时期，我们有必要对精准扶贫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进行分析和思考，并对接下来的扶贫工作提出有效的参考建议和展望。本期“问政暨南”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三贵教授，他分享了：国家扶贫政策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当前精准扶贫的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题与难点？未来精准扶贫的趋势是什么？

一、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变历程

中国的扶贫政策根据扶贫对象可分为两个阶段，一

是从1986年到2013年的区域扶贫开发阶段，二是从2014年至今的精准扶贫阶段。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确立了以贫困县为单位进行扶贫开发。1994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立了592个国定贫困县，农村扶贫历程因八七扶贫计划有了飞速提升。然而，当时全国大致还有40%的贫困人口位于非贫困县，为了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2001年，国家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进一步将贫困村作为扶贫对口的单元，并在全国确定了15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对象。2011年，国家在新的扶贫开发纲要中提出，要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并在全国确立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扶贫开发是以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为目标，也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贫困县在粮食、农业生产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的区域扶贫开发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是这期间仍然存在着一一些问题。首先，过去的区域开



汪三贵教授

发扶贫政策难以使剩余的贫困人口受益，无法实现2020年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国家目标。其次，国家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单纯靠经济增长拉动扶贫的外部动力不再充足。另外，国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增加，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上升至0.4甚至更高。因此，为了进一步解决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2014年，国家开始实行精准扶贫战略，确定了以贫困户为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机制。

二、精准扶贫的内容、措施和难点

汪三贵指出，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解决现有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也即，贫困人口的收入要超过贫困线，稳定解决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而精准扶贫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识别和瞄准到户到人；第二，因户因人制定帮扶措施；第三，扶贫对象动态调整；第四，脱贫退出需要评估。目前，国家采取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补偿、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多种多样的综合性扶持措施，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和推动。而对于脱贫退出而言，也需要第三方进行严格的评估，汪教授作为评估专家也告诉我们，贫困县对于贫困户的漏评、错退比率不能超过2%，才准许全县脱贫，这对地方工作人员而言也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精准扶贫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实施期间出现了诸多工作难点。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初期，对于贫困人员的精准识别问题存在着标准不明、方法不一等工作困难，给一些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现阶段，精准扶贫中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贫困户的“三保障”问题，如何规避贫困户的辍学风险，如何确定医疗扶贫的标准和工作重点，如何进一步确定和保障危房改造的对象，这些问题成为了当前扶贫工作的难点。而在2020年后，汪三贵认为如何确保贫困户的收入稳定和促进内生动力将会成为扶贫工作的难点。在脱离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之后，如何提升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促使贫困户选择适合的产业和就业扶贫方式，而对其他没有脱贫能力的贫困户进行的社会保障需要到达怎样的程度，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产业扶贫与稳定创收

汪三贵对精准扶贫措施中的产业扶贫方式做了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他认为，产业扶贫需要解决的是贫困户独立发展产业能力弱的问题。贫困户自身生产能力低下，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同时缺乏应对风险的能力。虽然难点众多，但产业扶贫由于能够激发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支

持，因此在精准扶贫的各项措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汪三贵认为，产业扶贫的顺利实施其关键在于各项资源的整合，不仅有贫困户土地、劳动力资源需要进行整合，更在于政府需要整合财政资金，发布系统配套政策，更在于企业的管理技术与农村资源的结合、金融体系的支持以及市场的调控作用。

汪三贵向我们介绍了产业扶贫目前的四种模式：一种是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组织方式为主的直接带动模式，让贫困户与有能力的农户混合组成专业合作社后与公司对接。一种是直接的就业创收模式，将贫困户直接安排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有大量非技术性、低强度的工作机会的产业类别之中。一种是资产收益模式，指的是将自然资源、公共资产（资金）或农户权益资本化或股权化，相关经营主体利用这类资产产生经济收益后，贫困村与贫困农户按照股份或特定比例获得收益的扶贫项目模式。最后一种是混合带动模式，是将农户直接就业或参与生产与资产收益结合起来，这也是扶贫效果最好的产业扶贫模式。

汪三贵进一步指出，产业扶贫目前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一，贫困地区缺乏有带动能力的经济主体；其二，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存疑；其三，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贫困户的受益机制措施不完善；其四，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博弈，以及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市场扭曲和过剩问题。

四、精准扶贫的成效

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之下，中国的精准扶贫成效斐然。主要表现在：一是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减贫速度不断加快，近几年，每年脱贫的农户数量达到1000万以上；二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是2012年的1.99倍，年均增长12.1%；三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的居住安全、厕所卫生、饮食安全等情况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四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贫困地区自然村通电、网络、道路硬化以及公共交通情况有了明显进步；五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学校、卫生所的设施条件和从业人员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六是改变了农村的基础治理方式，驻村帮扶、考核评估等多种方

式促进了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最后，汪三贵与我们探讨了2020年后的扶贫战略走向，他认为，随着精准扶贫对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贫困问题的重点将会转向相对贫困问题，未来农村的扶贫规划将会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施行，城乡扶贫的步伐也将逐步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期间，要更加注重贫困人口而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的驱动，要更多依靠市场和专业性民间组织，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从模仿到创新：中国的研发将走向何方？



宋铮教授

2019年9月20日，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宋铮教授作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分享了题为“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的报告。



讲座现场

讲座开始，宋铮教授指出资源错配文献的来龙去脉，指出总TFP(增长)由企业TFP(增长)和错配(变化)决定。在中国，纠正分配不当可使总TFP水平提高三分之一。而本文则结合了资源错配和内生增长理论。企业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有两种：模仿与创新。生产率高的企业

由于进入无人区，模仿对象少，故更多进行研发投资以创新，而处于生产率分布底部的企业则以模仿来提高生产率更为容易。

基于此，宋铮教授探究研发资源错配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具体而言，宋铮教授及其合作者建立模拟矩估计模型以拟合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以及生产率增长指标。在数据中将进行研发投资的公司识别为创新者，反之为模仿者，利用中国大陆2007-2012年数据估计模型的主要参数。之后，通过比较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大经济体，结果发现大陆的研发支出的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台湾，而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企业捏造和夸大了研发费用，另一方面是与经济中的干扰造成的。最后，宋铮教授做了反事实分析：(1)如果所有企业都做研发，TFP增长会低于实际TFP增长，表明所有企业都参与研发并非最好；(2)消除经济中的产出干扰，会显著增加研发企业的比例及提高总体的TFP增长率。

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再认识：一个环境经济学视角



徐晋涛教授

9月20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作客 IESR“暨南论道”系列讲座第24期，他的演讲主题为：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再认识：一个环境经济学视角。他从当前国内面临的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这两大环境挑战出发，通过加入WTO这一事件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进行探讨，并根据目前中国的减排措施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预测。

当前的两大环境挑战

根据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10年的八年时间内，中国的碳排放实际量比预期趋势增长了近4倍，接近美国碳排放的70%。而在巴黎气候协议中，我国提出自主减排1.5-2度的目标与现实减排成效存在巨大鸿沟，凸显了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巨大压力，而已经出台的空气净化治理措施尚未取得稳定成果。我国作为排放大国需要更强的行动支撑，在中短期必须要有见成效的措施落实。

加入WTO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徐晋涛教授通过梳理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环境变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指出，低碳绿色发展的研

究方向还比较小众，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影响的典型理论——“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徐晋涛教授通过加入WTO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来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前期通过二氧化碳排放与我国GDP、贸易数据的年度数据分析可知三者存在平行增长期，在加入WTO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重陡然上升。徐晋涛教授指出，利用合成控制法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加入WTO这一事件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再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的出口总额、产品类型、行业类型与国内碳足迹的数据的基础上，证实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行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且在出口市场。文章在传统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变量和环境投入变量，利用1997-2011年的佩恩表8.0，对我国出口行业进行增长核算进一步证明我国过去二十年的出口增长与牺牲环境高度相关。当然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客观的增长率和贡献率。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奇迹式的增长要向常规的增长转型的过程中，纠正要素价格特别是环境要素价格的扭曲是非常迫切的。采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可有效地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可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调查

广东千村调查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

广东千村调查

【千村·起点】2019 广东千村调查再起航， 访员培训开班仪式顺利举



2019“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师生合照

2019年7月13日上午9点，2019广东千村调查访员培训开班仪式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101室准时举行。出席本次活动的有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成品兴书记，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老师、副主任薛森老师，2019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各位老师以及两百多位访问员和核查员。师生汇聚一堂，善教乐学，传承千村精神，共开万里新征程。

仪式之初，由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致辞。首先，冯院长向2019广东千村调查的各位访员表示欢迎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他表示，广东千村调查项目2018年的收获和2019年的再度开展有赖于广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暨南大学和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为此，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让同学们更加深入了解社会调查，冯院长分享了一些调查细节，嘱咐大家要勇于吃苦、善于学习、勤思多问、互帮互助、严守纪律、注意安全，并寄望各位核查员严格要求工作，为访问辨真假，为真实存力量。最后，他预祝2019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圆满成功。

紧接着，学生代表翁芝涵发言。作为连续两年参加广东千村调查的“老访员”，翁同学言明了再次参加千村调查的理由是想了解各项国家政策落地到广东农村的具体情况，并向大家分享了去年入户调查的收获。她鼓励今年的访员同伴：入户调查存在许多的困难，但所谓勇敢，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今天开始访员们要做好准备，在培训中掌握基本访问技巧和一定的自我保护知识，全力以赴，共同成长，始终不懈地投入到2019年千村调查项目之中，才能“无憾千村”。

分享结束，主持人宣布2019“广东千村调查”项目访员培训正式开班。培训第一项是2019广东千村调查执行负责人花芯老师进行项目介绍。花芯老师以多个项目实录视频切入，生动形象地为访员们介绍了社会调查中心及其承办的各大社会调查项目，并通过ppt详细讲解了2019广东千村调查的项目进展、样本定点和招募情况。

项目财务专员梁迪璐老师为访员们作财务报销相关说明。项目财务背景、误工费、差旅费预算标准及执行期间财务注意事项……梁迪璐老师都一一详细解说，访员们认真记录相关注意事项。

下午，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老师为各位访员讲解行政村问卷及手册对应内容。根据去年执行情况和今年的问卷设计，何老师针对性地对行政村问卷的结构、题型、逻辑跳转等方面进行讲解。访员们踊跃提问，设想多种可能遇到的样本村或者家庭情况。师生多轮问答，来往之间，加深访员们对问卷和实地调查的了解。



学生提问

稍作休息，访员们领取了调查设备，项目执行督导李步清老师便开始为访员讲解“广东千村调查APP”的安装及基本使用。同学们称赞APP界面美观之余，都跃跃欲试，开始进行初次操作。而后，项目宣传负责人樊静文老师对宣传手稿、素材征集作出说明，鼓励大家积极反馈，记录自己的千村经历。

进入片区小组指导环节，各个片区督导分组对访员进行实地执行情况讲解，并开展行政村问卷模拟访问。

各个片区督导引导访员分组，以介绍各个片区行政村概况引入，结引导访员结合片区具体情况和语言使用习惯，进行模拟访问。各访员遵照访问流程开始练习，时而互相提问，时而讨论，顷刻之间，来自广东各地的方言在会场中交融，场面温馨而热闹。



小组进行问卷模拟

另一边，核查员们除了先后参加项目介绍及行政村问卷及对应手册讲解环节外，还在项目质控主管肖和老师与督导黄晓敏老师的带领下在中惠楼106了解质控工作与核查规范要求。



核查员培训现场

悠悠长夏日，赤诚少年心，2019年盛夏，让我们一起举青年旗帜，初心如磐访山河。

【千村访问手记】我们在做一件有温度的事情



家户访问路上与村民交流

访员们行走在南粤大地，不辞辛劳和远途，认真收集农村微观数据，记录乡村真实脉搏。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调查任务，除了宝贵的一手数据之外，还收获了对于乡村的感悟和思考。

访问的这一个多星期相处下来，我发现大家都很有干劲，每天虽然会又晒又累又饿又困，但是访问过程中队友们的一些黑照或者访问过程中的鬼畜吐槽都会成为我们整队的快乐源泉（嘿嘿嘿）。大家相处很融洽，虽然日常互怼互呛（全队都很“直”），但是干活毫不含糊：队长是怼狗担当，财务是砍价担当，曼甄是情景再现担当，丽丽是嫌弃担当，伟妹是黑照担当。原本分组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分配到揭东队很遗憾，但是从第一天跟队友们去燕林（化名，下同）开始访问的时候，我就没有那种低落的感觉了嘻嘻，反而很感谢老师们把我分配到了惠来队，也印证了老师们在群里常刷的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管去到什么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风景和人情，而我们，是禹禹前行的过客，基于不相类似的各种缘由组合在一起，用汗水、友谊、信念记录下旅途的喜怒哀乐。抱怨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说实话，我对受访者拒访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或者说我觉得拒访才是常态，因为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我绝对不会因为礼金而向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透露自己家的情况。换位思考之后，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希望受访者接受自己的回访，又希望他们提高安全意识，保护好自己（虽然说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怎样才能做到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配合我们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所接触的受访者里面，我没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全然信赖与被信赖的真诚，虽然能理解，但这大概是我此行最大的遗憾了吧。

在四个村的追踪回访中，第一个村燕林无疑是最配合的。与其他样本村相比，燕林是相对贫穷的一条村，但那里的村民却是最淳朴又最容易满足的一群人。那里仍处于一种相对比较闭塞的环境状态，由于没能得到当地政府足够的重视，本地资源又比较匮乏，依托散卖的特色农产品无法发展起来，去收购的供货商拼命压低进货价格，转手卖出高价，而被收购农物的村民们面对少得可怜的报酬却无能为力……看着漫山遍野的油甘，我的心里陡然生出难以言表的痛心、惆怅和无奈。然而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的教育，大山深处的他们，需要知识的明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屋石（化名，下同）和胡辽（化名，下同）算是比较普通、比较中规中矩的农村村落，民风淳朴。胡辽养的狗多说明当地村民的安全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明这个地方更多地可能是弱势群体在居住，比如留守儿童和老人，养狗护家对于儿童老人是一种保护。但总体来说，较之前面遇到的两个村子，我感觉这里的贫富差距更大一些。



我们入户进行家户访问

石师村（化名，下同）是让我比较震惊的一个村，与燕林村的贫困相比，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村落，也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个村落。与这里的村民们交流，常会引发我的许多思考与感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我认为，乡村治理亦理应如此。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愿望再美好，不做好基础工作，一切也只是奢求与妄求。想要村落安定和繁荣发展，一定要向前看，从现在开始，从基础做起，日积月累，才能稳步把乡村建设得更好。



基层治理，“村霸”要不得（图源于网络）

在访问过程中，我们难免遇到村民们的误解，向他们解释也颇费周折。经济环境的闭塞，讯息传达的不全面，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等等常常令一些乡村的村民们对现行政策有许多不理解或理解不准确的地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筛选、调整、磨合、并进，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千村万户，做乡村振兴的传达者。我们不企求每一位受访者都能立刻接受并理解我们此行的目的、所收数据的作用，却也真诚地希望在我们多解释几分的时候，他们也能多谅解几分。

部分村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对自家基本情况会有一些程度的隐瞒，难以抑制的倾诉欲让村民们相比于完成访问问卷，更多是将我们当做倾诉对象。每当此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生活的无可奈何以及对改变现状的盼望之殷切。然而，固化僵化的思想、无节制的生育、低程度的教育、惰性思维等因素使他们滞留在出售廉价劳动力的阶段，无法突破自我而得到发展。这与他们自身以及所处环境有关，而村民们认识水平较低也进一步反映了农村教育资源匮乏、落后和不完善的事实一角。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图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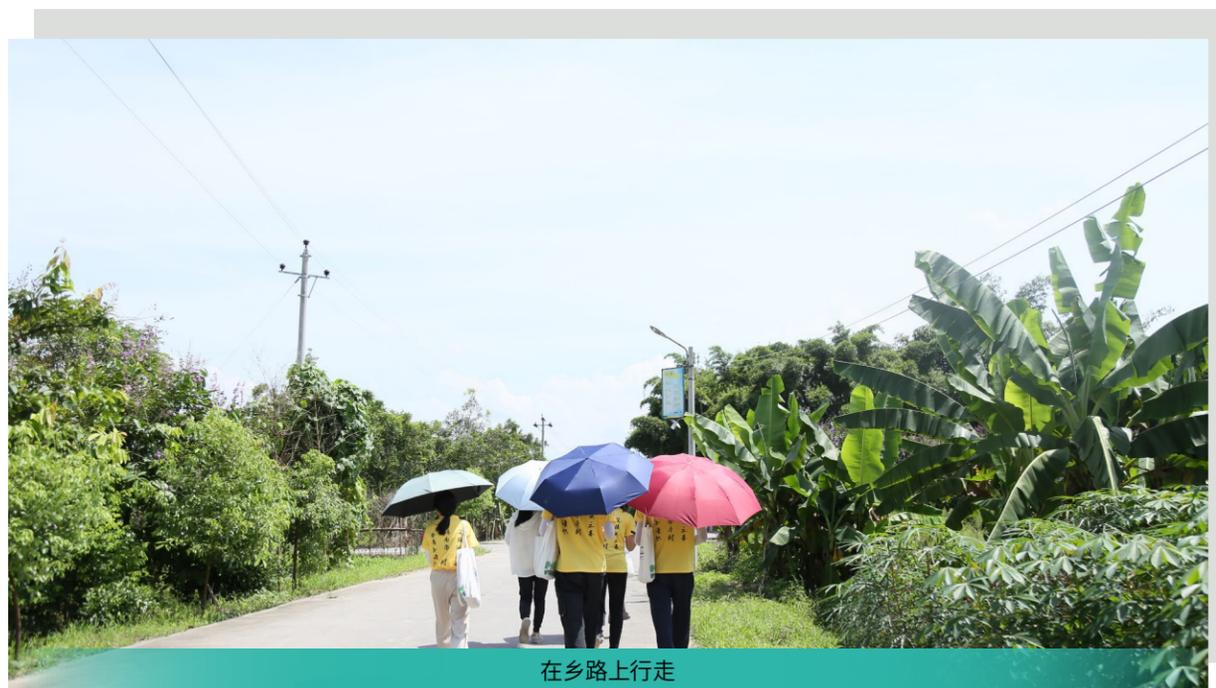
这次进村，除了作为访员完成问卷调查，我还当了一次绘图员。这次的体验让我感受到一进绘图深似海，两行清泪流下来。当队友们在阴凉的房子里做问卷的时候，我大多需要在烈日下穿梭在乡间小路，时不时45°仰望天空（后来学聪明了等下午没太阳的时候去画）；当队友们在一天的忙碌后尽情放松的时候，我在修草图；当队友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我在绘图本上挑灯夜战……说起来一把辛酸泪。但是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在绘图本上展现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访的过程中虽然遭遇了很多情况，比如拒访、访户突然发脾气、遇到狗等，但是我们都逐一克服，并且取得较大进展。每访一户人家，所见所闻皆异，所感所想颇深——这是一个有温度的项目，既包括室外的温度，也包括人心的温度——这个夏天，又是一个新的起点——fighting！

我们一行少年学生，得以通过千村调查阅千村、读万户，努力成为乡村振兴的践行者，除却有一腔热血，我们更希望能够为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带来哪怕一丝微弱的影响。这个夏天，我坚信我们日行万步后回传的定不是一份冷冰冰的数据，那些用眼睛看到的景象、用耳朵听到的声音、用心灵感受过的故事都必将是一份有温度的反馈。



【千村访问手记】恰少年，阅尽乡村百态



在乡路上行走

初心

当我坐在面试官面前的时候，老师问我：“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项目？”

农村出身，想要发展家乡；金融学子，有助职业规划；挑战历练，修养自身。这是我的三个理由。

但当我来到实地之后，我发现走村入户的驱动力逐渐变成了想要为这些淳朴热情的村民们做些什么，以我的行动为他们的或贫苦或穷困或孤独的生活带来改变。

最强战队

面试的时候，老师们问我“能否挑战队长这个职务”时，我内心是拒绝的。我一直不擅长当 leader，但最终还是决定挑战一下自己。老师安慰说，你要相信自己的队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终于熬到了见面的那一刻。与队友们相处下来，我发现，老师的确没有骗我。

私心觉得我们队伍是最强搭配：我负责制定每天的战略，发挥队长身先士卒、共同进退的作用；小刘是大型导航，换样之后必不可少；小林做账分明，上是老爷爷老奶奶的好孩子，下是小孩子的好姐姐；小史擅长敲开受访者的家门，打开受访者的心门；李 sir 是最强辅助，负责带路、卖萌，活跃气氛；小邱话虽然不多，但是很有想法。

刚上任时，我忙得团团转，因为自己本身优柔寡断，又不愿一个人拍板决策。其实作为一个队长，优柔寡断是非常致命的。所幸队友都十分可靠，他们包容我的犹豫，在我需要支持的时候推我一把，不会因为情绪而拒绝服从安排。我也学会在全队一筹莫展时做出下一步的计划。感谢队友让我的大脑可以多线程工作而不超负荷，让我在十几天的合作中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除了队员，我也非常感谢队伍背后的督导和项目组的老师。短短几天的培训并不足以应对实地层出不穷的状况，在我们慌乱时，老师在线秒回答疑、换样拒访时支招、收拾各种烂摊子、从来都不发脾气，让我们觉得非常地安心。因为他们，我才能做好我该做的

农村的真相

“你们是做什么的？”

这是我们在村子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或明说或眼神透露。一路走来，我们无意中实现了积极转变，从在别人的注视中畏畏缩缩，到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说自己是来做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勇敢而坚定，这是我们在千村磨练出来的自信。

生活在农村是一种什么体验，我想许多城市里长大的人或许永远也体会不到，从小在乡村长大的我，见过这里人性的美好，也难免遇见人情的冷漠。有人谈及农村，会提到“黑暗”一词，但在我看来，农村其实并不黑暗，只是相比之下，人性的现实在此处展现得更直白些。

对于我们的来访，有人热情欢迎招待我们，感谢我们对他们如此关心；有人虽然生活拮据，却依然大方地请我们吃水果、鸡蛋和花生，无论如何劝说都不收误工费；有人始终保持戒心，神情冷漠，以“一问三不知”的姿态与我们保持着交流的距离；也有人毫不留情面直接拒绝或是油滑地拖延和顾左右而言他……



村民们邀请我们喝茶

行走在乡村，与基层民众直接接触，村委们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访问带来了帮助，但也难免对所收集的数据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为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还是尽可能对受访者进行单独的访问。在与坦率的村民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得以见到民风淳朴的乡村的另一面，这让我们对广东千村的印象更加全面，也引起思绪万千。



我们耐心与年迈的受访者交流

基层工作从来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基层群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秤，孰公孰私，称的清清楚楚，任何的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行为，都会使群众心生芥蒂，不可复往。地基不牢固，再宏伟的建筑都只是结草之固，而想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做好基础工作，则要求基层工作者为官要廉，廉生威；从政要勤，勤生效；处事要公，公生明；做人要实，诚生信。只有这样，乡村才能在官民心心相惜中安定稳步发展。

短短十几天的访问，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个人力量之薄弱，面对乡村百态，时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与此同时，我们也日渐明白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的意义所在。我们和很多受访者都知道，政策从制定到调整再到因地制宜地落实，这中间有着十分漫长的距离。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接受访问和调查，有些是希望能够为社会作出一点点贡献，有些是心疼我们的奔波劳碌。有时候村民们叹息和愤慨，好像是生存挣扎，又好像是无力感的宣泄。无论如何，我们都衷心感谢他们。

改变是一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但积水成河，积沙成塔。我们相信年复一年，只要小村村持之以恒地用脚步丈量农村，以笔绘制乡村实况，那么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乡村政策落地就会越来越有针对性。将来一定会变得更好。

“有空常来坐坐！”在离别时，经常听到村民们这么说。我们笑着答应，背着包转身离开，嘴里喊着“再见”。

我们都知道，此别之后难再见。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别就是永远。

但蓝天白云知道，我们明媚了彼此的夏天。

【千村访问手记】一程山水一程情



在乡路上行走

被拒访时心情如夜空飘雨透心凉
被款待时村民们送上的瓜果格外香甜
啃面包的中午似没有尽头
总觉饱受虐待
但可以吃上热饭的夜晚往往令人期待
被恶犬夹击时魂飞魄散
柔情撸狗时铁心都要融化
那就既往不究吧
己亥热夏，我们用双脚丈量农村土地
不论欣慰欢笑，或是失望沮丧
都将成为我们六个人明媚的夏日独家记忆
路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做不成

同一县内，不同的山水滋养出不同精神面貌的村子。相隔不远的村子给人的感觉迥然相异，在村民的生存日常中参差多态地展现着乡村风貌、农村家庭的活力不息以及乡村建设的当下隐痛。在开发轰隆声中富裕起来的

南花村（化名）建起了漂亮新房。卧林村（化名）依旧在大山深处的竹林中酣睡，清一色的白墙黑瓦仿佛还处在夜不闭户的年代，村民间有种莫名的信任。更为边缘、逐渐空心化的村庄在睡梦中身影黯淡；虽贫困但村民村委和乐融融的岩品村（化名，下同）发展特色农产品，腐竹飘香。齐乐村（化名，下同）的村民似乎喜欢大家庭住在一起，村户之间分散的房子旁总会镶嵌着大片的鱼塘。



将要拆除的老泥房

然而，无关村庄的富裕或贫困、偏远或繁华，悲喜总是平等地上演，闹剧与温情从不缺席。在南花村，平静的山脚下危房拆除工作在如火如荼进行，而坚守祖屋的老夫妇眼里默默噙着泪水；欠债累累的家庭里会因为即将到来的孙子而充满干劲，满怀希望地迎接未来；贫穷但精神富足的家庭不免要接受生活挫折与考验……每个村都以特有的方式存在，每个农村家庭又以各自的方式寻找未来。

我们以问卷的方式记录着这些或许难登大雅之堂的故事，我们听见日复一日的劳作，听过许多无常的悲欢，听过那些仿佛已经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的一声沉重叹息。走近他们，我们总会情不自禁被他们的务实所感染，仿佛听到了黄土地里人们生生不息，永远朝气蓬勃的脉搏在跳动，农村在我们眼中变得更加鲜活。

回首时，村民们的眼神里是对解厄（解救危难）、如愿（达成愿望）的政策尽快落地的热切希望，或是对我们的调查不屑一顾和不信任，凡所目及都汇成了一句话：路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做不成。虽知作为访员的我们能尽之力微薄，仍很高兴我们走在这路上。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丽的惊喜

七月份的太阳明媚了草木生长，稻谷一粒粒变得饱满，无花果积累着甜蜜，花生在土里暗自较劲，然而一场暴风雨就能将这脆弱的和谐摧毁，我们的访问过程坎坷多于坦途。或许恰恰是经历过困难，才会让我们一些小成就熠熠生辉。经历过拒访，才懂得为他人的信任而感动；一起共度难关，我们才亲如一家，变成同声同气的“一户人”。

记得在南花村时，遭遇了太多的无情拒访甚至敌意，我们珍惜着每一份的样本和每一位愿意接受访问的受访者，不惜早出晚归，尽量配合主人家的时间，能做一份是一份。我们常常会遇到被我们打动后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长辈，也有需软磨硬泡、抓准时机才能成功访问的、态度暧昧不明的长辈。经历的种种不易，使每日收工时的夜空格外璀璨，使宵夜当晚饭的“泡面局”妙趣横生。

记得收工前的倒数第二晚，我们困在了本来一切进行顺利的齐乐村，语言不通，屡遭拒访。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我们依然卡在艰难的最后一户。此地偏僻，交通不便，加上我们已经定好了明天回岩品村完成收尾工作和后天返程的车票，行程无法延后。时间迫在眉睫，还下起了大雨，我们陷入两难的迷茫。所幸现实没有对我们太残忍，坚持使我们在暮色中完成了最后一户的访问，离开时，夜色已浓，黑黢黢的山路上亮起了几点手机闪光灯。我们已经做好了即便走到村口也打不到车的最坏打算，可柳暗花明，一位恰巧搭客去附近军事中心的司机接了我们的订单。最后，我们那原本悲惨的一天竟以夏日烧烤和冰啤酒结束。



天黑黑，结伴行

千村归来，无悔当初

出发时，我们带着一颗因期待而聒噪的心，离开时，我们带着沉甸甸的回忆，行囊里背满了故事和感动。

记得南花村有一户新样本，老人家未等我们介绍完来意，便无比信任地请我们进门喝茶，儿媳打电话提醒她小心，她也是笑笑并为我们开脱。告别时，她说“我的孙女今年考的大学，和你们一样大，我们也不想她以后去参加这些活动时受别人冷眼，你们都是父母的孩子，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受到信任。”



我们在访问期间秒变“孩子王”

从没想到，我会在异乡感受到许久未曾有过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爱。说心里话，如果请我配合做一个多小时的问卷访问，哪怕有误工费，我也会觉得很烦。能得到这些村民的配合，我们是何其幸运。而对于老人来说，我不仅仅是一位陌生的访员，也是一位需要被照顾的晚辈。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意料之外收获的温暖——见我们等待晚归主人家，邻居会给我们送上芭蕉填肚子；夏日炎炎，受访户不由分说给我们切起了西瓜；天色渐晚，村干部主动提出开车送我们离开……遇见的热情与温暖，融化了受到的委屈，让一切怨言都不足挂齿。

这些故事和感动，不只与村民有关，更重要的部分是与我们的六个人有关的一切。深得长辈欢心的队长“客服小彭”有着异次元的作息时间表；不怕狗的高个儿少年把四个村子的看家狗训成了宠物犬；经常自闭的绘图员总是会一本正经地官方解释千村调查；可怜的财务大大总是被吆喝着去结账；网瘾少女像高考冲刺般珍惜时间，见缝插针地打游戏；豆干爱好者固执地坚守着老派广东人吃辣的底线。我们六人，虽不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时常抖抖机灵，拌嘴互怼，互相造梗。



唯一与狗狗和谐相处的少年

我们会记得，弹尽粮绝的我们在小卖部翻到了一杯桶装泡面和两袋袋装泡面，只能从小卖部老板那里借碗，那可能也是我们人生中唯一一次买泡面还要向店家借餐具，吃完还得洗干净还回去的经历；我们会记得，我们住过一晚人均三十的宾馆，因为我们没来得及续房，六个人只能挤进一间四人间；我们会记得，我们在村长家撸过狗，那是我们四个怕狗女生的人生巅峰；我们会记得，有一个“坏大叔”被小朋友满村子追着打；我们会记得，我们诱导过怕吃酸的“北方人”绘图员吃下了人生第一颗黄皮和第一根大蕉。想好好放在陈列柜里珍藏的记忆有那么多，临别想要说的话那么多，到头来只是手一挥，道一声再见。

队友们，天南地北，有缘再见哦。山水一程，三生有幸。千村归来，无悔当初。愿南粤千村，未来可期。

【千村表彰】不忘初心，不负征程



现场大合照

2019年9月6日晚上七点，2019广东千村调查表彰大会在暨南大学本部暨南大学校本部中惠楼217圆满召开。本次表彰大会由广东千村调查执行负责人花芯老师担任主持，应邀出席本次表彰大会的有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成品兴书记、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老师、2019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各位老师以及近百位访问员和核查员。师生汇聚一堂，共同回味千村点滴，总结项目经验，传承千村精神。

项目回顾

大会之始，花芯老师简明介绍了与会嘉宾，并播放项目回顾视频《2019广东千村调查·又见南粤炊烟起》，再一次把在场的师生带回了广东千村调查访问与核查的那些时光，欢声笑语中糅合思考与成长，大家一同回顾往昔，共证青春志、岁寒心。

院长致辞

随后，由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致辞。讲话中冯院长首先向在调查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老师和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接着，冯院长对项目完成情况作了简单总结。他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除了认真完成调查任务，收集真实而宝贵的一手数据，还通过自己的行动回馈乡村，引导社会关注乡村，充分展现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在回顾项目时，院长重申了了解广东乡村发展的现状对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对千村访员和核查员们的工作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对获奖的团队与个人致以祝福与展望。

学生代表发言

学生代表发言环节，核查员陈宽仁表达了自己对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感谢。千村项目让这么多素未谋面的同学相聚一起，让他们有机会听见广东乡村真实声音，收获了友谊和成长。他表示，无论是调查工作还是核查工作，都会有困难的地方，但大家为了保障数据的真实性，都会严格要求自己，以更多的耐心与细心做到最好，也正是这样，大家都逐渐变得比之前更优秀。

颁奖环节

发言结束，大会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在激昂的音乐声中，“最佳团队奖”、“积极贡献奖”、“精打细算奖”、“C位出道奖”、“坚持不懈奖”、“雷厉风行奖”、“精准追踪奖”、“质量超群奖”、“优秀核查员”、“优秀志愿者”、“优秀访问员”、“优秀队长”等诸多奖项的获奖名单逐一揭晓。

同学们纷纷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获奖同学们的祝贺。



获奖团队



获奖个人

个人才艺展示与抽奖环节

颁奖间歇，同学们和项目组精心准备的个人才艺展示与抽奖环节更是将大会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河源龙川队的刘铎辉与东莞横沥队的汪桂庭用悠扬的口琴表达了参加此次千村之行的心情变化、对队友的不舍以及对项目的美好祝愿。



正在进行口琴表演的刘铎辉同学

抽奖环节则是由冯院长和成书记抽出了当晚的六位幸运儿，有幸被抽到的同学将会分别获得访员们梦寐以求的村村小黄帽和印有小村村的抱枕。访员们都紧盯着自己手中的号码牌，期待花老师念出自己手上的数字。

伴随着欢声笑语和绕梁的琴音，2019广东千村调查在这个秋夜圆满落幕。浅尝百味尚苦，回甘获益良多。奖状虽小，但印证了各位访问员和核查员坚守初心求真，砥砺奋进访山河；日子虽短，但让我们结缘了乡村千百态、人生千百种、益友两百余。

今夜携秋水、揽星辰，千村与君暂别。待得来年骄阳艳，望再与君共聚，比肩同游阅千村。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

【GMS项目进展】方寸间绘城市百态



绘图员开展绘图工作

越过了五月的初夏雷雨，跨过了六月的徂暑烈日；七月初，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项目第一阶段的绘图工作暂告一段落；来到八月，第二阶段绘图员招募工作已经完成，绘图工作现正积极开展中。

五月初，项目组绘图员在接受规范的绘图培训后正式出发，在白云、海珠、黄埔、荔湾、天河、越秀6个区抽样的约二十个社区开展电子绘图工作。每一天清晨，他们都会带着设备、工具来到指定样本社区，徒步穿梭于社区之间，风雨无阻。他们脚丈羊城，以足迹勾勒着各个社区的轮廓，他们眼观四方，严谨辨别着每栋建筑物的方向。

在方寸平板上，他们绘下了城中村与旧社区的千姿百态，也记录下了呈现民生新气象，展现城市新风貌的城市社区。在所有绘图的社区中，有的社区人口稠密，房屋错落分布，众多街巷横穿，但大多巷子只容单人通行。楼距奇窄，“一线天”与“握手楼”随处可见。有的社区，住宅区与空地、蔬菜种植地交错分布，辖区广阔，整个社区的绘图工作花了一周左右才完成。还有的社区虽老旧，但入口的信箱整齐排列着，社区树荫下的小桌从不缺下棋与围着观棋的老人，生活气息浓厚。

在方寸平板上，他们感受到“深入巷里，方知人间苦乐”。居住在社区的人，形形色色，有老人、孩子，有小摊贩、也有刚踏出社会的青年人。出租屋里，每天老租客搬走，每天又有新租客搬进，人口流动极大。穿梭于社区街巷之中，破旧景象随处可见，忙于谋生的人熙熙攘攘，缺少阳光的角落比比皆是。但这些角落不缺乏活力，也不缺乏梦想。无数的人守着这夜眠所需的六尺之地，心里装着美好人生，装着宽广天地。

在方寸平板上，他们以严谨、坚韧的姿态记录真实的数据。GMS项目组的初衷是了解当前流动人口工作与生活现状以及城市整合程度，研究流动人口与本地常住居民劳动力市场的互补情况，探索城市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相关问题，以更好地为常住居民及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绘图阶段，绘图员所记录的社区信息、建筑物的方向、居住人口以及绘下的每一张图纸，都如星辰构成浩瀚宇宙般，构筑了项目的基础，为项目以后入户调查提供定位辅助及抽样框基础数据。

目前，第二阶段的GMS项目的绘图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正在进行最后的资料整理及汇总工作。截止2019年9月底，GMS项目共计完成22个社区的绘图工作，其中13个社区采用手绘地图方式，9个社区采用电子APP绘图方式。截止项目绘图结束，绘图员报名人数达122人，其中录用并开展工作的绘图员共计50人。

脚踏实地海让路，持之以恒山可移。GMS项目在各项目组老师与绘图员的不懈努力下，不断取得新进展。GMS的精彩仍在延续。



社区百态



绘图员开展绘图工作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

【项目进展】2019 中国乡村流动人口调查 电话访问员培训会顺利结束



全体大合照

2019年8月下旬，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简称RUMiC）招募工作基本完成，本次共招募三十多名电话访问员和核查员。2019年8月31日上午9点，RUMiC电话访问员培训会在暨南大学富力教学楼905准时开始，出席本次培训会议的有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薛森老师、RUMiC项目主管李凤槐老师、质控主管肖和老师、执行督导毓菁老师以及30多位电话访问员和核查员。本次培训会主要围绕如何开展电话访问进行。

会议伊始，由主持人李凤槐老师向各位同学进行项目简介，并与同学们一起观看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介绍视频。紧接着，薛森老师介绍了项目进展并，同时鼓

励大家积极参与相关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促进同学们对社会调查的认识。

稍作休息后，由李凤槐老师开始问卷培训流程。首先，李凤槐老师从对样本访问对象和访问的技能开始讲解，随后，他就问卷的填写进行说明，并以幽默风趣的案例帮助大家更加充分地了解问卷技巧。薛森老师也对问卷的部分问题作出补充说明。紧接着，肖和老师讲解了质控标准以及访问规范，主要强调了访问中需要注意的关键要点。



认真听讲的同学们

下午是电话访问的模拟环节。同学们两两分组，一起进行模拟练习。模拟访问结束后，李凤槐老师和薛森老师针对电话访问员们在模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汇总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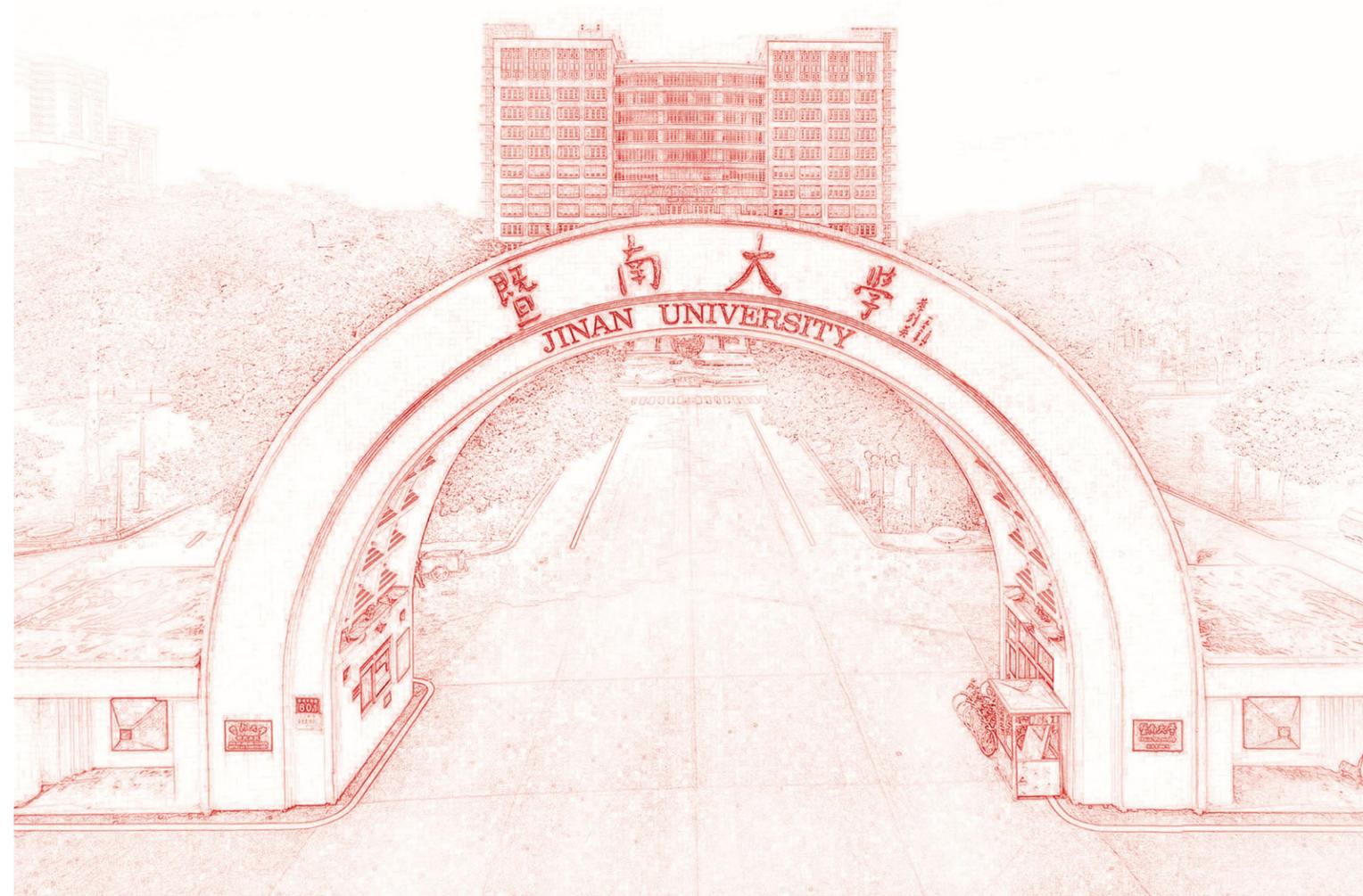
培训会结束后，同学们便要将所学真正运用到电话访问中，开始他们的 RUMiC 之旅。希望同学们能够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访问中遇到的问题，并顺利完成本次电话访问任务。



访问模拟环节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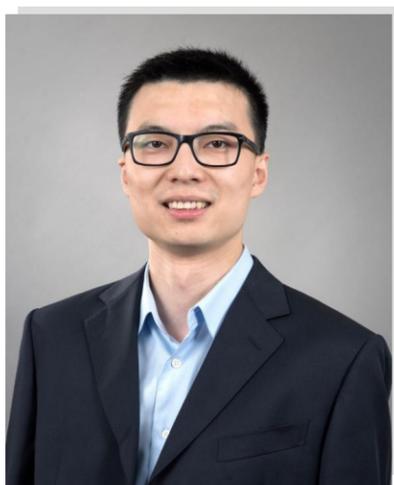
人物专访

IISR人物



IESR 人物

助理教授张毅：万事皆需努力，功夫要在平时



人物名片

张毅，IESR 助理教授，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网络经济学。

选择做学术，选择做老师，选择做一个温和专注的人，与选择相关的一切都来自当事人内心的价值判断。而 IESR 助理教授张毅，正发自内心地热爱着这些选择。

“想上好学校，只有work hard”

初见张毅，他正在电脑前忙碌，纯白T恤干干净净，说起话来亲切自然。在美国求学10年的他对于美国的教育模式感触颇深。

张毅认为国内有一个思维误区：美国孩子上学很轻松。他引用自己在波士顿的经历，表示在美国如果想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读书，需要付出国内上清华北大一样程度的努力，二者之间并无区别，美国的学生也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进入到这样级别的高等学府。美国大学典型特点是“宽进严出”，不努力的话很容易就

会与班上的同学拉开差距。美国大学教学非常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学生进入本科之后，要尝试着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为高阶课程打基础。

“美式教育与中式教育最大的区别是思维模式”

这是张毅想要强调的重点。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大体系统中，相对欠缺的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模式。

美国本土学生拥有非常好的发散思维能力，他们经常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中国的学生却常常停留在“这个问题我会解，我知道”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思考问题的相关知识点，对这些问题的相关定义缺乏更深刻的理解。例如，部分中国留学生刚出国进行本科阶段的学习时，会因为数学基础好而显得优秀，但随着高阶课程



张毅在2019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上进行论文报告

的推进，学习上会逐渐吃力。这与学习时采用的思维模式有很直接的关系。

张毅认为美式教育重在鼓励。例如学生对数学感兴趣，那么老师就会一直鼓励你学数学。而学生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和兴趣，这种主观能动性使得学习效果事半功倍，同时帮助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除了尝试改变思维模式以外，张毅也建议出国的同学要多交流。美国的课堂鼓励大家多提问，不懂得问题要及时问，因为在课程很紧凑的情况下，累积过多的问题后期很难被消化。所以最重要的是“功夫在平时”，临时抱佛脚的学习方式是不可取的。



IESR本科专业招生，张毅与家长们交流

“我认为网络经济学在未来会成为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说到为什么选择学习经济学，张毅表示自己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但一开始对经济学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偏向文科，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理科专业。”而此时的张毅已经喜欢上了经济学，并在本科老师的引导下发觉自己对计量经济这个分支更感兴趣。张毅非常喜欢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并认为这也是让自己对计量经济保持兴趣的关键点。

在博士求学阶段，张毅遇到了一位影响他整个学术生涯甚至职业选择的导师。在这位导师身上，张毅看到了做学问最难能可贵的一个品质——坚持。除此之外，这位导师为人也十分谦和，能够静下心来为学生传道授业，也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要点，在生活上更是对张毅关怀备至，这也是张毅选择在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要原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张毅动情地表示他对待这位老师就如同父亲一样敬重。

提到自己最近做的研究工作，他着重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之一——网络经济学。“简单说就类似于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共同借贷关系，如何建立起联系来一同分担风险。现在大家的关注点在于这些联系建立的原因，或者给定这些联系，来探究它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什么样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来理解这些影响的形成。”

张毅认为网络经济学的内生性极其复杂，当前用于解决网络经济学的计量经济学应用，发展的还远远不够，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微观个体的数据可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观测，为解决网络经济学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具有很可观的前景，未来也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IESR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学术资源”

张毅说选择 IESR 冥冥之中或许也是缘分，最吸引他的就是 IESR 的学术资源。他认为，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多与学术前沿人物交流，汲取不同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得到同行对自己

研究课题的反馈，这就能大大提升工作效率。“IESR 就非常重视这种学术上的交流，也非常重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它设立的初衷和研究方向也与我非常契合”，种种原因让张毅最终选择留在 IESR。

入职以来，张毅发现同事们对学术都饱含热情，整体氛围也非常活跃，大家经常互相沟通、互相帮助。

在未来规划上，张毅认为首先要做好一个年轻教师该做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其次，作为 IESR 的一份子，在院系需要自己的时候也能出一份力，划好自己的这一杆桨，让 IESR 这艘大船能驶向更广阔的海域。

IESR 人物

助理教授李润梁：踏踏实实做研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人物名片

李润梁，IESR 助理教授，于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分别获得金融学、英语两专业学士学位，硕博就读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为金融经济学。

文人风骨出口成章，史实典故信手拈来，融合了金融经济领域人才特有的气质，确是 IESR 的“非典型”助理教授——李润梁无疑了。

“我想用金融学去解决实际问题”

谈到为什么选择金融学作为自己本科的第二专业，李润梁笑着说，选择金融学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可以自由选择第二专业，而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所以也就误打误撞选择了金融学。

他认为，微观上讲金融学或可用来解决公司的盈利和发展问题，宏观上则涉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经济风险等，金融学能够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而当下的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缺口仍较大，这是他选择金融学的主要原因。

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体现在他的研究成果上。他特别提到，习总书记任职以来对生态文明尤其重视，他的多篇论文都着眼于自然灾害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影响，及金融机构在自然事件中的作用机制。

“自我管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

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李润梁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等。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己，要学会自我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李润梁的导师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导师会很主动地帮助我，他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有能力，有趣又富有 idea 的人。他喜欢做饭、喝酒、骑自行车、游泳等等。而我就有点刻板，聚餐时绿茶一杯接一杯，跟着他才学会了喝酒”，李润梁笑着说。回忆起求学生涯的点点滴滴，李润梁非常感谢这位导师，尤其是在自己的论文没有大的进展，充满负能量时，导师都会很愿意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安慰和帮助。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未来的规划上，李润梁踌躇满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人活着总要有目标。他的目标是在科研上，将理论和实证进一步结合，多调研，切实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问题，“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出一些真正有温度、接地气的东西。”李润梁说到。



李润梁为同学们分享留学经验

如何写出这样的东西呢？李润梁认为，一定要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他随口引用了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原文：“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是讲经济周期的问题，古人几千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经济周期，而今天的学者们仍在研究，这就是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矛盾。习总书记讲要“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就要把握这个时代的矛盾特殊性，走好为人民谋福祉的君子路。



李润梁参加我院举办的第二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

“IESR非常年轻且充满朝气”

提到为什么选择于 IESR 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李润梁说他从朋友那了解到 IESR 这么一个非常年轻且有朝气的学院。他认为年轻的团体有着更充足的干劲，在当下朝气蓬勃的学院中，大可施展抱负。

李润梁也强调了服务的问题，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在学术上不够优秀，但也很希望能够在学院需要的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与同事们一起为学院的成长助力。

学生天地

迎新特辑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迎新特辑



注意，前方“萌新”来袭！



迎新小组

9月18日，是IESR的新生报到日。为了更好地迎接同学们的到来，老师们前一天就已经布置好了教室，新生手册，学院院服，新生礼包，资料须知一一陈列在位。随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进学院，我们也迎来了第一批新同学。

来报到的同学们三两结伴或携亲带友，带着好奇和新鲜迈入学院，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完成报到流程。针对同学和家长们在教学、食宿、缴费等学习和生活上存在的问题，老师们也一一作了耐心解答。

今年的IESR依然秉承学长学姐对新生的“1对1”迎新帮助以及发放IESR新生手册的传统，这是IESR的新生报到特色。学长学姐带领新生熟悉校园，手册为同学们提供了学院情况、人才培养和学生活动等多个方面的介绍，也为同学们的学校生活提供了贴心指引。





“1对1”小组

针对这样的贴心服务，萌新们有话要说：

陈思琳（汕头）：我觉得老师们和我们一样年轻，交流得很开心。今天的报到指引很到位，师生细心考虑到了很多小问题，感觉很亲切，宿舍条件也比我们高中好得多。新学期我希望能加入一个社团，多认识一些同学，保持 3.5 的绩点。

邱俊杰（成都）：新学期期待认识更多的人，看更多的书。报到帮带的学姐很热情，但我知道报到地点所以就没有再麻烦她，整体都很满意。

李景荣（梅州）：报到安排流程很快捷，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学校虽小，但宿舍挺干净，看得出之前打扫过，新的学期希望自己一切顺利。

苏佳仪（深圳）：报到流程简单快速，指引很好。进学校就能看到学长学姐在教学楼指路，很清晰，学校的居住环境也比想象中好。学长学姐一对一服务很贴心，对接我的学姐等下会带我逛校园，新学期希望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刘赢轩（长沙）：有校车接很方便，学姐领过来也很贴心。报到流程没有之前想象中繁琐，我住的男生宿舍是学校顶配，感觉很好。

黄玥馨（四川）：报到流程比我想象中简单，对学长学姐一对一的安排很满意。

为了加强新生及家长对学院的了解，学院特别安排了一场见面会。家长们参与热情高涨，会议室座无虚席。见面会由谷一桢副院长主持，他从学院教学情况、人才培养方案和学校生活事项等方面为同学和家长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讲解。

新的学期新的环境，同学们也将迎来自己新的生活。从今天开始，暨南大学就是你们的家，IESR 就是你们的家，不论同学们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可以向学院老师和学长学姐们咨询求助。让我们师生戮力同心，共同开始新征程！



新生手册



典礼成 篇章开，心拉近 筑梦台



2019开学典礼师生合影

9月19日，秋风渐凉天气晴朗，IESR 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开学典礼，参与本次开学典礼的有 2019 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典礼尚未开始，同学们就已经迫不及待聚集在中惠楼 106 室，期待着自己的开学“第一课”。

开学典礼以学院宣传视频开场，面对着这个崭新的学院介绍，所有同学都满心好奇，全神贯注于屏幕。视频播放结束后，开学典礼正式开始，本次典礼由 IESR 谷一桢副院长主持，他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学院成立缘起、师资力量配备、学生培养特色和历届学生的学习情况，也为大家未来的学习生涯规划提供了若干建议。

冯帅章院长随后给大家带来了开学“第一课”，向大家展示了他眼中的学术研究是怎样的。学术的基因是好奇和诚实，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学术真相的忠诚，学术的方法是假设和求证，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



谷一桢副院长

学术诚实的重要体现；学术的品性是平等和谦逊，无论达到的学术高度如何，都要明白天外有天，从而保持谦逊的品格和平等的姿态；学术的回报是喜乐与服务，学术能够提供的更多是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它最终的落脚点是服务于这个社会，这是学术研究的终极奥义。



冯帅章院长

冯院长风趣幽默的讲话风格和生动活泼的案例分折，让在场的同学们在认真聆听的同时发出阵阵笑声，现场气氛热烈。在笑声和轻松的氛围中，他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来自 IESR 的亲切热情与严肃认真，学到了大学中的“第一课”。

16 级本科生韩亚婕作为本次典礼的学生代表，为大家分享了她在 IESR 的学习感受和学习经验。在她眼中，IESR 的老师们非常年轻有活力，他们不仅是在教学生知识，也在和学生做朋友，教学上更是非常认真。在这个大家庭里，学院和学生们关系密切，逢年过节学院总是提供诸多福利，在未来的发展上更是为学生尽心尽力，提供各种升学及就业信息，学院日常的调查活动与课外活动更是丰富多彩。



16级本科生韩亚婕

社会调查活动的主要负责机构是 IESR 社会调查中心，中心项目主管花芯老师今天也来到了典礼现场。她为同学们简要介绍了调查中心的日常活动和目前的调查成果，如广东千村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等，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调查活动，感受学术气氛，接受学术训练，为数据统计和学术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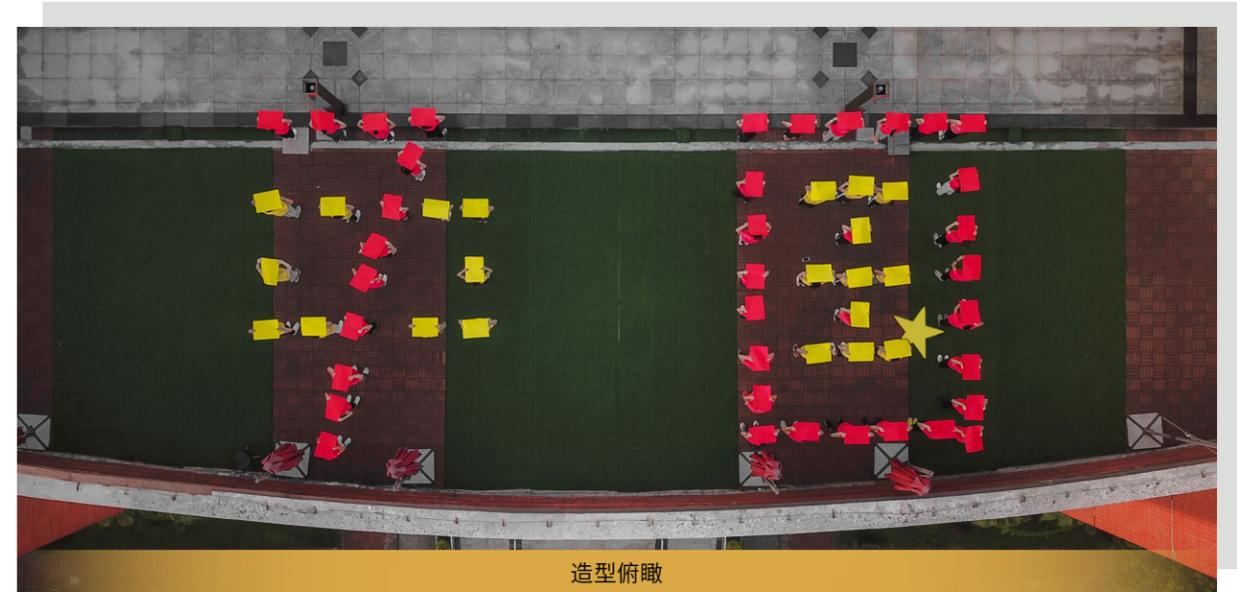
花芯老师

下午，学院老师走访了新生宿舍，了解他们生活状态和日常情况，走访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的在校生活经验，为新生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一些建议，进一步拉近了师生距离。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已然开启。借用冯院长在开学典礼上的叮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 IESR 感受学术气氛，接受学术训练，养成学术风度，取得学术成果。在 IESR 的呵护和帮助下，更好地学习和成长，实现自己来时的梦想。



创意造型庆华诞 思政课堂谱新章



造型俯瞰

随着建国 70 周年庆典的到来，你们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为祖国母亲庆生的喜悦了！IESR 新生训练营就是这样一个按捺不住的范例。

2019 年恰逢建国 70 周年整，IESR 带领新生队伍，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和“中国”的主题，以暨南大学教学楼及图书馆为背景进行创作，体现“爱国爱校”这一主题。图中红色与黄色元素分别代表五星红旗以及五角星，红色的“70”象征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并与黄色元素共同构成“中国”二字字样，全面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校时讲话精神，并深刻表达了该院学子对祖国母亲七十华诞的深情祝福。该创意造型也荣获新生训练营创意造型竞赛二等奖。

26 日下午，同学们赶赴教学楼 1306，开启了他们新学期的思政第一课。来自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陈联俊教授，受邀担任同学们的授课老师。陈教授从目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为同学们上了生动而有意义的一课。

在授课过程中，陈教授穿插了很多自己的教学范例和师长趣闻，让同学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对学校生活也有了更多鲜活了解。在他循循善诱的讲解中，家国振兴的责任感和命运相衔的紧迫感，给同学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现状如此，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陈联俊教授



认真听课的萌新们

时间总会给我们答案，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学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锤炼自身，在纷繁错乱的社会思潮中慧眼明辨，选择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前进方向，不随波逐流也不同流合污，在做好自己分内之事的同时夯实思想基础，增强专业素养，如此才能有能够担负起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伟业。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第6期活动】冯帅章院长谈中国的人力资本战略——挑战与机遇



冯帅章院长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教育扩张、劳动力市场改革、人口流动为中国人力资本发展夯实了基础。首先，中国教育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了丰厚的成就，入学率呈上涨态势。

其次，冯帅章院长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改革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这个阶段的特点为失业率上升，国企就业比例下降明显，劳动参与率下降。而这一阶段的工资回报差距上升非常快。到2002年之后，劳动力市场基本保持稳定，人力资本的回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人口流动则呈现出年轻化、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多、流动人口教育程度较低、高教育人口的流动逐步增加等趋势。

从挑战的角度来讲，老龄社会、性别平等、学前教育、留守儿童、职业教育、机器换人、职业分化都是影响中国人力资本的因素。冯帅章院长以数据图表的形式为大家分析了多个问题。比如：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状况现今如何？女性教育程度增加对劳动力市场有何影响？

从机遇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虽然有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冯帅章院长提出了三大机遇，即技术进步、改革红利、意识觉醒。



认真听课的同学们

冯帅章院长的讲解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结合图表数据和自身经历，让貌似枯燥的人力资本话题有了更多生动的延展。在场同学们聚精会神，不时在笔记上记录心得，一场讲座听下来，对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对外交流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周俊波副主任一行来访我院
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处长葛国斌一行访问我院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省人大财经委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周俊波副主任 一行来访我院

2019年7月23日，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周俊波副主任一行来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我院冯帅章院长等座谈交流。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随行人员还包括：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信息处处长凌创，副处长钟润生，副调研员周赞，副主任科员俞丽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出席人员还包括：研究院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思思，院长助理卢晶亮副教授，助理教授李承政、唐高洁，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武茜。

冯帅章院长首先从制度建设、学科建设、智库建设、数据调查以及学生培养等方面介绍了学院整体发展，张思思副院长则具体介绍了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研究领域以及政策成果。周俊波副主任对我院成立仅3年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对我院以数据为基础

的新型智库发展模式表示认同。双方结合专业知识以及社会实际讨论了进来的热点问题，并探讨了未来更多元的合作方式。



双方合影

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 处长葛国斌一行访问我院

2019年7月19日上午，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流管办”）处长葛国斌、郭艳平、向东与龚琴一行四人访问我院，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副主任薛森、李凤槐共同参与了本次交流。

冯帅章院长首先向葛国斌处长一行简要介绍了广东人口流动调查项目在广州市开展绘图工作的进展，并对市流管办对该项目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表示感谢，在市流管办的帮助下，项目稳步推进。接下来，葛国斌处长介绍了市流管办近期的流动人口工作重点及利用“互联网+”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成功案例。

葛国斌处长表示此行目的是探讨与 IESR 进行广州市流动人口调查和数据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合作。冯帅章

院长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合作意向，希望双方能够携手搭建合作平台，共同探索流动人口相关问题，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地服务、为提高流动人口的福祉共同努力。



双方交流现场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广东省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2019年7月22日，我院冯帅章院长一行前往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与广东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幸晓维进行座谈。冯帅章院长首先介绍了我院的人才引进、社会调查、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和成绩，并介绍了我院以高质量数据为基础的独立、新型的智库特点。幸晓维主任对我院的发展模式表示高度肯定，也为我院在社会调查、智库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宝贵建议。双方表示未来将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共同为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双方交流现场

冯帅章院长一行前往广东省教育厅调研

2019年7月12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冯帅章院长一行前往广东省教育厅，与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就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座谈。省教育厅参会领导包括：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副处长赵琦、人事处副处长许曙、师资处科长江远彬、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处科长郭挺健、广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科长黄炜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随行人员包括：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韩昱洁，研究助理张亚楠。

冯帅章院长此行依托省委改革办人才战略项目，就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基本情况和现行政策与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与讨论。省教育厅相关领导向冯院长介绍了近两年来广东省异地高考的情况以及现行随迁子女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政策实施情况。双方对民办学校教育的新政策进行了探讨，并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双方交流现场